

田口卯吉著
余又菴譯

日本開港史

商

731.3
478
2

日本開化小史

田吉
又卯
蘇吉
譯著

中華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59



序一

漢譯日本開化小史序

古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吾國與東鄰日本，相隔一衣帶水，且交通往來，垂二千年，而關於彼方國情之智識，何其眇也！夫欲了解一民族之性情與文化，必自了解其歷史始。試觀吾國關於彼邦歷史書籍之貧乏，而後知吾人對於彼方國情之隔閡，蓋事理之所宜然，無足怪者。

距今十年前，『九一八』事變發生，吾國人始深感『知彼』之重要。於是國內研究日本之組織，與發表研究結果之書籍，亦漸漸出現。顧此等研究，大都以一時代或一事件爲主要題材，結果雖於某一方面之智識不少貢獻，但對於了解整個民族與夫國家行爲之背景尙嫌有所不足，以其未從整個歷史入手故也。

研究歷史不出兩途：一則關於事實之探討，一則關於史實之解釋。是二者在文化程度較高之國家，皆必有其相當成就。唯其然也，一國人欲研究他國之歷史，必有取於其本國之材料，必有取於其本國人之著述。非是二者，則所謂研究云者，幾於無從着手，而翻譯之事，蓋亦研究他國歷史者所不可少之作，亦於此可概見已。

中基會之編譯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卽頗以選譯東西各國歷史名著以補助了解世界各國文化自任。當茲東方強鄰正向吾國肆其凶鋒之際，又鑒於吾國自來對於彼邦歷史智識之缺乏，曾立意翻譯彼邦歷史古籍巨著，如太安麻呂撰之古事記，舍人親王，太安麻呂等撰之日本書紀及大森金五郎撰之大日本史等書，冀以爲吾國研究彼邦歷史之一助。願首二書問世皆在一千二百年前，書中所言僅及日本上古神話。大日本史亦斷代於江戶政府時代，且卷帖浩繁，不易卒業。余以爲閱讀以上諸書之先，不可無一提綱挈

傾之日本全史以爲之先導，庶幾讀此之後，再進而讀古事記，日本書紀諸書，愈有以了解其轉代之背景與各書在彼邦學術上之位置，於研究彼邦之歷史與文化必易爲功，可斷言也。

余君又孫爲參加透譯大日本史之一人，適其譯事將畢，余以此意告之，囑另覓一簡要之日本史譯之以作讀日本古書之先導，余君因以田口卯吉之日本開化小史應。余觀田口氏原書出版於明治初年，距今且五十年，而其書仍爲彼邦學界所尊崇（參觀本書中嘉治隆一之解說及三上黑板等序。）蓋其價值，不在歷史事實之考訂，而在對於歷史之解釋。又因其成書在明治初年，維新事業方告發軔，差少近年彼邦學者好大自誇，伸己屈人之陋習，是真吾人欲了解彼邦民族者所欲得之著作也。因請余君遂而譯之，稿成又爲參閱一過，乃付梓人。本書之優點，具見余君之譯者序中，茲不復贅。唯其中尙有一段文字頗值得吾人注意而爲余君所未道及者，特爲表而出之以告讀者。作者於敘述南北朝戰亂時，有言曰：

海內一般丁壯，唯以滅絕人類爲職業，老弱則爲之製造器具，糧食以資其創亂。人間社會，非營幸福之場所，而爲互相吞噬之區域。猛惡無匹之勇士充滿諸州，寶貴之人命輕於鴻毛。個人相見，動輒成鬪。諸國之大名又相率養武夫，灌以忠義之教，勵以奮死之榮，乃驅之侵入鄰國，掠其貨財，奪其人命。所到之地，任性蹂躪，然後歸國。苟爲敵國所敗，則必再往報復，其禍更烈。……

吾人讀此之後以求了解此當前之民族，思過半矣。

民國三十年五月任鴻雋

譯者序

田口卯吉氏所著日本開化小史一書，爲明治以來日本史學界之名著，其內容已於卷首黑板，三上兩氏之序文及校訂者之解說中詳述之矣。田口氏自誇之歷史觀，雖不脫西洋十八世紀人道主義及實利主義之窠臼；但予覺此書有左列諸優點，故特爲彙譯，以供學者之參考。

(一) 日本古無文化，受吾大陸文化之薰陶，始進於文明之域，殆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但日人之談古代文化者，或隱而不言，或傳會古代傳說，甚至偽造史實，以自誇爲一古文明國。故日本古代史迄今未脫神話之性質，田口氏此書，以科學觀點敘述神道之性質及起源，不涉妄誕不稽之神話；其敘吾大陸文化對日本之影響時，則詳述史實，再加評論，不失爲史學家的態度。

(二) 日本史家論中古武家時代及幕末明初之歷史者，多持不同之見解。一派同情幕府，一派尊崇皇室；敘事各有取捨，言論亦有偏私。據吾人觀之，日本自古迄今，實爲一澈底之軍國主義國家。古代之天皇，不過爲當時之武力統治者，中世以來之將軍，亦爲一軍力較天皇爲強大之統治者。天皇與將軍，朝廷與幕府，不過有勢力消長權柄得失之不同耳，不必衡以君臣之義，視天皇爲萬世一系之君，將軍爲篡竊大權也。田口氏此書，論古代天皇之統治，中世武家制度之發生，以及幕府之創立盛衰，悉依社會進化之觀點以立言，不依附天降神君之義，實爲日本史家所難能。德川幕府之滅亡也，田口氏謂「勤王心不足以倒德川氏，倒之者爲外寇。」足窺其眼光之正大。其述日本南北朝之事，亦不如一般史家之爭論正統問題，僅稱之爲「戰亂」，詳述其消長滅亡及影響所及而已。

(三) 本書所述之文化範圍，甚爲廣泛；自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文學以及飲食居住樂方面，

無不涉及。其有理論繁雜者，則專章述之。蓋若飲食居住等日常事物，則依時代之分期，列表以示之。既詳且晰，爲他書所不及。

X

X

X

X

本書版本頗多，此譯所據者爲日本昭和九年出版之岩波文庫袖珍本。篇首有校訂者之解說及大正年覆刻縮刷序兩篇，並譯之以見彼邦人士對於此書之意見。書後有校訂者編之鼎軒略年譜，以其與本無關，則從刪削。譯成後承任叔永先生爲校訂一過，文辭亦多修正，特書於此以誌謝忱。

余又孫三十年三月於重慶

凡例

一 本書原本於明治十年至十五年之間由著者自己付梓，全書共六卷六冊（本文約二百頁），每卷收錄一冊。原文係和裝，黃皮，日本紙八開版。全文均未加句讀。當時已經再版。就此一點看來，當時此書是很普及的。原本所用之日文字母法及辭語，都表現出時代的特色。

二 本書出版年月，據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明治新聞雜誌文庫所藏之初版來考證，（該文庫中所藏者僅第四卷爲再版），我們推斷如左：

（第一卷）在書皮裏面第一頁上有『明治十年七月稟准，明治十年九月刊行』等字，書末記著者姓名的一頁上有『明治十年七月十日版權免許』等字。再據第一卷卷首之自序中所記之年月亦爲『明治十年九月』。故我們斷定此卷正確之發刊年月爲明治十年九月。

（第二卷）在書皮裏面一頁上所註刊行年月，與第一卷全同。書末記著者姓名一頁上記有『明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版權免許』等字。書皮上與書末一頁上所記之年月不同，出版年月因而發生問題。明治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著者給他的義兄木村熊二氏（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信中有云：（原價載於鼎軒全集第八卷第六〇〇頁）。

『……日前寄呈之拙著日本開化小史，如有不當之處，尙祈指正！本書第二篇不日亦將出版，昔年談及之自由交易論，大部亦收錄在本書中。出版費已籌足，不日出版。……云云』。

據此看來，出版年月應當是『明治十一年二月』。但何以書皮紙上所記之年月又與第一卷相同呢？據我們想來，恐怕是因爲第一卷的書皮紙剩餘得很多，因爲在第二卷出版時仍取用之，故使後人發生疑惑。

(第三卷)在書皮裏面一頁上沒有刊載出版的年月(第四卷以下各卷均未刊載)，書末記著者姓名的一頁上印有『明治十年七月十日版權免許』等字，與第一卷全同。這大概也是因為印第一卷時有剩餘的，故在第三卷刊行時仍取用之。此卷發行年月，照理是當在第一卷之後，第四卷之前，大概以明治十一年後半為比較正確。

(第四卷)在明治文庫本中，只有這一冊是再版。初版刊行的年月不能據此推證。幸田口氏家藏之東京經濟雜誌(明治十二年一月創刊)中可以查出正確的記載。該誌第一卷第十三號四六零頁(明治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發行)始登出日本開化小史卷之四初版發行的廣告。(定價二十五錢)據此看來，此卷大約是明治十二年十月發行的。

(第五卷)明治十四年七月出版。

(第六卷)明治十五年十月出版。

三 大正六年一月，東京經濟雜誌社為紀念前年秋鼎軒先生贈勳位之事，特刊行本書之縮印版。是一種袖珍型洋裝小本，本文共四六零頁。卷頭有濫澤榮一氏的題辭。並且掲載原書出版時岸田吟香氏致中村敬字氏信件及中村氏致田口氏信件之複寫，著者於本書撰著時及其晚年之照片二幅。此外又有三上，黑板兩博士的序文。

關於刊印此縮印版的一切事務，由黑板勝美博士擔任之；黑板博士對鼎軒先生之學說作歷史之研究，有精深成績。他將本文全部加以句讀，訂正文本之各種錯誤，並且還對原文許多地方加以增創。此外又在上段欄外加了頂註，在總目次中加入詳細之細目，以便讀者之閱覽。

四 昭和二年出版之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同人社版)，將本書收入第二卷中(自第一頁至一百六十頁)。其本文與上述之縮印版相同，採用黑板博士所加之句讀及訂正，但省略其頂註，又刪去細目而仍用原書初版時比較簡單的目次。

五 昭和四年改造社刊印本書。本文，目次，以及三上，黑板兩博士之序文，均完全照大正六年縮印版之舊，只是省去了上段欄外的頂註。

六 岩波書店翻印本書時（即此譯文採用之原本），依尊重古典之歷史的主旨，採取儘量保存初版原狀的方針。本文，目次等，均用當時和裝六冊之內容。目次亦沿用原本的簡單形式（但目次的排列法，稍變原本之體裁，將六冊之目次合編爲一種目次，揭於卷首）。本文除推察其爲明確之錯誤外，悉依舊狀，用語完全保留原狀，於不得已時，加以（*）符號，另附註釋。

大正六年縮印版所加之句讀點，大多保存，以資便利。又因目次既採用原本之簡單形式，欄外之頂註必須採用，以便閱讀時易知本文之主旨。但此種頂註，依校訂者之意見，略有增省，並非完全採用大正六年黑板博士之原註。

七 田口氏家藏之和裝本中，校訂者發見數處有原著者親筆加的訂正，岩波版當然一律採用。

八 大正六年縮印版中所載三上，黑板兩博士的序文，對了解本書有所資助，岩波版亦均已採入。

校訂者記。

大正六年縮印版序

鼎軒田口博士易簣以來，已十二春秋，荷其爲尋常一樣之人，恐怕早爲世人所忘去了。但博士之名，無論何時，世人對他的記憶都是很深切的，他那種春風和露般的面影，永爲世人所追慕。他費了無數心血所完成之國史大系，羣書類從，大日本人名辭書，日本社會辭彙等大出版物，隨世運之演進，學問之開展而益爲世人所尊重。凡從事於學問者，或不以學問爲專業者，無不承認博士功績之偉大。在這種時代，其名著日本開化小史再版，書店主人囑予一言爲序，實予所最欣喜之事。

博士治學之重心在於經濟學，此固不待言者。但因其才力之縱橫，趣味之廣博，使博士亦染指於史學。博士在史學上鑽研頗精密，見識頗高遠，蔚然成爲斯學之大家。世人認爲新井白石，賴山陽而後博士實爲繼起之大史家。日本開化小史基於原因結果之理法，記述日本之變遷，其敘述之體裁，合乎西洋之史學研究法，在日本史學界開一新生面。彼脫離所謂『經史相須』之歷史的舊式，創造所謂文明史派的歷史。博士與故軍野安釋博士，可謂日本新史界之陳勝與吳廣。

若從今日進步之歷史界來批評，此日本開化小史，記事雖有時未能正確，議論亦不無失當之處。世人有所謂他的著述不過踏襲新井白石折柴焚記之後塵者，所見不爲無理。不過批評日本開化小史者，不能不首先虛心自思，此書是在距今四十年前著述的。當時史學的研究尙不發達，世人愛讀之國史書籍，除國史略，皇朝史略之外，不過日本外史之類耳。流覽大日本史者，亦屬罕見，史學會尙未成立。在日本各大學中，尙未有國史科之設立。當時任大學總理（即現在之東京帝國大學）之故加藤弘之博士，憂種漢學者着宿凋零，後繼無人，臨時開設古典講習科，是日本開化小史出版後之事。大學豫備門長杉浦重剛君認爲國民之教育中不可不授本國之歷史，乃納德國教師之建議，以折柴焚記爲教科書，也是小史出

版以換之事。自今日進步之學術界觀之，實有隔世之感。在此種時代環境中，博士著述國史而又能另開生面，可窺其本領之高大。至於日本國化小史之流傳，實不應嚴加指責。

這種名著再版，可謂學術界之一幸事。予欲表彰博士之功績，而草此文時，又不覺爲博士所激勵。凡讀此書而與予同感者，恐怕不尠罷！

大正五年九月

文學博士三土泰次謹

大正六年縮印版序言

故田口博士的本領，在政治經濟方面，其爲一世所景仰，已不必贅言。但博士在明治文化史上，亦放燦然之光輝，當於忙裏偷閑，致力餘業，在史學上孜孜研究，故功績亦甚偉大。明治初年，日本史學界甚爲荒涼，偶有一二出版品問世，亦不過古史之翻刻，或國學者漢學者之遺著而已。太政官所設之修史館，雖羅致許多學者，但其編纂而公之於世，可以稱爲史學著述者，僅明治史要一書而已。當如此空虛的時代，在日本學術界放一異彩者，實爲博士之日本開化小史。

讀日本開化小史者，無論何人，都髮聯想到新井白石的讀史餘論與折柴焚記等。以學者而爲政治家經濟家，又有文學之天才，在各方面均有卓見者，在江戶時代，當推白石爲第一人。其有益於天下後世最大者，爲其關於史學之著述。彼於古史通中所論之事，雖有許多可駁斥之處；但其對於上代史之研究，別開生面，毫無可非議之餘地。至於其讀史餘論，採文明史的體裁，敘述時代之變遷，迄至近時，日本之編纂國史概論者，大抵以之爲準據，不過引伸發揮其論旨而已。故白石實爲日本史學界之大恩人。田口博士與新井白石，有許多相似之點。其爲政治家而兼經濟家，爲相似的一點。其爲文學家而兼歷史家，爲相似的又一點。其以流暢之筆，靈活之手腕，表達其心所欲言之奧義，此一點亦復相似。不過白石的學問，有漢學的根柢，僅依荷蘭人而窺知西洋文明之梗概。田口博士的學問，則以西洋學術爲基礎，又加以和漢之學之造詣甚深，故其在學術上之成就，駕乎白石之上。此博士之所以爲博士也。博士爲佐藤一齋之直系，其在漢學上素養之深，可想而知。

日本開化小史可稱爲明治時代史學界之陸鐘與開拓使。所持論旨，或有多少缺陷，史實之研究或有未精確之處；但本書出版後，在日本史學界放出革新之空氣，使當時學者覺醒，其功績實爲空前所未

有。予讀本書，最感服博士著，爲其獨排時代之風氣而分析研究西洋學問之精神。當時學術界之風氣，完全模倣歐美，不過將彼之所有者移植於日本而已；並未加以分析研究，不顧其能否消化，而盲目地欲適用於日本。在此種環境之中，博士特撰著此書，首先闡明日本固有之學術精神，使世人知所自重。就這一點而論，我們不能不推崇博士爲明治時代之先覺者。但其思想並非故步自封，是進步的，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一方面尊重本國自己之學術文化，一方面又主張吸收外國文化之特長。由此可以窺知博士人格之高尚，學問之精深。

這本日本開化小史，是博士讀了一種西洋文明史而後構思撰述的。大概是受了巴克爾的文明史等影響而引起著述的動機也未可知。他所持的態度，與徒來日本的歷史家完全不同，從經濟方面，從政治方面，或者從文學宗教方面，都把握了日本歷史的真相。他把日本的歷史縱橫地批判解剖，闡明了日本文化有何種的特長，將來如何發展。他將這些具體的意見都收納在日本開化小史一書中，開創了日本學者沒有一人能夢想的新機軸。這本名著出現於日本之後，使一般史學者警醒。不僅史學界受其影響而已，一般國民也因此而知日本的歷史不僅是戰爭的歷史，不僅是政治的歷史，還有許多的歷史要旨。本書所發生的影響可謂至大至廣了。換言之，明治時代能夠稱爲文明史體裁的歷史，實以此日本開化小史爲嚆矢。再廣泛地說，明治時代的著述，其以西洋的學問爲基礎而研究日本固有之歷史與文化者，要以此書爲嚆矢。因此，不僅日本國民由此書始知日本建國以來之文明有何特質，將來如何發展；而且間接地，或者無意識地，學習博士對於學問的態度，由此而喚起一大自覺心，從來治學問的態度從此一變，大家覺悟日本有可誇的歷史，可誇的文明，未必在歐美各國之下，除翻譯模倣之外，還有樹立日本新文明之覺悟與決心。這種啓發明治時代國民思想的功績，亦應歸於這本日本開化小史。

回顧此書出版之經過，第一卷初公諸社會時，爲明治十年二月西南戰爭正爆發之時。西南戰爭與日本開化小史互相對照，有一種奇異之象徵。一爲舊文明之最後反照，一爲樹立新文明使命之光輝。自由

與進步，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在經濟上，常爲博士之標識。但他的自由進步主義，決非歐美的，是日本之自由進步主義。他深知日本特有之自由進步主義，以此書證之即可明晰。博士在本書中，就文明史上立論，說明日本文明在有些地方與歐美對等，在有些地方在歐美之上，一般學者盛稱其立論之直截明快。一言以蔽之，本書使博士在明治史學界之功績永垂不朽，亦爲博士在明治文化史上之紀念碑。

昨年十一月舉行即位大典時，聖恩及於枯骨，追贈田口博士徒四位；乃與同人集議，在本鄉中央會堂開紀念講演會。其後又有人提議將博士關於史學之著述，首先付梓，以資紀念。予於明治二十九年初識博士，辱知遇凡十年，其間曾參加博士計劃之編纂事業；國史大系，續國史大系，續德川實紀，羣書類從，續羣書類從，大日本人名辭書，及日本社會事業等書之出版事宜，予均擔任之，深知博士之苦心與努力。此等大事業，在日本開化小史中能窺見其淵源。博士之名論卓說，雖在海及其他著述中揭載者甚多，但欲選其著述之精華，足以作紀念出版品之第一卷者，仍應推此日本開化小史。當此書付梓時，一切出版事宜，均由予擔任。現此書將出版公之於世，乃聊記予對於日本開化小史之感想，並敘述出版之始末云爾。

大正三年十二月

黑板勝美

自序（錄原文，由譯者加句讀）

有裂眦反脣，言語激烈，動作蕩蕩如沸者，見之者曰：『彼怒矣』。有開顏解頤，言笑溫和，舉止揚揚如舞者，見之者曰：『彼喜矣』。是亦可也，然尙未盡焉。夫人非無因而怒者，又非無緣而喜者，則見喜怒之狀態，而求其因緣，以評其心之喜怒，庶幾無誤矣。歷史者，古來之評也。古來非一世，世世非一人，治辭之形勢，雜沓繽紛，若不能分析之，未必能免皮膚之見也。古史家之苦辛，不在於蒐集歷代許多之狀態，而在於究盡其狀態之所本也已。余記此書，其可悉者務詳之，其可略者務省之，以期得其情。雖然是原公事之餘，儉少暇而成者；況余之淺學寡聞，安保其評喜怒之無誤耶！

明治十年九月

田口卯吉識

總目錄

自序

卷一

第一章 自神道之遷轉至佛法之弘盛

人心之想像次第演進 政府之性質與神教 政黨時之風俗 佛法與神道之比較 佛法弘盛後想像之變質不潔 政府之性質不變

第二章 自漢學渡來至京都政權之衰微

漢學弘盛後之事件 唐制之模倣 和親發生遊惰之弊 和歌之盛興 平安朝之情形 各國人民之情形 上有門閥之弊，下有黨派發生佛法黨之情形 武夫黨之概況 政權移於東國

卷二

第三章 自封建之權與至鎌倉幕府創立時之地方情形

倫理上之精蘊 中古國部之制與兵制之變遷 戰亂大小名諸國武夫之心理亦變化 望榮譽之心 臣從之心與忠義之心漸第

第四章 鎌倉政府創業時代及其治世期間之情形

鎌倉幕府統治地方之方法 鎌倉政府內部情形 王家政治有神權之思想 元兵侵日 鎌倉政府整頓之由來 佛法信仰之風

卷三

第五章 自鎌倉政府滅亡至南北朝之戰……………四三

鎌倉政府治世之間政府與大名關係之變遷 王室欲傾覆鎌倉政府 楠氏之武略 鎌倉政府之滅亡 後醍醐之治世與規律

武人失望奉義源氏之二胄 南北朝之戰

第六章 自南北朝戰亂以後至戰國時代……………五〇

南北朝戰爭以倭國家之情形一新 封建份子膨脹之原因 日本人與在蒙元支配下之苦狀 應仁之亂 戰國時之世

卷四

第七章 日本文學之起源至十八世紀……………五九

十三世紀日本文學始出世 十六世紀以前文學之情形 十六世紀末葉漢文之變遷 和文始出世和文所表現的想像 十八世紀文學之進步

第八章 自鎌倉政府創立至戰國時代日本文學之沿革……………六六

十九世紀文學之進步 日本文學之基礎確立 編者體裁之改良 法律之成立 二十世紀之末有益之典籍多出世 佛法對於文學上之效果 二十五世紀以雙文學次第進步 想像之沿革

卷五

第九章 自戰國之亂至二十三世紀之中葉……………七三

戰國離亂之情形 亂臣賊子輩出之理由 英雄豪傑能逞其智略之理由 英雄之私利合於人民之公利 人情之善奮習 織田

豐臣德川三氏之勢力 封建離離之世因英雄之力而集合 天與有道

第十章 自德川氏裁定禪亂至二十五世紀之末……………**八八**

德川氏統制天下之困難 德川氏對王室之政略 德川氏初三代之開功名心消滅 人民專取笑下之風消滅 德川氏之制度不易發生反亂之理由 德川氏之制度難防止宰臣之弊害 德川氏及階級之內政易生豪傑專橫暴虐之理由 社會一般沈淪於逸樂

第十一章 德川氏治世期間所顯現之開化現象……………**八七**

社會平定時有形無形之現象皆進步 判斷社會生活標準之困難

卷六

第十二章 德川氏治世時代之開化現象……………**一〇九**

文學之概況 文學實財之進步雖大抵平行 二十四世紀文運為豪亂反正 封建開化之性質 重農之開化 社會自然政治 社會之發達如草木之發達

第十三章 德川時代勤王思想之發達……………**一一三**

謀反之口實表示與論 忠義心因利於封建制度故發達 忠義心大發達對德川政府不利 和學與神道 勤王心不足以備德川倒之者為外寇 愛國心之勃興 德川政府欲以天子之詔開港 此策不行德川政府專斷行之 諸侯之志士奉天子實行攘夷 將軍上洛之失敗 各地叛投 征討長藩不勝 將軍慶喜奉還政權 將軍恭順謹慎 外交一開德川氏之制度不能復維持

跋（香亭中根淑）……………**一一三**

日本開化小史

卷一

第一章 自神道之濫觴至佛法之弘盛



神道本集
與佛傳

神道佛說
與人性

實財之發
與人心
之文野

人非生而解神感者，亦非生而信宗教者，其所以解之信之者，乃因許多「想像之累積」的緣故。余閱舊史，見神武天皇之時，神道之信仰即已隆盛。其信仰之成立，蓋非在一人之胸中養成。若搜集神代之事蹟而分析考察之，可知在先民之想像中，已有尊長的觀念。由此即可大略推測神道之起源；進而引證推斷，更可得知信仰成立之沿革。蓋神代諸事蹟，雖難信據，但若並此種可引證之事蹟亦無之，則神武天皇時代神道教的信仰之發生，即不可得一詮釋。神道之發生，與佛說之傳入，必須人之天性中有此種要求，始得華生繁昌。因此，應首先說明此種天性，然後始能了解神道佛說發展之原因。本章中有許多辯論，皆為發揮此理而起者也。

人心之想像次第增進

人心之文野，與得實財之難易，互為因果，未嘗稍爽。未有實財富而人心野者，亦未有人心文而實財乏者。文野富乏，當保持平等之關係；試考各民族文運發達之歷史，均無違此例者。嘗太古之世，初民未知使用器械，製作技能亦未成熟，菓天生之果實葉根以為食物，綴草葉樹皮以作衣服，除此之外，別無生活之手段。夫智以接物而愈廣，情以用事而愈高，太古之人，多未能接物用事，其「心」豈能增

養生避死
純人之天
性神代之技
術與想像

長。(心爲情智之總體)。雖然，保生避死，不論智之廣狹，情之高卑，爲一切動物共有之通性。故在太古之世，唯有求衣食之念充滿其腦海，毫末用其心於他事。既無暇記憶祖先之事，亦無智力以顧慮間接之災害，茫然立於天地之間，無異禽獸，除衣食是急外，更無餘暇以憂慮死後之事，故靈魂不死之說，未發生也。(當時仍有模糊之生死觀，如傳說所謂獨化(註一)之諸神，茫然而生，茫然而死)。

迄至實驗少進，交際少密，乃對目擊諸物，給與名稱(伊奘諾尊與伊奘冉尊時，始有物名，其前之事蹟不可考)，知製造器械之技術(例如天之瓊矛，即當時之人製品)，執弓矛而獵於山野，投竹竿而釣於江湖。人智既開，得衣服食物之術不復如從前之煩與狹，人心所及之區域亦因之日廣。見人疾病，因其情形異常，初有恐懼之色，(伊奘冉尊有病，請於伊奘諾尊曰：「不必窺病室」！伊奘諾尊私窺之，見其苦痛之情形，遂有恐色，並見其身體之內，有種種之雷。此事載於古事記。所謂身內之雷，註云：見其輾轉之情形如雷，故謂之雷)。又注意病死後身體不活動之情形，及其甦生，無異從前，心中惶惑莫解。經苦思力索之後，認爲人之靈魂，必與身體非同之一物，完全獨立存在。身體之死，乃靈魂去也；其甦生者，靈魂返也。靈魂爲不死之物。有此觀念，始注意身後之事，發生靈魂不死之說，於是有了『魂』(Mikama)一語。(伊奘諾與伊奘冉二尊時，始有『魂』一語)。既有靈魂不死之說，死後之懸念，遂充滿其胸中。推究至終極之處，又有『黃泉』(Yomi tsukuni)一語。(伊奘諾尊曾往黃泉。或云彼行至月夜見之國，遂謂之黃泉國。又有人死後靈魂移於月之想像。但天堂地獄之說，以及死後必有禍福之說，當時人心尙未想像及此)。但尙未發生尊神祇，敬怪力等想像。

先民既知耕作養蠶，(天照太神時，五穀始生；稻爲瑞穗之國，亦自此時始。但一般人民未知耕作之事。神武天皇東征時，古事記中載有人民穴居巢棲之事)，由此又了解使用各種貨物。朋友兄弟相會於林中時，或作遊戲。(天照太神禁錮於天岩戶時，諸尊率五百侍從，懸八咫鏡，青和幣，白和幣，持茅薙之藉而歌舞。是蓋當時尊貴之人之遊戲，草昧之民尙未如此)。人心接觸外物既多，其受感觸亦不

靈魂不死
說

黃泉之語

耕作養蠶

保生避死
與自然力
是敬

少。其想像力不僅乎及靈魂與黃泉。由避死之天性進而發生避死意外災難之感。是時人雖未覺其理，且無經驗，因之，見一切外物之變化，皆驚爲神奇，認爲是怪力亂神所致，而悚然生恐怖之心。在當時人類交際中，往往因敬懼息人之怒，遂生敬此怪力以祈免於災害之心。尊敬怪力之事由是漸盛。天照太神之時，始織祭衣，有齋服禮（*Harukoto*）之語。但尙未見有尊敬祖先之事。

祖先崇拜

尊敬怪力之心發生後，因貨財之進步，人心漸生追尋過去身尊重祖先之思想。因追尋過去，不能不據舊日之傳說。舊日傳說，使草昧時代簡陋之人心，發生興趣，恐怖，及偉之大感想。當時既無文字，古代事蹟僅憑口傳；但言語非十分可靠之物，有時不免遺忘，有時失之誇大，有時又參雜以傳述者之臆想。輾轉相傳，以訛傳訛，古事遂愈變爲神祕奇異。聽者習聞此種妄誕不稽之事，亦不生怪異之心；後來竟想像其祖先並非人類，而具有神聖之偉力。此輩先民，無記憶許多事件之能力，只談述當時有威力宗家之事而已。視其祖先爲神聖之子孫，遂又發生自己亦爲貴種之想像。尊敬宗家之思想，經過長久歲月，又傳佈於各地，遂愈益增進。（古代神孫天孫等語，次第流行，足徵此種思想之隆盛）。其後又認其祖先爲日月，以智識不發達之先民，敬日月爲神，故由尊敬祖先之心，而以祖先與日月相混。將創造天地之功歸之於祖先，於是祖先之語漸尊。但尙未有其靈魂在人間且於人生有利益之說。

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由日向國進攻大和國，征服諸國之酋長。當此時也，有可渡軍隊之船舶，有可供遠征之糧食，貨財之情況亦非舊時可比，據吾人今日之想像，其量當亦增加甚多。皇軍不利時，天皇曰：『吾日神之裔也，今向日而戰，故不利，若背日而戰，則利』。又曰：『我皇祖之靈自天墜降，光助朕躬。昔日皇祖所用之寶器，亦尊爲有神驗之物，納於神庫之內。此時已有祖先靈魂佑助後嗣的想像。又由靈魂不死的思想，推而想像祖先之靈魂永在天地之內。但尙未有以靈魂稱爲神祇之事。

所謂『加彌』一語，在太古之時，並無所謂神祇尊敬的意義。伊弉諾等見吳實與岩石有功，稱之爲加彌。素盞鳴尊往出雲國時，見翁姬抱一少女而泣，尊曰：『汝爲何人？』答曰：『吾國津加彌也』。

加彌之意

(國津加彌爾) Kunitsukami, 一稱國津神或地祇, 相傳為天孫族未降臨日本國土時守護國土統治土著之人。神武天皇之舟逆速吸之門時, 有一漁人乘艇而來, 天皇招而問之曰:「汝為誰?」對曰:「臣乃國津加彌爾也」。問其名, 對曰:「珍彥」。(此事見日本書紀)。據此看來, 當時尋常人亦稱加彌爾。故雖有尊敬皇祖之靈之事, 而無尊敬加彌爾之事。加彌爾一語, 當時雖尋常之人, 亦用為自己稱述之辭。此語之具有尊敬之意, 大概是神武天皇以後崇神天皇以前之事。此時習俗始不以往昔自稱加彌爾一辭為自稱之用矣。

農業之發

日本與三韓及中國交易

工兩未大 學士後日

崇神帝以 後神道之 發立

天社國社 與神地神

神武天皇時始建立政府於日本。自此以還, 得貨財之術大進。天皇東征時, 士民猶穴居巢處。歷代天皇皆好耕作養蠶之道, 時時以之傳教於士民。自此國中一般士民, 皆為農民。執鎌而刈豐葦原之菽, 執鋤而摘瑞穗國之穗; 欲得貨財, 已不似往昔之煩勞。人民漸無缺乏衣食之苦。自紀元七百年以後(西歷紀元後四十年頃), 三韓及中國人民始來日本, 經營交易以通有無。(日本國史載稱「入貢」, 其實為交易。往昔琉球至中國交易, 情形亦同, 將所運貨物一部份獻納於政府, 其餘則以之交易而獲利)。當時三韓與中國, 已能製造器物衣服, 且發明利用器械等事。其東渡交易也, 於日本大有利益。日本當時已不感覺食物之缺乏, 故大陸之職工商人, 以及學士之輩, 皆先後渡來, 傳其技術道藝。其後日本紀元二千年頃(西歷紀元三百四十年頃), 日本兵威強盛, 三韓屬於日本, 國內貨財之概況, 亦愈超繁榮。

因貨財之進步, 人心亦得有許多餘暇, 益增加其想像之能力。人心已認定靈魂不死, 且僅加彌爾不在人間, 並想像加彌爾隨天地之種種情形。又由保生避死之天性發生倚賴神祇以除災害之心。崇神天皇時, 國內疫癘流行, 人民死亡大半。天皇深以為憂, 以為是神祇之譴罰, 乃幸淺茅原, 祀八十萬神而求問之。大物主神命侍姬告之曰:「若無敬我, 疫癘必除」。天皇遂遵示祭之, 初不驗, 再三祭之, 疫癘始退。從此又祭八十萬神, 且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加彌爾表現威力, 其尊嚴益增, 漸有與神祇相類

之意義。此爲日本紀元七百年頃之事。自此以後，皇居與神宮分離，神宮稱爲齋宮，又創派遣天皇或親王之女祭祀太神之例。（以皇女祭祀太神之事，此後每代天皇均奉行之，至日本紀元一千零一年宇多天皇時仍繼續）。紀元八世紀之末，皇子日本武尊征伐東國，海北遺風，極難，以爲難風之起，爲海神所降之災。其後日本武尊又逞其威力，征討許多惡神。（日本武尊於廣吹山見大蛇，認爲此蛇爲惡神之使者）。災害之事漸多，神威之廣大愈爲世人所承認。紀元九百年頃，仲哀天皇之死，世人認爲是伴神命而受其罰。神功皇后征三韓，使三韓臣服日本，世人認爲是神意使然。當時所謂之神命，多於夢中由神告之。紀元一千年頃，應神天皇時代，始有所謂「湯起請」之法，以察知神意。其法使大量手於沸水之中以探選，視其手之爛否以決其罪之有無。是即神靈裁判之意。在此時期，神道之勢力可謂已達於極盛的階段。

政府之性質與神教一致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想像當時人心進步之情形。最初全無想像，與禽獸無異。其後由厭死之天性而想像靈魂不死及靈魂必有歸宿。再次又由避死之天性而生敬自然敬怪力之心。再次由言傳之神怪事而生想像其祖先爲神聖之觀念。再次由靈魂不死之思想而想像祖先之靈魂照臨於天地。隨之又以祖先之靈魂爲神，祭之則能除治災害。自此神威愈盛，廟至認爲人間萬事皆受其指揮實罰。蓋當未開化之世，人必尚無窮究道理之能力，風浪忽動，雲霧俄起，皆歸之於怪力之主使，而有所戒畏。及至貧財增進，接觸外物愈多，所謂怪力主使之種種現象，亦視爲尋常之事。怪力之威信雖大減，但幽冥之事猶被人注意；及其注意次第進展，怪力亦應其性質而被視爲神。神之領域，次第登於高尚幽冥之地位，故其威嚴亦隨之增加。信仰之心愈深，神道之基礎愈固。但尙未想像到神在黃泉之中尙有何威力，亦未想像到因現世之行爲有善惡而死後靈魂之歸宿有所差異。（所謂黃泉一語，相當於佛法中所稱之天堂地獄）。故當時人類之想像，尙不能謂爲十分成熟。

當時之風俗

神教政府

自天地開闢以來，歲移世易，人心次第進步，因神道思想之發展，政府亦自然具有神教政府之性質。所謂神教政府，乃神之子孫統治萬民之政府。神教政府性質之成立，並非由於皇室之勤能以及學士之補助；換言之，完全不是真正歷史之傳授，而由於人心之自然趨勢所演成。故神道教之勢奮，人民尊敬天皇之心亦愈盛。當世帝王，雖無綺羅錦綉之美，不藉瓊樓瑤臺之築，而自然為人民所尊崇。其所以然者，蓋由於帝王質樸而能接近人民之故。故當時雖無著者學士為之補助，仍能遠征東國，西越海而征服三韓，置鎮守府於任那，肅慎亦降服。古代征伐，皆天子親臨軍陣，或皇子繼后代之指揮三軍。此時歷代君主並非皆屬聖賢而能勤勞國事。唯以去草昧未遠，貨財亦不豐達，風俗純樸，尙未發生游惰之弊耳。當時最著名之人物，實寥寥可數。人民之中，有野見宿禰，當麻蹶速等。官吏之中，有武內宿禰。皇子之中，有日本武尊。皇居之中，有神功皇后。當時之風俗人情，由此可以想像而知。國威之光輝於海外，蓋非人力物力所致。直至日本紀元一千二百年，所有神道教，政治情形，風俗人情，仍保持此種狀態。

任那鎮守府

倭人傑士

佛法與神道之比較

佛敎之流來

日本紀元十三世紀欽明天皇在位時，有一意外之事件由外國傳入日本，是即三韓之一國百濟獻佛像及經論之事。當時神道勢力雖已盛，但其信仰全存乎心內，並無實思象討論之經論。佛法則不然，撰論精深，經典浩繁。神道諸神之威力雖多，不過僅能除災與害，指示人生行為之吉凶而已。佛敎則不然，苟一心念佛，則可降無量無邊之福報。神道諸神雖有主宰現身罪惡之威力，但對死後之事則完全無力支配。佛敎則講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又謂苟得佛力超度，則可免墮喪之苦。人心皆欲得現身之安樂，與身後之幸福，佛敎之教法，恰能滿足人心此種願望。當佛法初渡來之時，神道曾表示強硬之反抗，恰值當時瘟疫蔓延，疫病流行，國人認為此乃佛敎傳入觸怒國神之故，遂投佛像於攝江，各地並有燒燬佛

神道為現世的佛敎為未來的

寺佛塔等事。但不久之後，佛教勢力即又恢復。此時情形一變，世人認爲饑饉疫癘之流行，乃爲我佛像毀寺塔之結果。在日本十三世紀中葉，神道佛法之爭甚烈，結果佛法黨得勝，而佛教之蔓延遂不可復加抑彌矣。

佛法弘盛後憚憚之性不變

保生而避死，是一切動物固有的天性。人類一切活動，其種類雖多，總不外乎此種天性之流露。人們思積貨財，乃爲保生的緣故。人們想像禍災以作大家的警戒，乃爲避死的緣故。喜怒哀樂之發生，大半起源於得失之心耳。雖其結果仍不能保生避死，然仍想像靈魂不死以慰其無窮之願望。佛法巧合人類此種天性而創教義。佛教之言曰：『欲積貨財於現世，得安樂於生後，應一心念佛，佛能達其願。』又以此爲凡有損害他人生命之行為，則佛知其人之惡行，故佛法又曰：『一心念佛，即得解脫。』當時人智未十分發達，汲汲於求直接之利，因其欲不勞而獲，遂施貨財於僧尼，以祈生後之安樂，因而歸心於佛門者甚多。日本紀元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二百八十二年之間（西歷五八八——六二二），日本全國各地建立之寺塔，凡四十八所，皈依佛法而爲僧尼者，凡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其後建立百濟大寺時，東自遼江，西迄安藝，招募八夫，徵集材木。難波有名之四天王寺，亦於此時建立。此時神道之想像亦進步，有與佛教比倫之概，但純由於自然之發展，無人組織整理之，故尙未成一完整之體系。當其未成爲一完整之理論體系時，即受佛法之攻擊，從此神道之想像遂再無進展。（聖德太子廿七條憲法中第二條曰：『尊教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蓋以此三寶爲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而無二語言及神道之事者。』茲記載當時崇信佛法之一二事蹟於次：據云聖德太子曾於途中逢達磨。（元亨釋書所載）。又謂聖德太子爲漢土僧惠果之轉身。聖德太子之子山背王滅蘇我氏時，有五色之幡般光照於空中（幡般者幡蓋之誤），又聞空中有種種音樂。又謂山背王爲權者之化身。舒明天皇九年，有大星自西流於東之音。時人曰：『流星之音也』，僧旻曰：『此天狗也』。慧星見，曰：『此饑饉之兆也』。他如天堂地獄之

聖德太子
之十七條
憲法

一心念佛
即得解脫

苦樂人及觀音等菩薩等如來、大王、明王、藥師、尊天、地藏、經漢、權者、童子等神聖之想集、皆自此時發生。

政府之性質不變

當時佛教雖如此盛行，但日本政府之根本性質，仍為神教政治。天皇之所以尊貴，因其為神之子孫。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因政府有宗教性質之權威。故神道之勢力愈增進，則國家愈趨安寧。但當是時也，天皇自己拜佛，皇子自己講經論，大臣自己施惠僧尼，政府自己修造寺院，自此以後，神教政府所有宗門之權威，完全歸之於僧尼，天皇失其尊嚴，政府減其權力，不復如從前之易得人心矣。

大臣專橫之弊

天皇之尊威減退，大臣專橫之弊遂生。佛法信徒蘇我氏之政府成立後，天皇有被暗殺者，崇峻天皇。有因大臣不滿意而天皇不能立儲位者（推古天皇）。此外有大臣逼強擁立天皇者，有大臣殺皇子者（穴穗部皇子，宅部皇子，及山背大兄王等是）。至於官吏之為大臣殺害者，不可勝計。但以本民信奉佛教者甚衆，大臣蘇我氏推崇佛教，仍為人民所愛戴。當蘇我氏臥病時，人民為祈禱其恢復健康而出家者，男女共達二千人。人心趨向之變化，由此可見。因佛法興盛而發生之貨財分配變化，雖難得顯明之實例，但因區長寺院之建立，坐食之僧尼日衆，國家費用之大量增加，當無疑義。日本紀元十四世紀初葉，日本已無征服三韓之能力，蓋由於政府內政費用浩大之故。

蘇我氏

國愛膨脹

日本紀元十四世紀初葉，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計滅蘇我氏，政治之情形漸次變為中國的形式。此事應於次節述之。本章大意，至此完結。自天地開闢至十二世紀，神道之觀念次第增加。十三世紀時，佛法自三韓渡乘神道勢力，其影響未能增進，但亦未至完全消滅，朝廷於祭祀神祇之例亦未稍息。故當十世紀世紀時，人心之內，有神道佛法二者存在，由本章所述之事實，可以推斷而知。

天智帝與藤原

政治之中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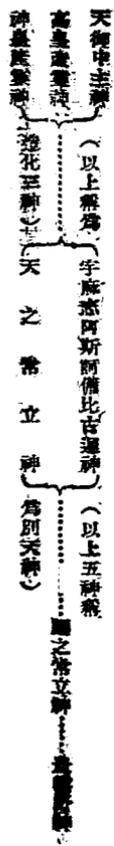
神佛並存

（譯者按）本章所述自神代至日本紀元十三世紀佛法或盛時之日本文化概況。日本史家稱神武天皇東征以前之各神代時代為神代，蘇我氏之年代，即神武天皇東征之年代，亦無定說。東征之後，就都於大和，即帝位。日本史家稱為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紀

神皇正統記卷之三、御理歷紀元前六〇年。神代通曆壬子七年。木書所載之日本紀元年代，可俟再考。

(註一) 攝化之神。在神代和中，卷雲野神以游雲神，因為單鳥，故謂之攝化之神，其從前神，故為古攝化神。

左



第二章 自漢學渡來至京都政權之衰微

外物之感
化
風俗政制
與人心之
相互關係

上古之武
勇與中古
之文弱

外因之分
析

春日清晨，霞霧彌空，含露的楊柳因而吐綠；秋日薄暮，微風習習，帶霜的楓葉因而添錦。凡物為外物所感染，未有不變其狀態性質者。唯人亦然。衣服飲食之能變化人之狀態性質，固不待言；風俗政制，亦能使人心發生大變動。（中村正直先生所譯立志篇中有云：「政治為人民之心之還射。苟人民之心野，雖善政治亦必成爲惡；苟人民之心明，雖惡政治亦必成爲善」。此固有一部份道理。但因政治惡而人民之心成爲惡，亦不乏其例。韓子有云：「吳王好劍客而百姓多癩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可見風俗政制之善惡與人心之文野，是互相影響的）。上古之世，其政簡易，其俗勇壯，故絕不見文弱遊惰之人；有日本武尊神功皇后之武功，實不足怪。自中古奈良朝以來，文弱之風次第蔓延，迨至平安朝以後，其勢更盛。在此時代，有原平業，深草少將，清少納言，紫式部之類人物，出而顯其特長於當世。此時與上古時代相距已遠，人性之變異，實有宜然。此與隱能增加楊柳的嬌姿，霜能爲楓葉錦上添花，其理由初無二致。此種理由，即著者在本文中所要闡明者。

漢學弘盛後之事件

文學之發
生
文學之衰

漢學之傳入日本，爲時最早。（註一）自與三韓交通以來，文書往復，即完全以漢文得意。然當時漢學在人心上發生之影響甚少，故著者在前章中亦未述及。及至漢學傳入稍久，在日本社會遂發生若干事件。大概言之，第一爲文學之發生，第二爲政府體裁之變更。茲先論述文學方面的情形。在漢學未渡來之前，日本完全未有文字，（註二）古事記的序文中亦有「舊辭」之語，而不見記載「舊史舊書」之事。日本書紀中記有「教教」一書，係十三世紀推古天皇勅撰，但此書亦係以舊辭記載者。由此觀之，日本古代並無文字之發明，百事皆以言語相傳。漢學渡來之後，始直接採用漢字書以記其言傳之事。古事記，萬

萬葉假名
片假名
平假名

政府體裁
之變化
神武帝以
來文武官
無別

政府如一
大莊屋
免稅邊都

拜外思想

日本人
之
模範性

遣唐使及
遣唐使

葉集之類是也。以漢字音記日本之語言，稱爲「萬葉假名」。其後十五世紀之初，吉備真備始作片假名。十五世紀之中葉，僧空海始作平假名。自文字創始之後，日本始有文學產生。從此始有書籍，也始有文人學士。

茲再述政府體制變更之事。因政制變更而使風俗人情發生變易，亦將於此處詳述之。自神武天皇以來，歷代天皇之政府組織，都極簡樸。文武官吏，並無差別，天皇君臨其上，自統萬機。以現在語言來作比喻，當時所謂政府，有如一個大「莊屋」（日本村正辦事處），官吏數目甚少，年貢之收納亦極輕。據舊史所載，古代天皇時有免征田租之事。又古時天皇時遷都，因官民集居於葦葦之下者甚多，都城所在之地，日漸繁盛，不能容納，遂不得不別建新都也。由此可知上古時代政府極簡樸，都城遠不如現在之大，居民亦不如現在之多。

唐制之模倣

自與中國發生交通之後，日使彼國事物之華美與夫政治之驕奢，日本朝廷因其小政務實素而簡單，自覺恥愧。凡人皆有求其思想與衣食進步之欲望，見有比自己進步者遂生模倣之心，是乃源本避死保生之天性，出於濃厚之保生的要求。故凡寡聞之欲做博識，貧賤之欲做富貴，均出自模倣之心理。今日開明諸國，亦有此同樣之現象。舉凡特殊之技術，最初皆爲一人所發明；及其發明之後，餘皆從而模倣之，遂致普遍流傳。日本國民，常自誇其模倣之能力最敏捷。自與三韓交通以來，聞聲慕名，而與其國親善。及見其風俗，遂從而模倣之，後來遂有完全捨棄自己的一切而移他國之政制風俗於本國之勢。當蘇我氏尚握政權之時，初遣使者至中國，稱爲「遣隋使」。其後中國改朝曰唐代，日本政府仍歷代遣使至唐，稱爲「遣唐使」，以實際觀察其國之情實。其後又派遣留學生，使學其文學，研究其政體。此輩遣唐使及留學生，習染中國之風俗，返國之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服，吟唐詩，說唐話，意氣揚揚，百事皆慕唐式。

漢學博士
生與佛法
僧學生

勸學田

寺領

八省八官

留學生等對於漢學皆努力傳播。當此羣意氣焰耀於朝野時，佛敎方面亦派遣學生至唐修其技術。此輩佛敎徒精研佛說後歸來，亦表現奇怪之技術，並在四方說教以惑嚇朝野之士。當時殿上殿下人等，爲此輩博士與僧侶所煽動，舉心模倣。自己既無分別的能力，無論何事物，但來自唐朝者，靡不稱爲神奇。因此，中國儒學與佛法之惡澤，亦同樣傳入日本，蔓延於全國。朝廷即三禮儒學之賜，勸學田（於漢學者，重用其學生之三善清行之封事中有云：「朝廷以罪人之家產，遣前國所獲郡之官田一百五十餘町，由城國久世郡之谷田三十餘町，河內國茨田澁川兩郡之田五十五町充漢學生徒之食料，號稱勸學田」）；寺寺領於佛敎徒，以厚資僧侶。當時人民如何貧苦，朝廷未暇過問，唯一心於政府早日完美化是務。彼輩雖亦設法欲使人民始唐朝之富足，但首先偏重者爲如何能將朝廷裝飾成爲唐式的壯麗。於是廢除莊屋政府，新置八省，天皇不復親聞萬機，委政大臣。又任命許多官員，賜給許多俸祿，定唐式衣服爲官服，定官階，定服色。（大興土木，建築皇居，於四方建十二門，兼曰陽明門，祿賢門，郁芳門；南曰美福門，朱雀門，皇嘉門；西曰談天門，藻壁門，殷富門；北曰安嘉門，偉密門，達智門。殿亦稱爲紫宸殿，清涼殿，灌明殿等），事事皆模倣唐制。日本紀元十四世紀之初至十六世紀之末，（桓武天皇時）政府之目的可云完全在於模倣唐制之特點。自此以後，政制日趨至備極政府亦益龐大。然政治之施行非常遲緩，已不如古時簡單政府之敏捷矣。

朝廷發生遊惰之弊

模倣唐制而建立如此龐大的政府，當時究有何種作爲？三韓已非日本所有，外人之外來日奉養甚少，蝦夷復時有不穩之事。幸國內無他戰亂，四方平靜。在此泰平治世中，置八省，定十三階，徒見政府之擴大，浪費國帑，毫無益處。雖有學者，與人民之智識程度相去太遠。（三善清行之封事中有云：「大學習生，有白頭而不爲世用者，饑臥於簷水之溪。學漢學者，歸故鄉稱學者，難以營生」。蓋與當時人民之智識程度太相懸殊也）。官吏雖多，而可辦之事則甚少。如此模倣唐制，造成不適合當時人民生活

百官同居
縣事

漢內泰平

遊惰之習
增進

古代人不
注重品行

文弱與人
倫不正

萬葉集

唐詩之影
響

勞動之情

和歌與人
心之關係

狀態之政府，許多殿上人，無聊苦悶，日以講求消遣慰藉爲事，欲風俗之不渝於遊惰不可矣。

日本古代風俗，本不注重人倫。及至遊惰之風增進，人倫更爲不正，爲害於社會者尤大。人倫正邪之觀念，在日本古代，並不重視；至於品行一事，雖曾聞聖賢之言者，亦不講求。但因武勇之氣甚盛，故其禍害尙未表現於社會。儒學渡來之後，先哲之訓誡，未能使人心有所感動，至佛法輸入，說無常，講火宅（煩惱世界），因而使古代遺傳之武勇風氣，日漸消耗，人心益趨柔弱。此等柔弱之人，雖常席豐履厚，奔走於偉大朝廷之上，但對於人倫之事，既未有所改正，而遊惰之風，則變本加厲。十五世紀奈良時代之朝廷，亦不免受人倫不正之責。此事實以肉食帶妻之僧侶，爲倡導之先鋒，當時朝廷不但不能制止，反以長遊惰之弊風。

和歌之盛衰

當朝廷發生遊惰弊風時，人心之情形如何？以和歌發達一事即可推知。和歌之起源甚早，神代時卽已流傳。但至中古奈良朝（日本紀元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中葉），名人輩出，撰萬葉集等，和歌始盛行。查和歌內容，亦因薰染佛說而其達情始臻巧妙。古之和歌，雖多描寫戀愛，但仍帶古代質素之風。中古時代之和歌，如「阿字無浮世」，「陽炎之身」，「消露之命」等詞，均帶有歌咏無常之思想，其情境之高超，蓋得之於佛教。（後來和歌作家，如業平，俊成，定家等人，皆學佛說，而以佛教義理傳入和歌之中。僧侶之中，亦出許多歌人）。其後和歌又加入唐詩的風調，發生一種新變化。其例甚多，不勝枚舉。吾人仔細研究和歌之體裁，可知和歌者實係合日本古歌，佛說及唐詩三者而成。至於融合此三者之後，和歌具有何種性質？此亦吾人所應探究者。和歌之對象，不外乎歌人對於所見所聞之事物，情然而生憐惜之心，因從而歌咏之。此種睹物感事，低徊宛轉，若有不能自己者，可解之爲憐物之情。此種情感，若非不勞勸而富於衣食者，不苦思力求而心多餘暇者，柔弱而恬靜者，乏理智而富於癡情者，則絕不十分旺盛。和歌自奈良朝以來自漸興盛，則當時殿上人已發生柔弱之病可想而知。蓋歌由心

發其歌可知其人心，同時又有使讀之者趨於文弱之傾向。（巴克爾氏著《英國文明史》論第五卷中講文學宗教等雖發自人心，但無化人心之力。余不信其說。故余謂和歌有化人心之力。）⁵古學集序文中講和歌有云：「使目不見之鬼神墮泣，和男女之情，慰猛夫之心……」，確是事實。已經墮入遊惰之途之文弱男兒，讀之當然更受感動。

平安朝之情形

奈良朝開始模倣唐制，人心即陷於遊惰之弊。平安朝模倣唐制，已經成熟，遊惰之風愈盛，自不待言。況平安之帝都，多幽美山水，薰霧霞而玩好花，踏錦履而採紅葉，公餘之暇，不乏閒情逸致，足以慰藉心懷。因此，自遷都於平安之後，遊惰之風更盛。舉凡文學，文字，以及其他技藝，日趨靡麗而柔弱。律（註四）令格式，（弘仁格之序曰：「國家制法之始，爲聖德太子之憲法十七條。其後天智天皇元年劃令二十二卷，世人所謂近江朝廷之令是也。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藤原不比等撰律六卷，令十一卷。養老二年不比等又撰律令各十卷」。是即今世流傳之律令。所謂「令義解」者，因律令多爲漢文，故需以和文解其義，是即「令義解」。及至兵農劃分之後，令仍未改）及歷史及文集等次第編撰成立。自此以後，政府之威嚴更甚，組織更擴大，人民與政府之關係更形隔絕，而朝廷遊惰之勢，亦更進步。

人民與政府之關係
藤原氏權
權及莊園
增大
由保生而
樂生

至藤原氏權權於廟堂，擴張其族勢，（自日本紀元十六世紀初葉始），門閥之勢遂盛。時莊園之領主日多，文弱之風習更盛。蓋因文運進展，保生之天性次第增長，遂養成「樂生」之心，再進而發生預立生計之念。人類希望之心既生，遂欲竭其智識以積貨財。當時朝廷人士，只知注重於使身心快樂。秀才佳人，充滿於朝廷之中，日以吟詩酬和爲事。（清行，文時，直幹，融等人，皆爲吟詩酬和之能手）⁶閑暇時之消遣，則有和琴（自神代時傳來），琴，箏（日本紀元一千五百三十年清和天皇時由唐傳入），笛，笙，鞠，香（香爲天平年間由百濟傳入），碁，雙六等。宴則有曲水宴，賀則有紅葉之賀，樂則有青海波，柳花苑等。餘興則有今樣，催馬樂等。皆由朝廷中之秀才佳人，自己歌舞彈蹴，以

貴人遊樂

政務委之下官

貨財之利爲門閥官吏所壟斷

加持祈禱

誇其技能。而尤以和歌爲最盛行，各變其趣調以競優劣，有菊合，結合，根合，豔詞合等。當時又有五節之舞姬（始於天武帝時），采女之制（始於仁德帝八十七年），九重之樂，悠揚於玉簾之內。奈良朝以來之文弱空氣，僅流行於文人學士之間者，至此則爲朝廷公卿之士所激揚，傳於宮廷之內。彼輩出則乘牛車，入則侍天子。平安城內，風雅好色之徒，以及騷客詩人，幾乎觸目皆是。彼輩玩月賞花，惜景憐物，以至於傳達戀情，則詠爲和歌，互相酬答。自此以後，凡關於實際之事務，貴人們都鄙夷不屑。兵刑錢穀，本政府之大權，則使下官處理之。

在此風俗浮奢之時，貨財情況較舊時爲發達，固不待言。但生產者不得其利，悉爲門閥之官吏所侵佔。彼輩得貨財既不勞力，對政治上之事亦不勞心，故其智極少，其念極偏。彼輩既擁有豐富之財貨，則怕死之心甚重，又因智識短少，故極易爲事物所恐駭。有些微疾，彼輩則認爲非妖靈之作祟，即天磨之降災，必召僮侶神官，向惡魔作祈禱或加持（密咒），以求退病。又有咒咀之事，以及變生男兒之法等。此時神道佛法漸趨融合，本地（註五）垂跡說甚流行，故祈禱咒咀等事，與神道佛法均有關係。其後鎮內訌，防外患，亦仰賴神之威力。尊崇含怨而死者爲神之習俗，亦自此時始。（此時（註六）租稅極重。白雉三年，即日本紀元一千三百零七年，詔曰：『每地一段納租稻一束半，每町納租稻十五束』。令義解中有云：『每段納租稻二束二把，每町納租稻二十二束』。弘仁格中所定稅額，即日本紀元一千四百七十餘年之稅額，上田一段納租稻十束，中田八束，下田六束，下下田三束。稅額當實收五分之一，可謂重矣。據佐藤信淵著農政本論所載：承平天慶年間，——即日本紀元十六世紀之末葉——至保元平治，——即十八世紀之初葉——，租稅爲七公三民制。此言出於何書，不得其詳，但由此可見當時爲政者奢侈過度，因而租稅奇重）。

各國人民之情形

都鄙之對立

都內情形，已如上述，都外情形，則完全與此不同。全國各地之豐饒的莊園，爲富者所領有而不出

不檢之
莊園

西國之文
利

關東之武
勇

血脈與貴
賤道與
人材名利
與政派

佛法在門
關關外

租稅。(神皇正統記中有云：)所謂功田者，是古昔依功之等級，分爲大土中下四坊，而頒給之田。其數都有一定。大功世襲其功田之賜，其次或傳之三世，或傳之孫，或止於其自身。朝廷之治天下，不專治國郡而已，亦未指定國內某某地域爲不納租稅之地。各國設有守，各郡設有領。一國之內，皆遵國命而治，故無背法之民；朝廷考核國司之行迹而有賞罰，故天下之事，指掌而易行。時諸院諸宮，各有封地，親王大臣，亦有封地，此外又有官田職田，皆賜以官符而僅收其正稅。但均不得干預政務，各國之政務，由國司掌之。(中略)迄至中古，莊園漸多，皆不納租稅，國家政治至此紊亂。此等莊園領主及預所(領主在京都預所以代辦其事務)，自己並不耕種，專嗜弓馬鎗劍，力求心膽剛強，身體壯健。對於政治的希望，第一在得功勳，以求揚名起家。京都以西諸國，水行有舟，陸行有車，交通便利，易習染京都之風氣。關東諸國，距京都甚遠，不僅未染柔弱之弊風，因時有戰爭，武勇之氣，自古即盛。父死子繼，主斃而臣仍勇猛向前。坂東諸國，壯士武夫，振臂固拳，世居其地。

上有門閥之弊下有黨派發生

自門閥之勢盛行於平安城時，以血脈論貴賤，以歌道判人材。及至文弱之大宮人等握特權於廟堂之上，遂在民間次第樹立黨派。蓋慕名好利，乃吾人固有之天性，無賢不肖之差別。(是亦出自保生避死之天性)。最初有名利者，在政治上並無甚大勢力。歷時漸久，賭生命競重賞，冒矢石求功名之武夫，因門閥之風阻其進路，政權爲柔弱之主所把持，遂生趨附之思。彼等蟻附於名利所在之地，遂集成強大之黨派。當時勢力最大者爲佛法黨及武夫黨。茲述兩黨之情形於左：

佛法黨之情形

佛教原無門閥之弊習，在朝廷中，無論血統與人品，一律崇奉。許多人傑，寄身於佛法而顯其器量。迨佛法之勢力既盛，剛勇武夫之犯罪者，與恣惡少年之無地容身者，投歸佛門，則可免其刑罰。自此以後，佛法始帶有黨派之性質。及門閥之勢盛行，官吏因怯懦之心而尊崇佛法，施惠佛教。各國有氣

節勢力之人，亦多歸依佛法。八宗因此張盛。(三)論宗於日本紀元一千二百八十五年由高麗僧惠灌弘之。唯謙宗於一千三百二十三年由河內國丹比郡僧道昭弘之。律宗於一千三百九十三年由漢土僧最澄弘之。眞言宗於一千四百六十六年由讚岐國多度郡僧空海弘之。禪宗於一千七百七十四年由備中國僧榮西弘之。臨濟，曹洞，黃蘗爲其分派。淨土宗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由美作國僧源空弘之。其後日本又有一向宗與法華宗繼起。一向宗由平安僧親鸞弘之，法華宗由安房國長狹郡僧日蓮弘之。其爲十宗。各宗弘發之人，雖出身微賤，但朝廷仍重遇之。其所學習者爲孫文學，窮性理；其職掌爲教導人民。因其受朝廷之尊信，故威力逐年增加。就佛教之內部情形言，彼等領有許多之土地而自行支配之，養有百萬之僧侶而自行懲罰之，自行推選首領，自行創立規則。又時新修寺院，建立堂宇，捧勸進帳受奉加於十方檀那，(奉加皆功果也，檀那者施主也)，以籌其費用。在佛法黨統治範圍之內，大有玉化以外之獨立國之概。日本紀元十七世紀之末，關白派遣延歷寺之座主，山徒不服，遂有所謂「嗽述」之事發生。佛法黨從此常蓄軍馬備甲兵，少有不滿意之事，則以三千僧兵，奉神輿而嗽述於朝廷。嗽述之事，時有所聞。當時勢力最大者爲延歷寺，園城寺，東大寺，興福寺等。各寺相嫉，時復互相攻擊，又有與武夫黨鬥爭之事。

武夫黨之概況

復次，請述武夫黨之概況，武夫黨雖不如佛法黨之自由，但因當時風氣所趨，全國各地皆有該黨之黨羽。此亦大概爲門閥弊習所致。天下政權，在武夫黨視之，無論何人皆可掌握，豈僅限於藤原氏一族之人。但各國有膽力之武夫，因其動作粗野，爲一般士大夫所鄙視，賤稱爲「夷」。即使材堪將帥，因其司掌實際之事務，在廟堂之上亦爲人所不齒。當時鄙視武夫者，乃是一般毫無用處的文弱之士。因此，武夫黨不甘於雌伏，在日本紀元十六世紀末葉至十七世紀初葉，武夫黨有羨慕名利而欲奪取政權者(平將門，藤純友)；十七世紀之中葉，有私弄兵相戰者(平維衡，平致賴)，在同世紀之末葉，又有

叛亂者（平忠實），及至十八世紀初葉，有前九年之亂（安倍賴時，安倍貞任之亂），其後不久，又有後三年之亂（武藏，源家衡），在此一世紀之中，幾有不息之亂，而起兵叛亂者（源義親）。此等武夫黨之亂，時起時伏，如浮雲過空，影響所及，有危及朝廷者。此時一部將校之世享特權者，稱為將家；唯將家之得武夫心者，能鎮定武夫之亂。蓋武夫何以必須從屬於將家？則以當時朝廷對於武夫毫無處置之方，武夫若不依附將家，即無由致顯達。將家既得武夫之信從，又因屢為朝廷鎮定叛亂，故其黨與愈盛。黨於將家之武夫，完全依賴將家之存在，自己始能隨之而得恩賞，傳武名。武夫與將家之關係如此密切，經時既久，遂自然演成君與臣之情勢。武夫自稱為將家之「家人」，以某將家世代恩顧之「良黨」（亦作郎黨），彼此誇耀。雖遠達各國之武夫，亦皆願為將家之家人良黨。自日本紀元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許多小武夫黨，完全為將家之黨派所吸收，仰平源二氏而自求顯達。因此，在六十餘州之內，小武夫黨完全絕跡。

政權移於東國

上述之佛法武夫一黨，其名雖異，但就其性質而言，皆為武勇之強黨。當此等大黨派次第集成之際，朝廷仍固守閉關之舊習，耽於春宵秋夜之榮華，追求花月下月前之慰藉。及至彼勇敢的武夫惡僧集成強黨之後，一般文弱之大官人亦感威脅滿門閥弊習之政府。此種政府豈能保持長久？但此政府並非為強黨所破，而實自己內部先呈崩潰。日本紀元十九世紀之初葉，因人倫不正而發生皇統之爭與戰禍，層出不窮。新莽君姜誣論當時之戰亂有云：「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君不君，臣不臣」。此時之戰，稱為「保元之亂」。

在保元之戰中，源平二黨大立功勳，文弱之士，毫無能為，充分表現其為冗官。朝廷之威權亦不能再抑制黨派。源平二黨得勢之後，互相傾軋，結果遂開戰端，史家稱為「平治之亂」。在此次戰爭中，源氏黨失其首領，黨羽散佈於各地，不復統一，平氏黨遂完全占有政治大權。

非平氏之人不得爲

源氏統一
東北武夫

政權移於
東國

平氏既得武夫之心，遂以其勢力佔有政權，其勢一時如火如茶，生殺與奪之權，全歸平氏掌握。六十餘州之中，半數爲其所有。於是彼輩文弱之士，或被逐出朝廷，或被流放，或被處死刑，悉以平氏之子弟繼其官職。後來竟至幽閉法皇，逼天皇禪讓。當時之評平氏者有云：『非平氏之人不得爲人』，可見平氏之強橫。平氏一門既獨佔政權，驕奢淫佚，遂漸感染藤原氏以來文弱之弊。其族人多寄心於詩歌管絃之末技，不久之間，遂與藤原氏一流人物，如出一型矣。

當平氏衰弱之時，東北勇壯之武夫黨，再統一於源氏之旗下，揭打倒『驕奢平家』之名，以振源氏之家聲。於是筑波之野，旌旗飄揚，越路之山，甲冑輝映，指京都而進攻。平安城之人，驚惶失措，駭爲目不能見之鬼神，何能與之爲敵！衣冠劍履，東西散失，粉面皓齒，路傍倒斃，不出一二年之間，遂被逐出都內，與西海之水沫同歸消失。此爲日本紀元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之事。推其失敗之原因，蓋由於模倣唐制，擴大政府，無事而增設官吏，無益而發展事務，遊惰之氣，次第增積，官高位尊之人不問國事，廟堂之上成爲詩歌管絃之戲場。嗚呼！如此政府，豈能久哉！政權之移於東國，蓋不能歸罪於一二庸主凡相矣。

（譯者註一）漢學傳入日本 日本與大陸之交通，發生最早，我國文化久已由朝鮮傳入彼國，唯確實年代，史無確考。漢學傳入日本，其初見於史籍者，爲十五代應神天皇時代。應神天皇十五年（晉武帝太康五年，西歷二八四年）八月，百濟王阿花遣其臣阿直岐獻良馬於應神天皇，阿直岐奏漢學，阿直岐奉獻孔子徒之學。天皇問阿直岐曰：『汝國之博士，有較汝爲賢者否？』阿直岐答曰：『有王仁者，是汝邦之最賢者。』天皇即遣差田別巫別尊位王仁。翌年二月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禮記子儀本學，傳漢書經。漢學自盛。

（註二）日本文字之發生，古本亦無文字，僅有語言。漢學傳入之後，始模倣漢字而造字。古語拾遺書云：『蓋聞上古之儀，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首往行，存而不忘。』又日本古俗，有『言纏語縷』之風，日本古來又自以『言纏之國』相誇，纏足爲證。

（註三）殿上人 四位五位及六位之公卿，許其昇殿者，稱爲殿上人，亦稱雲客，役世又稱爲堂上。

(註四)律令格式 令爲制度之根本，相當於今日之憲法民法刑法等主要法令。律爲正刑定罪之依據，類似今日之刑法。格是在律令規定之外因其時政治上之需要而頒佈之法令。式是將令中所規定之事更細審的規定，有如今日之施行細則之類。統稱爲律令格式。

(註五)本地垂迹說 日本中世以來儒徒之一派所倡之神佛混合說。本地者，無始無終絕對的佛之稱。垂迹者，現化其間而漸垂降臨之義。此說以佛爲現化於人間而濟世樂生，則顯現爲神；故日本之神祇，苟尋其本源，皆爲佛菩薩，神佛本爲同一。

(註六)租稅之制 凡田畝三十步寬者，二畝爲一段。十段爲一町。一步爲高麗尺五尺。每稻一束，約可糶米五升。七町爲一聚。七公三民者，耕種之稻，以七成爲稅，納國賦，三成歸農民得之。

卷二

第三章 自封建之權輿至鎌倉幕府創立時之地方情形

倫理上之情論

閑與快

自己之行
爲與他人
之喜怒有
因果關係

經驗進步
與私利心
之發達
與獨心之
起源

在一個人之幼小時，因識別善惡邪正之心尙未發生，其視毆擊他人及奪人財物之事，如對草木禽獸然，茫然無所介意。當此之時，見他人之喜怒，心中無所感動，因此亦無喜或怒之觀念。但心中有快與悶之感覺，乃人之天性；因此凡他人之加諸己者，未有不發生快與悶之兩種感覺。（凡保生者爲快，近死者爲悶，故余以保生避死爲人之天性）。其後經過屢次實驗，凡他人之加諸己而發生快感者，或他人之加諸己而發生悶感者，常於其面上之表情知之。從此始了解怒顏之可懼，喜顏之可悅；見其顏色，立即發生泣或笑之情感。如此又經過屢次經驗，始悟他人之喜怒，非起於偶然，常隨己所加於彼之行爲的性質而發生不同的反應。然以何行爲而使彼怒，以何行爲而使彼喜，則尙未知其詳，只常常以窺他人之顏色爲事，往往觸人之怒受其懲戒而後有所追悔。最後自己心中始能判別自己行爲之中，某一種必使人怒，某一種必使人喜。但人類謀私利之心極重，不以他人之憂爲憂，他人之喜爲喜，而只爭求自己快樂與福利，更不知使人喜爲一種善舉，使人怒爲一種惡舉。

至經驗次第進步，其謀私利之心亦擴大，飲食衣服必求其美，父母兄弟必欲其無恙，甚至親族朋友以及不識之人，凡耳目之所及者，都不願其有不幸之事。見人陷於可憐之境，則不惜靡頂放糧以救之。此種行爲，並非不顧自己之損失，但見他人之可憐，若不救之，則其心中之煩苦，較損於自己者爲大。此即倫理上情之起源。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發展成熟
之私利心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所謂不忍人之心，乃見可憐之狀態而生厭惡之私利心。欲親族之善美服，與欲自飾之心，非同物也。（孟子謂由此種心理，可推知人性本善。此說余不能服。何也？因此種心理亦爲惡之淵源故）。故倫理上之情，乃發展成熟之私利心。此私利心幼時蓋未發生，及自愛之心成長，境界愈擴大，感情愈盛旺，最後乃發生不使他人憂而使他人喜之心。

惡與善

私利心如此成長之際，世人乃目擊其行爲而一一加以批評。其行爲使他人蒙損失而自利時，世人貶之曰：「此惡舉也」。蓋彼自己亦恐善將及於自身，不喜見他人蒙受損失之可憐狀態也。苟見其行爲損失自己而利他人時，則世人褒之曰：「是善舉也」。蓋彼自己亦望得此幸事，喜見他人之所喜也。於是

勸善懲惡
之教
良心與情
斯賓塞

乎人始知使他人憂者爲善舉，使他人怒者爲惡舉。是爲倫理之特在人心發生之起源。因善舉有榮譽，惡舉有恥辱，在人類社會中漸漸樹立所謂勸善懲惡之教。世之識者，嘗考究人心，以爲利他人之心與利自己之心，有如水火之不相容。稱制止惡行之心爲良心，制止善行之心爲情欲，此二種心均存於吾人之腦海，雖有大智之人，亦未能以倫理之情與私利心同視。斯賓塞氏曰：「倫理之情，本爲私利心，因積屢次之經驗，故其性質始變。蓋以經驗而懲戒其心時。其神經之構造，必發生性質之變化，因而遺傳其子，子又加以經驗而變其性質，再遺傳之於孫，子子孫孫，如此相傳，後來竟如不由經驗而來之一種獨立之稟性，成爲一種觀念，如不基於一人之私利心之經驗者然」，（因爲在屢次經驗之中救人皆得利，及至子孫，遂有不計利害而救人之心）。洛伯克氏駁之曰：「父祖之經驗，成爲一種特性而遺傳於子孫，經驗愈累積愈深，應是難於辨明正善與私利之大異矣。但無論經驗如何累積，不至視私利爲正善，可見二者原有根本的差別。吾人認爲正善乃人之義務，人之德義，故立爲教義，使人知正善與私利之不同。若正善常合於私利，吾人如何能賞讚義務與盛德耶？蓋因人智之進步，始能辨知私利之行爲與雖非私利而可使人喜之行爲之區別。此乃私利與正善義務之思想發生的原因。至於正善之思想，與其說是得自遺傳之性，勿寧說是基於幼時之教育者爲多，故余認爲教義爲正善之起源，私利爲計較之尺度」。

洛伯克

(見洛伯克著開化史源論三頁七十五頁)。

上述斯賓塞之說，雖以私利心說明倫理之情，但彼認爲不忍人之心之類的人情，完全出於人之天性，與私利不能一致。因此，彼又創立是乃父祖以來私利心之經驗累積而非基於一人經驗之說，致引起洛伯克氏之駁論。洛伯克氏以教義爲正善思想之起源。試考所謂教義，不過是一種品行邪正的「世論」。此種世論，並非有之而社會人士之利益即不受害，不過因有之而倫理之情始增進耳。同樣，非因有善惡邪正之評判而人皆救人，其救他人者，乃因其有不忍見人不幸之心耳。此不忍之心爲何？即人各愛其所之物之私利心是已，亦即愛親族兄弟朋友之心是已。所謂孝與悌之心，本來與私利心同爲一物。人類心中，豈能有二種不相容之物？一切都是私利心之成長及其發展而生之枝葉，不過枝葉之中，有互相抵牾者耳。但推其本源，未有不是同自一根出者。總之，倫理之情，爲私利心之枝葉，善惡邪正之思想，得世人之評判而後發生。

故善惡之教，發生於社會之評判，其所謂善，非對於作此行爲之人有利，乃是受此行爲之人有利。其所謂惡，非對於作此行爲之人有害，乃是受此行爲之人有害。發生行爲之人之利害得失，於論善惡時，嘗不列於計算之中。(故曰仁者不富。又曰殺身爲仁。蓋目的在於利他，故以損己爲善)。故若利害得失不影響及於他人，則不能謂之善，亦不能謂之惡。就社會情形而言，恐無謂商人爲善人，亦無謂農業爲惡業者。而社會上人士所操之業，多爲此種不被評爲善或惡之業。施惠於人之事，是於受之者有利，其人雖未受，但有受之之傾向，則世人亦必評此施惠者爲善。但若就施惠者與受之者的利害合併論之，則施惠之事，對於社會未必有利。幸世人未汲汲於善事而捨其私利，此乃人類社會至今日猶益臻繁榮之故。此種思想與本文所述世態人情之變遷有關，故揭於本章之首，以供讀者之參考。

中古國郡之制及兵制之變遷

武夫黨附從於源氏族下，攻敗平家，遂於西海之濱，奪平安朝廷之政權而建立鎌倉幕府。此武夫黨

大小名之
逐條

得勢之後，其情形如何，茲述其梗概於次。彼等各領無數人馬，佔領各處莊園，在東國方面，成爲許多封建領主，稱爲（世一）大名小名。此時在日本各國之內，未有無此毫族之地者。試考大名小名發生之原，大概是由於國郡之政不得其宜，在唐虞啟唐制，改國遠縣主之制（據舊事記所載，古代國造之數凡一百四十四，其真偽不詳），以國司守介統治諸國。（日本本于六十六國，合對馬壹歧共六十八國，分爲大上中下四種。定國守之任期爲四年。諸國之守司，延壽每一年，中國每二年，遠國每三年，奉朝一次，以勘定正稅公廩等事。由執筵之勳爵由使勘核之，核畢給予『解由』，以證明審查無誤也。新制既立，國司守介之權限備於簿畫事務，至於兵馬之專，則完全不問。（國司亦掌管兵馬之專，僅造兵士之名簿二冊，詳註征防運使之場所，及註明貧富上中下三等，一冊留置於本國，一冊通至兵部省。有征討或上番之事時，國司據名簿，以次派遣。又併勢之範席，美濃之不破，越前之愛發，稱爲三關，三國之國司有守固之任。其後僅陸奥守兼鎮守將軍。及主游清之繁漸盛，在朝之貴族，多不願擔任民事，離華奢之京都而被派遣至鄙野之國土。日本紀元一千四百九十年頃之廷議有云：『堪任國守者不可多得，若得一良守，則當使之兼治數國。僚屬之中，有願任者，亦得依其願願而任之。其新就任者，應特別習見，喻以治民之方。苟無厚祿，則其人不可勤勉奉公；不勤勉奉公，則治績不舉。』其後『三善清行之封事中，又有請停止因諸國吏與百姓之控告或訴訟而派遣朝使之文。（其文中有云：『朝使到國，不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是非，僅依其朝使之儀式處理諸事，偵其印鑑，嚴其禁錮，以官長之貴，與小吏賤民比肩而辯論，受其鞫訊。若離對之賸有絲毫之誤，立即加以縲紲，囚諸囹圄。雖控告之事，皆非賈賈，而威權已廢，政令不行。其鄰境之百姓轉相見聞，亦各輕侮其官長，不肯服其政教。舊化之源，莫甚於此者』。據此種論旨觀之，非爲人民而設國司，乃爲國司而養人民也。是蓋附權威與重祿於治民之官，僅求爲官吏免除所不喜之事，而未會爲民謀福利也。因此，諸國之守介，築城柵爲邸宅（最初或者是因爲盜賊之多），所謂僚屬良黨之輩，乃趨走其邸宅，於治理政務之餘，兼贊助長官之私事。其未受

獨佔之者

兵制

兵農分立

亂國司之衆

武夫之集

官職之子弟等，時立於僚屬之上，干預公務。守介所治之國，稱之爲一獨佔之封國，亦無不可。（朝廷派遣官吏，使治地方，因給與權威，而弊害如此之大。現今地方分權之論甚盛，余恐誤解此論，演成縣令權威龐大之弊）。所謂治民之制度尙何有哉。又當時之兵制，分一國之壯丁爲三部，使某一部講武，（持統天皇時分一國之壯丁爲五部。其後始改爲三部），一年守京，二年守防，稱之爲「上番」。（守京者稱爲衛士，守防者稱爲防人）。服畢上番歸鄉後，即不再應兵役之徵。當時海內人民，均願兵役，但末成爲武夫。奈良朝之末，屢發大兵征討與羽地方之叛民，朝廷始知兵貴熟練，新募者魯鈍不堪用。日本紀元一千四百三十年頃（光仁天皇寶龜年間），廷議決定淘汰冗兵，殷富之民，其才堪弓馬者，使專習武藝，以應徵募之需。自是兵農漸分，武夫遍於各國，軍馬之事常爲此輩所負擔。坂上田村麿，文室綿麿等率以征東國者，卽此種人也。當武夫服務上番之際，雖有兵部之將士統率之，但及其歸國，與百姓爲伍，自誇武勇，無人統御，故跳梁跋扈，諸國盜賊漸多，而兵制漸弛。（日本紀元一千五百七十四年，卽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之封事中有云：「今武夫皆散佈諸國，或在千里之外，或居百日行程之境，豈能編名門籍，分守宿衛，此皆部內之強豪，民間之凶暴者也，國司苟依法勸究其事，則奔馳入洛。（中略）夫以選置衛卒者，爲備警急也，而今遠在甸服，不居京畿，假令皇都無虞，則有此輩何用了？若有急事，奔赴不及，是則徒爲諸國之豺狼，而非三軍之驍虎」。從此下有土著而誇勇之武夫，上有如封公之國司領主，少有氣力者卽可弄兵作亂。於是國司之一族率其良黨而叛者，（將門藤原純友奪關東八州，九州，四國，山陽數國之地，僞置百官，修內府），有與國司作戰者，（常陸之大棟平國香出土浦之城而戰。武藏守源經基守其居城其田城而自爲防。紀之淑人稱伊豫守而討純友），又有國司之一族以私兵滅之者，（平貞盛以私兵滅將門），皆驅其領地內之武夫，使親族良黨統轄之，以防城而赴戰。當時武夫之集合，或因受徵募不得已而服從其主，或因謀私利而歸附所天；故戰敗時則軍勢渙散，武夫皆與之爲敵，（國香爲藤代川所敗時，國中武夫皆與爲敵），戰勝時則軍勢振而武夫成集（平

貞盛戰勝時，將門之兵亦認爲一世之傑，皆解弓脫甲而降，各以私利決去就定向背，除一二親族良黨之外，未有願爲他人而死者。

戰亂頻仍而生大小名諸國武夫之心亦變化

其後有功之武臣等，多賜與領地，大名小名遂爲諸國之領主（源氏賜河內之國，築香呂峯而居。類此者甚多），與國司比肩而爭權。大名小名乃歷代之封侯，國司僅四五十年之君主，故武夫之心，咸歸大名而不附國司。此輩領主，多爲武人，有據其領地而叛者（日本紀元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後一條天皇長元五年，平忠常據下總之千葉而叛。安房，上總，下總爲其所奪，東國之武夫從者三萬人），領主兼國司者奉朝命往征之。（朝廷命甲斐守源賴信征之，因賴信居甲斐，召其子賴義傳詔命，賴義乃帥其一族家人等置甲斐，謁其父共出軍）。叛者以其族人良黨統御領內之武夫，征者亦驅其治境及領地內之武夫作戰，而以其族人良黨統御之。夫人誰肯爲他人而死？但在人智未進步之時，苟爲社會之情勢所迫，欲得人生之大欲（高名重祿之類），亦有願犧牲其生命者。國司領主之官吏，在太平時，爲治民之知事，在亂世時，爲統率武夫之將軍。領域內之武夫等，欲依之以求高名顯達，則不得不仰求國司領主之恩眷，於是始發生臣從之義，聽從其指揮，周旋其私事，視其子弟，猶如主君。（前太平記曰：賴義每次離其位而獨身作戰，則經，景通力諫曰，是非大將之所爲，向爲士卒之舉動，賴義曰，我若居一方而不動，何能司諸將之命，深知士卒之情形。今守座（指甲斐守賴信，賴義爲其子）。爲大將，司士卒之進退，此時我應與士卒共患難。賴義此言甚有理，因賴義雖爲甲斐守之子，但在此軍之中，位於士卒之上，如不知子弟在軍中有特殊之地位，必以爲怪也）。從此武夫亦有肯爲他人而死者，（和彌又六元高聲叫道：此次作戰，仰賴千葉將軍之威風，自昨日以來，在此陣上落敵不知其數，但求遇腕中有骨之武士。源氏之家人卜部武俊與之戰，均死。其他如此戰死者甚多）。但感恩義而死者尙不多見。

源賴信與
武夫

源賴義與
武夫

爲恩義而
戰之大小
名

武夫
死之

家人之
稱

在平源兩氏戰役，源賴信有特殊軍功，源氏之名稱，爲武夫之間所盛稱，皆欲仰之以求其所欲。
（前太平記曰：自長元元年以來，振威於坂東，許多武夫，服賴信之武功，望風而降。仰東國武士源家之威名，願世代居其麾下，歸之者如市。不僅此也，從源氏而立軍功者，或爲郡司，或爲莊司，或得多數之貨財，或領若干之土地，其間自然發生恩義，多有抱臣從源家之心者。領有土地之武夫，任郡司莊司者，多爲世官，世代支配其土地之人民，且編爲士卒；故土著之武夫，皆爲其所有，勢漸強大。於是其有郡司圖叛而被逐者（日本紀元一千七百一十二年陸奧郡之郡司安倍賴時據衣川之要害而叛。倍時自其祖父忠賴以來即爲六郡司），朝廷復命源氏族人征討之（朝廷以源賴義任陸奧太守兼鎮守府將軍，使討賴時，賴義帥一族大名出師河內），對源家效忠之人民，即帥領內之武夫，攜帶軍器，自赴戰場。（賴義過近江國野州河原時，佐佐木源太夫章經率四百餘騎，隨軍助戰。美濃，毘張，參河，遠江，甲斐，信濃，伊豆，駿河之軍旅，亦沿途加入，二百騎，三百騎，五百騎，千騎不等，甚爲踴躍。相模國之武士三浦太郎公義一族，編爲五百騎參戰。（前太平記）。諸國之武夫，皆自結黨羽而赴戰地，若深恐朝廷不能制國司者然）。叛亂之郡司，所部皆多年習養之武夫（安倍氏領有陸奧，近六十年），源賴義之軍與之戰，頗難制勝，源氏軍屢敗後，仍有若干大小名爲恩義而戰。（前九年，七騎落時，則明，範季，光任，貞廣等守衛賴義，義家。國妙被擒，貞任問賴義之居處。國道曰：一族侍從悉爲忠義而捨命，無一人殘生者，將軍之所在不知。茂種即往尋賴義），當是時或爲積雪所苦，或爲兵糧所困，鎮守府之兵，逃者甚多，諸國之密兵更不待言；但源家之武夫，則尙有忍死勿去，（前太平記曰：某次諸將棄將軍之前，謂現今如此爲兵糧所苦，與其餓死而辱名，不入攻入衣川而戰死。衆意甚爲堅絕。將軍之侍臣曰：死易生難，今若源家滅亡，天下之武夫悉隨之淪亡，不能歸朝家。朝家之安危，向依源家之存亡爲轉移，當此時期，不可在戰死以自了之思。由此可知當時之武夫亦知氏族戰爭之義。爲報恩義而死者。武夫之被稱爲家人，亦自此時盛行。然武夫與源家之間，尙未有君臣之約，其死也未必爲義務之

心所驅使。

源義家與
武夫

其後又有郡司之亂，（前九年之亂，清原真人帥武則，一族助賴義滅安倍氏，故朝廷以清原氏爲陸奧六郡司，二世相繼爲鎮守府將軍。其一族有叛者，稱爲後三年之軍）。源家之人有帥一族而私征之者，（時源義家爲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故征之，朝廷目之爲私鬪）。關東諸國之家人率其一族良黨來會。武夫黨如此屢次屬從源家，遂養成如有義務之習慣，以其住於源家時間之長短而論忠義之厚薄，（後三年軍記有云，義家下問之時，告衆人曰：『我唯一之武臣安倍宗任，此次降西國，心中甚以爲苦，今得景政武繼等，義家亦有果報』。權五郎景政是夜謁義家曰：宗任爲降伏之人，二心之老武者，有何可用。秩父之十郎，在平國香之末葉，非源家辨代之家臣，景政自先祖加藤六孫王仕奉以來，五代於茲，嘗無二心）。自後武夫對於源氏，遂不能不應其徵調，服從其命令，而養成效死於一族之風習矣。

爲氏族而
死之武夫

兵食之權
全歸武人

每次戰亂之結果，武夫之小領主在諸國中即次第增加。既有領地，其地之吏務亦當然爲所把持，又養士著之武夫爲其臣僕，兼干預軍務。故自日本紀元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國司之權下移，兵食大權全歸於武人之手。諸國之人民在專橫放恣之武人支配下，輾轉呻吟，不能氣息。雖然，自各國土著之武夫盛起後，全國雖爲武夫世界，但朝廷則拒絕之使其不得登廟堂，其幸者僅爲衛士，使得窺平安帝都之繁榮。武夫輩既不得志於廟堂，遂競圖武功，不惜一死以求得領地之俸賜，努力整頓地方之政務，以培養其勢力。封建之制雖萌芽，但比之於平安政府集權之情形，對武夫較爲幸福。且其地之人民，受該地方人之支配，自然較少苛政之苦。（比較郡縣與封建時，自然以封建之弊害爲多。但在中央集權甚強時，則封建較郡縣爲有利。其故何耶？因地方之俊傑，願治理其地之政務故。）自此以後，戰亂之次數愈多，領主之勢力愈強大，結果純然成爲封建之制。

封建之萌
芽

武夫頗爲
地方之領
主不願爲
衛士

望榮譽之心

高名心之
起源
關東之武
勇

視死如歸

人常有欲其事業勝於他人之心。吾人爲求保生之道，必欲克勝外物，故此心隨之而起。世人做過一種事業之後，常徵之於他人之評判，以定其事業之大小。他人以爲大者，即欲爲之，他人以爲小者，即不欲爲之，是蓋起於望榮譽避恥辱之心。高名心（僅限於武功而言）之起源，亦不外乎此。然而其爲大爲小，則由社會之情形而異。關東素爲軍馬之區，武勇之氣常用以保生命，守資產。心膽之剛，筋力之強，武藝之熟練，爲世人所最尊賞，其榮名亦最高。因此，武夫欲以武功建樹拔萃之事業，初以搏戰殺敵之多相誇，終至以爲人類所最難能之事而死，以得高名。（承平之戰，鄧州平六頁包，東條次郎兵衛與入道道玄戰，東條曰，你與我若結果一同戰死，則勝負未決。若戰勝，而老命已有限，以後難有榮華之期，不如互刺而死。都川曰諾，遂互刺而死）。武夫以一死而得高名，相習成風，遂至視死如歸之武夫，不可勝計。（望死後榮譽之心，非惑於靈魂不死之說而發生。因死後受人稱贊，雖云靈魂可爲之喜悅，但當時人猶重現生之利害，不能啓發其視死如歸之心。故死後之名，完全與靈魂之死不死無關，只是出於使生前事業發達之意耳。嗚呼！若爲達事業發達之目的而捨其生命，是非爲人生而作事業，實視人生爲一種爲作事業而犧牲之機械也。武夫之視死如歸，可謂悲壯矣）。

臣從之心與忠義之心漸盛

各國武夫皆養於一氏族之下，其人之榮辱利害，純視其得此氏族之心與否爲斷；因此萬事皆迎合其氏族之意向而奔走，盡心勞身，以就其寵遇。不僅其一身如此，凡在一領內之武夫，子子孫孫，均養於一氏族之下，有如其所有物。家人良黨之類的稱呼，竟至與臣僕同一意義。（家來的稱呼，似亦始於此時）。但所謂家人，所謂良黨，（對將家而言，則諸國之大名爲家人；對大名而言，則領內之武夫爲家人。良黨一詞，用義亦與此同），在戰場上，應立於其他武夫之前，得贊之時，雖郡司莊司之官，亦對之下拜，並可受賜小領地，在社會上居於最有榮譽之地位，武夫皆願爲之。家人良黨，生於氏族之家，長則成爲武夫之首長。爲氏族者，巧用其高名心以鼓勵其勇氣，對自家有利者，使同得榮譽，對自家有

家人良黨

害羞，亦同受恥辱，欲得龍馭之武夫，安得不爲此策略所動？況榮譽與重賞，最爲武夫所欣羨，氏族賜艦，則引爲終身光榮，賜劍數柄，可使其感激涕洟。若得一言半句之賞詞，更可使武夫甘爲之死。（後三年之戰，義家分座應應將士，未列座者恥之，欲一顯軍功，僅以一騎向敵，中流矢而死）。

由武夫之高名心，添染以臣從色采，於是倫理之情（善惡邪正之思想）更使社會對於所謂忠義之氣，發生稱贊。蓋世之所謂善行，發生於世人之稱贊，其所以受人稱贊，則因其能損自己而益他人。彼從屬於氏族之下，養成臣僕風習之武夫，深信善行之應爲，故於臨陣時，爲報恩義，常效最大之努力；所謂爲一日之恩而捨百年之命，乃武夫之唯一信念。夫以一日之恩而捨百年之命，實爲報恩過重之善行，可稱之爲忠節。此忠節之心，乃合勇氣，臣從，與善行三者而成。昔日之武夫，爲高名而不惜生命者，今更加以忠節之義，其於善行，豈尙躊躇。自前九年之戰以來，忠義文字，最爲武夫所尊崇。（後三年之時，鎌倉權五郎景正善戰，烏海彌三郎見之，以強弩射之，穿景正之右眼而貫其首，鎧甲亦穿。景正亦不示弱，以左眼看準敵人，說道：「方纔射我者，我認出是烏海彌三郎，不要讓他逃走了，要還他一矢」。他右眼掛着隻矢，手中拿着弓矢去追逐，結果射殺了烏海。此爲武夫爲忠義而戰死的勇壯事蹟）爲源家而死，在當時社會上，乃最榮譽之事也。

臣從將家之風俗發生

上述此種心理，由日本紀元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發生於關東及其他各國，漸成爲社會之風尚。後之武夫，習染此風，且沿之以求榮名利達。彼見前代之武夫，以武勇顯，以忠義爲世人所稱道，其英名偉業，大堪羨慕，於是練武道，固心膽，日以仿效前代武夫爲事。人類事業，嘗以模仿而得到利益；因此對先人所作事業，嘗毫不遲疑地加以仿效，是爲風俗發生之原因，一僑團體之人民，言語動作自然一致，亦由於此。由於模仿與傳統之觀念，先代所奉之氏族，後代亦不能不奉之。先代因利而行之事，在後代則認爲義務而不能不行。後三年戰爭之後，諸國之武夫臣從大名小名，大名小名臣從將家，遂成爲

高名心與
臣從心之
結合

忠節
忠義

模仿與傳
統

後三年以
後臣從之
風

臣從與武
勇

早稻相對
之戰

官名僅爲
運部

代理政務

軍陣之情
形

勇將勇士

社會之習慣。時代愈久，其風愈盛，苟爲將家一門之人，諸大名無不奉承，武夫皆服從其命令，無論何時何地，均應爲之戰鬥。（義親之叛於出雲，爲朝之強佔九州，義平之戰關東，其起事均甚易）。考當時史乘，關於國家大事，多由將家之人爲之發動。豈必將家方有人才？蓋將家之外，無高論正理以鼓動人心，無門地閑閑以資號召，無以驅策羣衆舍生赴難也。由此可知臣從之勢在當時之重要。

此種臣從與武勇之勢，歲移時易，次第增積，保元平治之戰，表現最爲激烈。譜代相傳之良黨，多年恩顧之家，在曹司或冠者之前爭先（臣從），有來歷者詳述先祖以來之武功，無來歷者，亦高述其姓名族籍（高名），不懼矢石，不畏強敵，驅入敵陣之中，爲一騎一騎之戰（勇氣）。因此軍中無規律，無隊伍（所謂魚鱗鶴翼之戰，蓋文人形容之詞），武夫皆攜其各自所有之武器，自由進退。但因其有勇知恥，競立功名，故尙能固守軍陣。

國司之權次第減小

當日本紀元十九世紀中葉，源氏子孫集兵滅平家之時，治國郡者，其言論措施，絕不似朝廷官吏。郡司，莊司，權守，城介等官名，世人視如各家姓名之通稱。其支配之土地，如其所有，領內之武夫，如其臣僕，且皆爲精武勇視死如歸之輩。因領主之數增加，威權悉歸於此，國司亦不自赴其任國，卽命此輩代爲治理政務。奉源氏之子弟滅平家者此輩也，創立鎌倉政府者亦此輩也，當源家之軍勢自東國渡至西國之際，隨處皆見統率豪族之武士，而不見朝廷之官吏，亦實以此故。當時朝廷統治地方，毫無政治規律，殊堪驚異。自日本紀元十六世紀以還，諸國蓬勃發展之剛勇風氣，一時爆發，鬥爭決戰之情形，勇敢悲壯，令人驚歎。呼鬼神唱天王之勇將勇士，互相爭死，在弓矢橫飛之戰場內，濺血而戰。其間有筋力可驚者（能登守教經有二三十人之力，挾武夫二人投海而死），在武術上有顯大名者（奈須與能射一扇之扇眼，佐佐木盛綱能騎馬上渡海），有視死如歸者（河原太郎，呼弟次郎曰：大名雖不與我動手，但應尊重家人之高名，我等若自己動手，亦難遂願，我等欲入城中放射一矢，則萬難生還。夜間

一家之私

二人越生田之森林而死，有其死甚可恐懼者。（今并兼平拔太刀而言曰：日本第一剛勇之主，倘侍者自殺了！口含太刀之錄，由馬上逆落而死）。自朝廷委兵權於將家以來，堂堂征討之軍，竟自演一家之私鬥。官軍之將，不能以嚴命督率武夫，欲求聲援，只能以私情請，尚須加以尊敬之禮。故雖在臣從風氣極盛之時，將軍若催武夫，其語氣甚為平和，不曰『激藉』，即曰『商議』；武夫之應命，則稱爲『與力』，或『同心』。相習既久，與力同心遂成爲『士卒』之義。以與力同心之武夫集合而成之軍隊，不能立嚴肅之軍律，亦不知立軍律。戰事發生時，由大將號令，一氣向敵，自由前進。此稱情形，當時之戰爭莫不如此。（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等在騎越不進而向一谷，曰：『此是一壞地方，恐無人前進，要想完成大功，不如進此谷』。）由此可見當時尙未有整飭隊伍之法，只是集合有勇氣之武夫於一處，自由作戰而已。

要之，日本封建之權輿，因國司專權臣使僚屬而萌芽。有戰功之武夫，拜任郡莊之司而世襲其職，因其領有土地，亦爲封建制度發生之一因。武夫之忠義心，因封建勢力之增進而愈盛，亦可想像而知。

（譯者註一）大名小名 統稱爲諸侯。古代領有名田（新墾之荒地，墾者命之以名，稱曰名田），多者，稱爲大名，少者稱爲小名。中世武家時代，領有封地之武夫，稱爲大名或小名。江戸幕府時代，領有萬石以上之地而直隸於幕府者稱爲大名，其外者稱爲小名。又大名小名亦可統稱爲大名。小名亦稱爲本。

第四章 鎌倉政府創業時代及其治世期間之情形

鎌倉幕府統治地方之方法

幕府之制
立

大小名之
歡喜

鎌倉政府賴大小名之武功而創立，詳情已如前述。日漸增進之封建勢力，因此而消滅。恢復郡縣制之舊狀，爲鎌倉政府威力所不及，然在其威力所及之範圍內，則絕對抑制封建之弊。若謂鎌倉政府恢復郡縣制之舊狀，則予寧謂其爲仍採取封建之制，因其未復舊時郡縣制之舊觀，地方之政務，仍委之於地方之人民也。當彼王朝之時，諸國之大小名屢次叛亂鬥爭。但在鎌倉政府時，或爲帷幕之臣而干預政務，或受政府之優遇而爲地方人民之表率，不復如從前之凌蔑政府及人民。故大小名皆大歡喜而爲盡忠節於鎌倉政府之人，不復有生二心者。但因源賴朝多疑心，滅木曾氏，滅平氏，滅陸奧之藤原氏；其後凡關東忠義之大小名，雖爲其一族，苟其勢力甚大，或有名望者，皆滅之以除後患。（上總介廣常，叔父行家，弟範賴，義經，從子義高及義經之子等，皆被殺）。雖其小者，當賞功勳時，多僅以威狀賞詞使滿其高名心而已，對於分與土地，附予實力之事，絕不肯爲。（賴朝賞熊谷直實爲：『日本第一之豪者也』，僅予住宅一所。賞下河邊之莊司行平爲：『日本無匹之射者，知射者無過汝之眼』，僅封爲播磨之守護職。北條氏之強大，乃賴朝死後之事）。於是諸國平靜，雖擁有土地兵馬，但未有實力足以抵抗鎌倉政府者。

雖然，當時武勇之氣，諸國甚盛，視死如歸之武夫等，散處於郡鄉，治之實難。苟其人之天性，皆有借財畏死之心，雖委以地方之政務，當無叛亂之患。無如彼不惜死之武夫，好亂性成，資財之得失，事之成否，舉非所問，政府豈可無治之方。故大江廣元獻策曰：『世已滯季，身惡者最得時，反逆之輩，天下皆是。是東海道之內，若有作亂之徒，雖得謹靜，但蠢濫必起於他方，爲鎮定計，若每次發東

守護地頭
之設置

國之兵，人之類也，國之費也。自今之後，應斟酌各國情形，於國衙莊園補設守護地頭，庶幾無後患。於是賴朝請於朝廷，於國衙置守護，賦予警察，徵兵及裁判之權，（御成敗式目第三條曰：「大將家之權爲處置大番催促，謀叛，殺人，夜襲，強盜，山賊，海賊等事」。亦稱爲總追捕使。與古之檢非違使相同。）以統管地方之武夫大小名，禁制彼輩之私自弄兵。（御成敗式目第三條曰：「雖爲世代之家人，當時無家產者，不准聚集」。）諸國之大小名，皆有應守護職催促之義務，若不應催促者，即沒收其領地。（御成敗式目第三十五條參照。予常思當時之家人即大小名之情形；與羅馬滅後所發生之封建的借地人相同，又與近年薩摩武士稱爲「高」者類似，皆遵守軍事之約束而領有土地。）自此之後，武士專橫之弊始止。又在領主不自管治之莊園內，由鎌倉政府置地頭，立於名主之上而處理吏務。至於地頭之職，初設於京畿近畿關西之諸國，其後因土民領家之請求，僅在領主不自管治之莊園置之。（御成敗式目四十七條曰：「名主之職可附於地頭，無地頭之所，可附於地方」。可見當時亦有無地頭之所）。領主自居其地之莊園，使其領主即大小名自己兼理地頭之任。故鎌倉政府之政策爲使諸國之領主負擔地方繳納金穀之吏務。領主甚喜管理此種公務，鎌倉政府有責罰其邪正之權。要之，鎌倉政府置守護使統治地方之武夫大名，以收兵權，置領頭使管理地方之金錢，以制其財政，故其制國郡之情形與前時不同，但亦未嘗大有改變。平安政府之時，諸國之大小名，雖實掌地方之金錢，統治地方之兵馬，然朝廷官吏排斥之，視爲賸務，恥與爲伍。及至鎌倉幕府之時，既不排斥，且視爲貴重之公務，親加接納，明察其處理公務之是非。故領主皆有安於其職，且誇耀其地位高尚之概。專橫之弊，亦由此而止。此實爲鎌倉政府治世一百四十餘年間，使領有土地蓄有兵馬不惜生命之武夫不敢向政府動兵之原因。此種制度之完成，雖由於後世之有司能盡心推行，但仍以廣元，賴朝之功居多。（後之史家多以置守護地頭一事爲殺朝廷之權，然朝廷遣命之國司在地方上無權，並非始於此時。富源氏起於東國時，關東地方雖有國司，然多使大名代理其政務，故國司實已無權。故不能謂置守護地頭爲殺國司之權。予認爲此事

制國郡之
情形武士專橫
之弊止

乃有制地方大小名之功。

鎌倉政府內部情形

平安政府所難制之大小名，鎌倉政府能以巧妙之方制之。但鎌倉政府之內部，極爲簡易。政府之官員亦甚少，此輩官員如往昔僚屬之集於國司邸宅者然，如其後家人之集於領主之家然，在源氏的私邸處置國家政務。無論何時之政府，苟考察其起源，大多如此。歷時稍久，始次第擴大，或爲善良，或爲暴戾。（鎌倉政府政所之別當爲前因幡守大江朝臣廣元，主計允二階堂行政，案主爲鎌田俊長，知事家爲岩手小忠太光家。問注所之執事爲中宮太夫屬三善康信。侍所之別當爲和朝臣康清，文章生三善朝臣宣衡，民部丞平朝臣盛時，左京進中原朝臣仲業，前豐前介清原真人實俊。京都之守護爲一條能保。鎮西之奉行爲天野內藤兵衛尉遠景）。

一家政府之弊

鎌倉政府如此巧制國郡創立簡易政體之後，一家政府（以天下爲家者之政府，稱爲一家政府，政府之有司握政權者稱爲有司政府）之弊害立即於其內部發生。蓋任何君主，在此世界中，除后妃妻妾之外，平生無可交語之朋友。國中男子，皆生而爲其臣下，不能作平等之交際。故無親近之友，不能得切避之益，苟非創國之雄主，其智解有及常人者。賴朝死後二世三世之時，此弊大顯，加之平安柔弱之遊技又足以洗醉其心志，使成爲一完全孤獨之人。雖當賴朝之時，忠義之風已盛，但忠臣義士亦不能盡其心以匡救國政之衰頹。

北條氏執權源氏滅亡

此時北條氏藉外戚之權勢，以執統馭之權，源氏自家難制之忠臣，盡討滅之；其餘小者，則施私恩以收服其心。又以執權職爲北條氏世代之職務，遂於日本紀元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滅源氏之子孫，絕一家政府主系之血統。其一切舉動，極爲隱祕，使後世之人，無從知其事實。

門第與血脈

雖然，門第貴賤，爲當時之人所最崇信，人心既不歸北條氏，雖以北條義時之精明，亦不能強爲統制。蓋平安政府以門第定貴賤公示於天下，相沿已久，習慣難移，人人皆有門第不可超越之思想，漸

至以血脈分貴賤，判曲直。（譬如當時的思想，認爲武夫生而賤，公家生而貴。因此，武夫叛公家則認爲理由，公家征武夫則理直）。嘗考此種心理之發生，是亦與敬鬼神之心相同。（參閱第一章論神道起源之處）。蓋人多有怯懦之心（由避死之心而發生），對希見之事物，常認爲不可狎近，發生許多之想像，以圖避其災害。高位大官，爲世人之所注視，而不敢狎近者。其人常飾金銀珠玉於衣服，住深殿高樓之中，世人偶然見之，輒畏其威嚴，心中先有非自己同等之思想，於是貴賤之觀念以生。及其子孫永保此職，人即以門第血脈判貴賤，發生而有貴者賤者之思想。雖均是同等之人類，仍認爲高位之人其血脈必貴。因此，對於日常親昵之人一旦登高位，多不願服從，而對彼不常見不易親近之人（無論智愚）則樂於服從。當時之人不信仰與大小名同輩之智者而一心服從源家之子弟，完全由於此種心理之作用。

迎平安廣
族小兒爲
將軍
一家政府
變爲有司
政府

人心之情形如此，故北條氏之門第族望不能繫當時之人心。北條氏乃自平安朝廷迎貴族之小兒，奉爲鎌倉之主，使繼征夷將軍之嗣，以號令四海。此種舉動，恰如法師擁神符以說法，平素神乎其說，使無知之人畏服。源氏之嗣既絕，以其他之貴族保其嗣，一家政府之性質遂變而爲有司政府。然是乃鎌倉政府內部之變異，其對外之威力，絲毫無所改易。

王家政治有神權之思想

神教政府
之追憶

政權歸於關東之後，平安朝廷不無嫉妬之情。蓋神教政府之勢，雖在佛法濫來之後大減，但與懷往事，不能不追念神代之偉業。故王家有統治日本人民神權之思想，常不離人民之心懷。兼以有職之士，乘機加以鼓吹。平安朝廷病於文弱之後，真正政權已歸於藤原氏之手，而天皇不與焉。但因藤原氏居朝廷之內而握政權，王家不以爲怪，人民亦不以爲疑，國人猶想像（註一）關白（註二）攝政（藤原氏）之權，亦即爲春日明神（王家，皇室）子孫之權。及至平氏以武臣而掌大政，王家與藤原氏屢思推覆平氏奪其政權；但均歸失敗。因平氏亦在平安，有如輔佐王家者然，故人民亦不以爲怪。及源氏起於關東，移政權於鎌倉，對於王家，雖較平氏爲尊敬，但因政府之所在地遠在關東，故其失權之事，爲世人所瞭

王家與藤
原氏平氏

然。武人奪王家政權之事既顯明。王家亦欲收回失權，恢復往昔公家一統之世。於是建關東調伏之堂，（建關東調伏之堂於三條白河，稱之爲最勝院天王之院。其後爲三代將軍源實朝所倒毀，謂白河之水有災，故急毀之），又有屢次呪詛關東之事，又有逐祈關東長久之陰陽師之事，其他有似兒戲之事甚多。然當時世人仍信門第之貴賤，祇知王家之神權；兼以高名顯達之士，猶多不顧生命之武勇者，能號召許多大小名，使之歸服；況此時源氏之嗣已絕，諸國武夫已失其可盡忠義之對象。於是王家遂毅然決征伐關東之策，關東親近之公家立即與之響應，京師之守護被繫，下詔七次，集合武夫一萬七千人，揚錦旗而向關東進討。

然關東不之智謀之士，豈不預知此事。賴朝之寡婦即擁四代將軍，召將士而告之曰：「今有最後之言，望一心靜聽。自故將軍征朝敵草創關東以來，諸將士之蒙恩，高逾山岳，深等溟渤，今朝廷信逆臣之讒言，下非義之綸旨，欲滅關東。望早討逆臣，以全三代將軍之遺跡。有欲赴京方者，望即明示！」賴朝謀士大江廣元，三善善行等獻策曰：「爲今之計，宜速使武州（北條泰時）單騎揚鞭以向京師」。於是京國武夫十九萬，由東海東山二道向京師進攻。京軍戰敗，將士等返欲奏敗狀，門閉不得入。東軍入六波羅。朝廷乃下詔曰：「此次之戰，非出自宸衷，乃謀臣等之所爲也」。三皇移二宮於遠國，與謀之公卿多被刑戮，是爲承久之亂，日本紀元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事也。自是王室尊嚴掃地，無復傾心朝廷者。尊崇第之風氣大減，一切唯關東之號令是從。

鎌倉政府更加整飭，內部秩序極爲周密，對國郡亦無倨傲之弊。大小名之領國郡藩人民著，日漸增加；封建情勢，亦積久而愈盛。但其專橫之弊則完全廢絕，無復有爲名利而死者，亦無爲恩義忠節而致身者。自武夫成爲世職以來，常受凌蔑之農商，漸得蘇息，不復受軍馬之踐踏，無盜賊掠奪之憂，受領主之壓制者亦少。（北條時政，義時以來，屢遣使者至諸國，問守護地頭之善惡，民間之疾苦。使者所至之地，因惡事而被誅者百餘人。至時賴，貞時時，常自被緇衣出巡。如此嚴密視察，尙有惡政，不視

錢稅

察時將如何？公平之政實難做到。治地方之法，應委治理之權於人民。政府之管治，甚爲簡易。歲出不多，故租稅之數大減少。（據東鑑所載：『及賴朝立霸府於鎌倉，關東八州之年貢，免去三分之二』。免者實不止一次，曾依順次，每次減免。又兵糧米每段規定課五升，不久亦免徵。及泰時任執權時，又緩徵租，大約爲五公五民。時賴時，規定水田五段納租十石。每產米十石，分之爲二，以五石納諸政府。若不納米時，可以唐渡錢十千文換之。十石之田，稱爲「十千文之給分」，蓋始於此時。（四天王寺製劑察古記中不詳，記於農政本論中。）自此以後，人民對政府，稍免騷擾之煩。此時政府之內，掌樞要者，不尚武斷，亦不流於文弱；但有遠謀深略而猜疑者，儉節果斷而殘忍者，則爲數甚多。時或有持經濟之說以行政者，雖多不達時務，（傳馬之制，甚苦平民，且不公平。鎌倉政府定之。青砥藤綱之誤解，得小幡爲次郎之辯駁，而世人始明）。但均能以儉節爲主；不興土木且提倡職業，故亦無大過失。遇凶年饑歲，則登倉庫之積穀以救民。時宗之時，民間貨幣缺乏，商業不便，乃送金於中國，換其銅幣，以濟民間之交易。當時不知造幣之法，向外國輸入貨幣，用心良苦。總之，鎌倉政府始終盡心民事，汲汲唯恐其不及。唯以節儉過甚，未能獎勵文學，亦未設學校；因制止奢侈而妨害人智之進步，或不免招識者之議。但平安政府之開化，爲賤削地方以養生，實非國家之幸事。鎌倉政府則安定地方，事專保守，恰合乎自然之度。人民生活安定，平民文化亦賴以發達；日本民間著書之有可觀者，實自鎌倉政府之時始。

元兵侵日

鎌倉政府整理內政之方法如此，對外國亦能應付裕如。當此時，元兵已平定韃靼地方，移其鋒南下滅金滅宋，統轄大陸過半數之人民，以勝兵之餘威向日本求好，屢侵西境。日本國內大恐，朝廷頻祈禱元寇。（修熾盛光法祈禱元寇。修金輪法於延曆寺。修孔雀經法。誦般若經。會七百僧於石清水，七日夜修尊陀羅尼。獻幣於伊勢大神宮祈禱元寇。誦大藏經於石清水。——以上據大日本史所載——）大凡人

節儉救民

送金與中
國以交換
銅幣

當恐懼時則迷信心增強。巴克爾氏之說甚確。又日蓮上人知此時有元寇，奉狀於鎌倉政府曰：「如經文所云，自彼國攻此國，必敗也。日本國中有一人（日蓮自謂也）可降服彼西戎」。日蓮爲聖人之一，能知未來之事，欲降服元寇，非日蓮不可也。日蓮爲日本第一之法華經行者，爲擊退蒙古之大將。在一切衆生之中，亦爲第一。元使六次來日，朝廷將答之，鎌倉政府抑不遣派，又斬其使者，選武士派遣至鎮西諸國，任北條實政爲九州之探題，以備元之來侵。旋元兵十萬來肥前之鷹島，遇大風，元之戰艦爲風所漂沒，日軍乘勢奮戰，殲之，元兵免死得歸者，據云僅三人。此役並無大戰，全賴颶風之助，故不能謂之爲戰勝。鎌倉政府依然不動，可云天幸。日兵作戰之法，恰如小兒相逢，互相打擊，甚爲固陋。（吉田賢輔先生曰：後之史家以時宗之斬元使，爲對國家有功，實屬謬論。一個普通國民，在外國受害，不能置之不問，是乃獨立國之職務，況斬特國書之大臣，元兵豈能不來攻？元既求好，日本亦應以獨立國當然之禮答之。斬使臣爲自污國體之舉動）。

鎌倉幕府整頓之由來

鎌倉政府在對內對外事務上，都無大失敗，並非偶然。當鎌倉政府之樞要而裁決政務之北條氏，以其門第使武夫歸服，則不如源家，使人心畏懼，則不如王家；故天下之政權雖實在北條氏之掌握，但諸國之大名視之如同羶，平安朝廷視之如陪臣，未有奉之爲天下之主者。況朝廷常謀王權之恢復，大名依然蓋甲兵佔領莊園以臣養忠義之武夫。苟政府有可乘之釁，則北條氏必首當其衝。北條氏處於朝廷與大名上下夾攻之中，代代皆出英明果斷之人。其對親戚朋友之處置，既無缺點以招人之攻擊；而對公衆推行政務時，亦極其公平節儉，唯恐有所隕越。因北條氏自知門第之賤，不足以服人，故思以善政得人心，免受上下之抨擊。雖有善政猶不能安，故始奉藤原氏之族人，後又奉親王，以附尊嚴於其政令。自己則居於執權之職，與其他官吏同列，與諸國之大名即地方官吏應答。泰時以來更設加判以資贊助，不以一人當執政之權。在如此慎重措置之下，北條氏之政權，得以保存，然亦不能滅大名。如此上下之權

平衡，人民得樂太平而安生息。直靈日本紀元二十世紀之末葉，仍保持此種安定的狀態。

佛法信仰之風盛行

鎌倉政府如此親切保護一般人民，率天下以服事王室，縱不稱之爲至德，亦無可指責之處。但在薄到此種境界以前，政府中人敢爲不義，違背人情，忍心害理之事，不勝枚舉。例如在下之武夫，殺柔弱如婦人女子之貴族，以其功勳得領地而致富有；爲主者滅其族中無罪之大名以除自家之後患；爲執事者，除其主家之子孫，犧牲許多同輩以謀自家之安全；其他有司等懼己身之危，見主家之亡而置若罔聞；此外有干涉皇家繼位之事者；有所擁之將軍及年長而逐廢之者；經過許多變故，雖能奠定一般人民幸福之基礎，然究爲倫理之情所不容。因此，畏懼之心隨安樂之增加而愈進長。欲消滅此種罪業，佛法最受尊崇。佛法之威力，及於政府之間。雖吝於封賜之賴朝，亦屢施惠於僧侶，給封領於寺院，甚至送平重衡於東大寺而誅之以釋其恨。（重衡亦自覺其罪孽深重難遇如來之妙助）。又使奠定鎌倉政府基礎之大江廣元入道（法號覺阿），使隱謀甚多之義時屢次祈禱。節儉之賴時使剛勇果斷之時宗建立多數巨大寺院。在鎌倉政府之內，圓顯之有司，其多爲前後所無及。此觀於當時之人，所記鎌倉崇佛之狀況而可明據者。

鎌倉之東南一角，爲舟楫之要道，商賈雲集；東西北三面，高低之山，羅列如屏障。南山之麓，有大御堂，新御堂，朝拜之人，往來不絕。佛像烏瑟之光，環珞輝眼，月殿畫梁之粧，金銀爭色。（見源光行之海道記，蓋日本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之遊記）。源賴朝造營館於此處，崇奉佛神，成爲今日繁盛之地。所建大御堂，鑿石巖而成，開道場之新色。禪僧比肩，誦聲不絕。歷代將軍，又添築松社，蓋寺於此。

據此處所記，可見佛法繁盛之一斑。其中最得時者爲禪宗。

（譯者註一）朝白、官名，輔佐天子總率百官而行萬政。因一切英文在天皇之前，則白皆先詳悉其事。漢書宣帝紀有云：「請

清談釋業
佛法尊信

圓顯之有
可明據者。

事皆始關白光（雲光），然後奏，「關白一詞，自此出，由勳阿穆成。亦稱博陸，太閤，禪關。光孝天皇元慶八年（西曆八八四年）六月五日重用大臣藤原基經，是爲此職之始，但尙無關白之名。宇多天皇仁和三年（西曆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詔於基經曰：『萬機巨細，百官謀之，皆關白於太政大臣，然後奏下，一如舊事』。是爲關白之始。自此歷代皆設，初由藤原一族世襲，鎌倉政府中葉，由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五家任之。皆藤原氏之支族也。

（註二）攝政 天皇幼冲之時代天皇親授攝政之人。多由大臣兼之，女帝時亦設之。日本仲哀天皇崩後（西曆二〇〇年），鷹司神天皇幼冲，神功皇后攝政，是爲母后攝政之始。推古天皇時（西曆五九三年）厩戶皇子攝政，爲女皇而設攝政之始。文德天皇之後，清和天皇九歲即位（西曆八五八年），外祖父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攝政，是爲人臣攝政之始。因藤原氏之勢力強大，攝政遂爲常置之官，由其一族任之。有時天皇登位後，改爲關白。攝政與關白，遂成一系之官。中世以來，攝政由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五家任之。稱爲五攝家。

卷三

第五章 自鎌倉政府滅亡至南北朝之戰

鎌倉政府治世之間政府與大名關係之變遷

守護地頭
之榮辱

鎌倉政府組織密緻，能保持國家之權衡，故海內長治久安而人民得享泰平之澤。但此泰平，實胚胎後來之禍患而導此政府於滅亡。如前章所述，鎌倉政府任關東有功之武士爲守護或地頭，配佈於諸國，其用意爲使之統管剛勇而不惜死之士着武夫，以完成政府統制地方之政策。但數世之後，此守護地頭等又成爲諸國新興之武夫，已與政府異其趨向；昔日認爲鎮壓梟惡者之守護地頭，現則一變而爲支持梟惡者之梁棟。此種變化，實有重要之社會原因。人情之知忠義，因有共同之利害。守護地頭等之所以爲關東忠臣者，因其與政府有共同之利害關係故。其官職爲鎌倉政府所任命，親族故舊多在關東，言語風俗亦與關東相同。因此，與關東之利害榮辱關係十分密切。但遠者益疎，人情之常；及至數世之後，友好已去，親族互忘，與政府之關係亦第淺淡，卻對於其地之人民轉形親密；對於本生之士發生愛情，對於其地之武夫痛癢相關，對於其國人之榮辱，自己亦以爲榮辱。於是此守護地頭當初雖爲政府抑制武夫之姦濫，終至於使用武夫以發揮自己之高名。且守護地頭之職，代代爲武夫之酋長，不能不養家人良黨。及至末代，遂背政府定制，以平盜賊之功自誇耀。因此，守護地頭之職，外形雖無變化，實質上已與鎌倉政府之利害相背道而馳，無復對之盡忠節者。此時守護地頭成爲一種純粹之封建貴族，對於政府及其他黨派，無所抉擇，凡與自己有益時，則帥武夫而馳往參加。

社會之情形如此變化，守護地頭與政府之關係大爲疎遠，但彼等自祖先以來歷代相傳之武勇風氣，

純粹封建
關係

總任俠
之風倍增

北條氏實
政權在於
家臣之手

大覺寺持
明院之分
立
五攝家之
分立
皇室之事
皆出於錄
倉政府之
書肉計
後醍醐天
皇之失敗

則未嘗稍衰。且重然諾，輕生死，豪俠之習尚，與日俱增。論道理，質是非，為無學之武夫天性所不好。其所與時，不問正邪曲直，不問對於國家之利害，唯以對施恩者至死不變為快，見之者亦譽為偉大之剛者。此等實例，在當時歷史上，不勝枚舉。蓋尊任俠重然諾之風，發生於所謂為所難為之心；彼勇敢剛猛之武夫，專以為所難為之事為己任，故武夫之間有此風俗，實不足怪。社會之情形如彼，人心之情形如此，宜乎鎌倉政府不能墨守舊例，而施以適當之處置矣。然而隱微變化，最難察知，故鎌倉政府未注意於防範守護地頭之術。且因泰平既久，驕傲之心不期然而發生，對地方武族，不復能如祖先之彬彬有禮，其自處亦不復如祖先之謙謹。尤以鎌倉政府之末代，政府權威全落於北條氏家臣之手，縱令外部無變化，內部之潰裂亦將不可免矣。

王室欲傾覆鎌倉政府

此為日本紀元一千九百九十年間社會內部的現象。是時適九十六代後醍醐天皇在位，朝廷有傾覆鎌倉政府以恢復公家一統之陰謀。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故。日本紀元二十世紀初葉，皇統分為二派，一稱大覺寺殿，一稱持明院殿。此兩派均自八十九代後醍醐天皇而出。蓋承久之亂後，鎌倉政府之威權漸及於王室，嘗干預繼位之事。嘗後醍醐天皇之二子後深草（第二子持明院）龜山（第三子大覺寺）之子孫爭皇位之際，選立之權全落於鎌倉政府之手。鎌倉政府在此事發生之前，已將有攝政特權之氏族分為五家，使其相爭以減少其威權。故當皇室兩派爭皇位時，大覺寺派雖得後醍醐天皇之寵（雖無顯明之痕跡），但鎌倉政府為倚王室常依賴政府起見，決定由兩皇子先後互立。大覺寺派大失所望，對鎌倉政府甚為憤怒。及至後醍醐時，遂有對政府敵對之勢。但當時藤原氏以來柔弱之風，猶盛於京洛（註一）之間，王家（註二）公家，皆為此暗霧所籠罩。後醍醐天皇所賴以企圖推倒政府者，唯當時強大之僧黨與重然諾之大名，欲藉其武力以謀恢復。此外則仍採從來慣用之手法，欲以呪詛祈求致仇敵之敗潰。北條氏之政雖衰，但久為人民所歸附，不易推倒。後醍醐天皇圖倒鎌倉政府之舉，一次二次皆告失敗，與謀

之公家僧侶武士等，被處極刑，天皇幸西州，鎌倉政府之政權仍安然無恙。

釋讀助王室者思想之起源

大凡高貴之人一旦沈淪，常令人起同情之心。況當萬世一系之天皇尚爲人心所尊信之時，又在重然諧輕生死風氣極盛之世，爲巨子者見其天皇爲人所遠逐至無置身之地，決不能默爾而止。後醍醐天皇既困於笠置，又被幽於六波羅，頰沛流離，皇威掃地。歷時既久，世人對鎌倉政府之暴舉，大動義憤，稱起兵勤王者爲義舉，爲王室而捨命者爲正義。此種思想之演成，實有其特別之原因。蓋爲王室而起兵捨命之舉，完全置一身之私於不顧而謀他人之利益，且爲人所難爲之事，故人人皆譽之爲善行，稱之爲「剛者」。既稱爲善舉，又爲高名所在，故領數郡帥一隊之大小名，內爲感動所激，外爲稱譽所誘，當後醍醐天皇西行之時，多有築城執兵器而叛鎌倉政府者。

雖然，社會之動靜，常爲因襲之餘勢所抑，未有俄然轉變者。鎌倉政府之舉措，既爲人情所不滿，地方之大小名等皆欲叛之；但社會因襲之餘勢，猶能予以維持。當時鎌倉政府之威望既蓋天下，大小名雖心懷反側，但皆感於舉事之危。既覺其危，即不能不聽政府之命。既聽政府之命以向敵，即必奮勇以求得勝利。是乃人情之常，社會之事往往因此而歸於寧靜。此時爲北條氏效命之百萬騎，非必心悅誠服，但仍轉戰於京攝之間，攻破諸地之城郭，結果天下平靖，恢復曩昔承久以前之舊狀。

楠氏之武略

社會因襲之餘勢，雖具有御制當時人心之力，但以一人之智略，改變當時推倒政府之思想，阻止扶助王室之潮流，則爲勢所難能。此時有楠木正成其人者，以千餘孤軍，困守葦爾孤城，雖不敢應戰，但能挫百萬雄兵之銳氣而解其結合，使敵不知其所攻。攻勢一挫，鎌倉政府之威望因以墜地，維持其政府統制之繩索次第弛緩，使各方之武族，皆懷割據領地率其一族良黨而叛鎌倉政府之心。當社會未進化之時，維持人心者，首爲門第之貴賤與兵馬之權力。人民權利，社會公益等，舉未爲當時人心所夢見。鎌

歷上對天
義式無之
讀憤

大小名之
感動

北條氏尚
保餘勢

關東百萬
騎

社會因襲
餘勢之轉

地方之武
族與鎌倉

建武中興

倉政府之內，自源家血統絕後，君臣之名分已絕，其國內家人雖叛之，在當時世人眼中，亦不認爲有違德上之罪。鎌倉政府之尙能維持泰平者，僅在尙能保持權力之平均。因楠氏之一擊，鎌倉政府之權力遂以掃地。人心既至於分崩離析，北條氏之威望又不能收拾之，諸國之大名靡然響應，皆連合而與政府爲難。於是以前精強著稱之鎌倉政府，不過三年而告解體；百五十年之太平，遂以此告終矣。

鎌倉政府之滅亡

鎌倉政府雖如此輕易解體，但起兵背叛之大名家人等，事前並不敢輕舉妄動；彼輩視倒政府爲一蹈危冒險之事，非具有非常之決斷不敢輕易嘗試。各方大名雖一時蜂起，但並非平素互相同盟共同計劃。不過各大名以其一家之兵力抵抗政府，大家處於相同之地位，未至紛歧耳。各大名之兵力，因受北條氏之嚴厲限制與分配，爲數極少，雖爲勤王二字所激動，但起事之初，亦冒若干危險。故鎌倉政府滅亡，後醍醐天皇歸京之後，各方諍勝之大名家人，各於其功，稱其勇，奮拳鳴劍，皆欲發洩其多年屏息於鎌倉政府下之鬱積之氣，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指京師而雲集。彼輩皆是敢死之兵，剛勇之士；彼輩皆曾爲後醍醐天皇滅鎌倉政府而矢親族，傷身體，或爲破敵殺將之功臣。彼輩認爲在中興政府之下，起家立名之時期已至，或要求給與若干封領，或要求敘與何等官位，舉欣欣然屬非常之望於後醍醐政府。（神皇正統記中說，當時之武夫，有自謂以我之功，雖給與日本之半猶不足者。）

後醍醐之治世無規律

及至此等武夫到達京師之後，彼輩所抱之起家立名希望，完全失敗。後醍醐天皇之目的，乃在削滅鎌倉政府以奪武夫龐大之權，俾得恢復公家一統之世。故當其滅亡鎌倉政府之時，雖不得不借武夫之力，及其既滅之後，則不願與武夫共安樂。神教政府之教，永使帝室柔弱。雖如後醍醐富有謀略之天皇，其胸中亦缺之勇氣，專專與武夫之性質相抵牾。雖在最困難之時，亦不願與武人會面。其目的如彼，其性質如此，故在鎌倉政府滅亡之後，彼柔弱如婦人女子無決斷無智略而唯巧於詩歌管弦之公家，

武夫之失

勤王與專
險勝之大
名家人人

萬黨之要

公家僱侶
之實績及
受賞

家人之各
得廢止

中興政府
之失政

武家之法
制廢絕

武家之兵
力增加

以祈禱爲事之僧侶及腰妾等，首得恩賞與高官，充滿於廟堂之上，或領諸國之莊園。公家僱侶既無功而受賞，則武夫無可補之官，可給之地；即或有之，則以一個地方而給與數人。（太平記曰：往往一壘給與四五人，各國之動亂無已時）。故武人之功勞完全成爲無效。然此尙非武夫等所蒙不幸之最大者，彼公家僱侶，一躍而執國家之政權，立身於衆人之上，諸國之武夫皆爲其所賤蔑。公家僱侶之俸額亦多，其家驕富，驕侈之情形，驚人耳目。品行敗壞，風俗頹廢，醜聲聞於四方。（太平記曰：一五千餘處之守護，國司，各國之關所，大莊，悉爲新貴之公家之恩賞，諂陶朱之富貴，飽鄭白之衣食）。此外記千種殿與交關僧正。奢侈淫亂之事甚詳。見太平記卷十二）。諸國之武夫，不僅不能與之比肩，在外者且不得不走於香車之後，在內者且不得不跪於青侍之前。且當時武夫認爲最榮譽之「家人」的名稱，亦爲朝廷所廢。向之爲家人者與凡人無所區別。後醍醐天皇之種種措施，豈能不令武夫等憤怒！但此猶非武夫等所蒙不幸之最大者。中興之政府，因其爲天皇之政府，必求其偉大堂皇，裝飾富麗；故官舍不能不新築，宮殿不能不新設，因而大興無用之土木。官庫空乏，雖發行紙幣，亦不能償，不得已乃課日本全國地頭家人所得稅二十分之一，以充其數。其他武家之法制，完全廢絕，武士之習慣，皆被賤蔑。政令朝發夕改，貯產不足賴，勳功無所訴，欲全國武夫，安心無事得乎！（梅松論中有云：「今之例，昔之薪儀也，朕之新儀，應爲未來之先例」）。新勅令時時頒發。雖設記錄所，決斷所，但經近臣臨時之內奏，諸事亦可不經記錄所決斷所而行，繪言朝變夕改，諸人之浮沈如反掌）。

武人失望奉戴源氏之二胄

上述種種情形，乃諸國誇勳功望恩賞之太名武夫到京後所親身遭遇者。武夫之功勞，不僅完全歸諸幻影，反比在鎌倉政府時代多蒙若干之不幸，是豈武夫等所能忍受者！當時之大名，兵力甚爲雄厚。往日之兵力，已非鎌倉政府所能制服，況在轉戰之際，曾表現拔羣之知略與軍功，更使其兵力增強，結合堅固。因此，封建之勢大歸膨脹，地方情形亦不如從前之安穩。若非創立比鎌倉政府更嚴肅而且具有威力

武家壽

之政府，則不能保政事上之權衡。但後醍醐天皇欲率柔弱之公家以制御勇敢之大名，豈非夢想？武夫輩於中興政府既感失望，皆捨狀止訟，怒而歸本國。（藤房諫後醍醐天皇曰：「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卒靡從官軍，毫無貳心，蓋欲以戰功得勳賞故也。因此，天下諍靜之後，望賞求封之輩，不知其數。但除公家兼賞之外，未有給與恩賞者。捨狀止訟者，恨忠功之不得賞，政道之不正也。」）彼輩屯聚懷背叛中興政府之思想，以爲今既成爲公家一統之天下，諸國之地頭家人，皆有如奴婢雜人，甚願發生不可思議之事，武家再乘機而起，執四海之大權。如此政府，其不能保持永久，不可不知。自此以後，親政名稱，不足以繫武夫之心，天皇綸言，更爲世所冷笑。天皇歸京之後未及一年，關東關西皆叛，一方鎮定，他方又起。由於其他種種情形，諸國之武夫終至奉戴源家之末流足利氏與新田氏二黨。因此，中興政府得天下未久，旋復失之。

南北朝之戰

及此二黨強大，互生齟齬，公家政府既無鎮定二黨之兵權，亦無裁判其曲直之知略，僅命新田黨壓制足利黨之強大。及新田黨歸後醍醐天皇駕馭之後，足利黨遂奉立持明院之血統而興之爭。自是兩黨之爭，成爲帝室兩派之爭，諸國之武士附此兩派之下互相戰鬥。是卽世間所謂南北朝（註三）之戰，是爲日本人民自有史以來所遭遇之最殘虐的革命戰爭。

南北朝戰爭之際，新田氏補氏等豪族雖滅亡，但足利氏之親屬臣下不得志者，又先後投南朝以抗之，五十餘年間戰亂無止時。在此長久繼續抗戰之間，弱爲強食，小爲大併，鎌倉政府之時會一度整頓之秩序，至此完全破壞，不復有可見之痕跡。當此時也，一般人民之情形，最爲可憐，無論何黨勝利，最蒙損害者，厥爲與黨爭無關係之人民。兩黨各爲盡忠於其君，各謀其黨之勝利，不計一切利害，人民之財產爲其掠奪，房屋爲其焚毀，壯丁爲其奴隸，老弱困於饑餓，種種慘狀，目不忍見。（太平記有云：「北庭顯家自陸奥登陸時，其勢約五十萬，當地土人，雖原爲無所懼之夷民，但大軍臨境時之

後醍醐天皇
與新田黨
足利黨與
持明院派
日本第一
之殘虐革
命
新田氏補
氏滅亡十
餘年

足利氏與
新田氏

民屋，被毀神社佛閣。大軍所過之地，損失甚巨，海道十餘里之間，屋宇無一存者，草木無一生存者。越後之兵，於新田義貞於越前，攻至加賀時，由此至京之道上，因多年遭兵亂，國困民疲，搜索兵糧，無處可得，在加賀國暫停留，以待後來之兵糧。自來日本國民之痛苦，未有甚於此時者。北自鬼羽之北部，南至九州之末，大軍橫行，前後不知若于次，有如大風之揚砂走石，四海皆成昏朦之狀態。南北朝之戰長久綿延，諸國次第凋弊，最初常能發動數萬大軍以作戰之強黨，後來亦喪失其生力，欲動不能矣。

鎌倉政府滅亡之後，無復有治世之豪傑。一般有名爵之貴人，蓄武力之大名等，徒驅無辜之民，互相吞噬。聞其所志，或為忠臣，或為孝子，皆未必不以華屋殘廢為可恨，但為忠為孝，又不得已而演此慘劇。嗚呼！為人民者，豈敢弄兵以叛政府？如鎌倉政府之滅亡，蓋發乎嫁始之心，演於忠義之感，猶終為武門之高名心所誘惑。此皆不足以為舉兵之理由。但若一度得權而能平治天下，猶可諒也。若始終只能碌碌社會，將何以為忠臣孝子耶！

(譯者註一) 京洛，我國古代建都於洛陽。日本當時事事效仿中國，故特稱京都為京洛。入京，亦稱為入洛或上洛。
 (註二) 王家公家，王家即皇家。公家即公卿，為朝廷官吏之統稱。中世武家專政，建立兩政府與朝廷對立，稱為幕府。武將及幕府之官吏，稱為武家，以別於公家。

(註三) 南北朝，神元元年（西曆一三三六年）足利尊氏自九州整兵大舉渡上，官軍敗績，後醍醐天皇由京都遷幸吉野，治野在京都之南，故稱為南朝。建武立光明天皇於京都，是為北朝。南朝由後深草天皇傳之後村上天皇，是為天皇，後龜山天皇。北朝由光明天皇傳之崇光天皇，後光嚴天皇，後園融天皇，後小松天皇。元中九年（西曆一三九二年）南朝後醍醐天皇與北朝後小松天皇和睦，讓位於北朝。南室後廢於統一。其間凡五十七年，史家稱為南北朝時代。

第六章 自南北朝戰亂以後至戰國時代

南北朝戰爭後國家之情形一類

大名之數
減少領地
被併併
公家武家
之關係

南北朝五十餘年之戰亂後，國家之情形，完全一新，舊時之狀態，存者極少。茲略述其概況於次。在鎌倉政府之時，所謂大小名（即守護，地頭，家人之謂），其數甚多，其所領之土地，最多不過五六莊，而且皆在其所領之地內構邸宅，農工少集其傍而成爲小部落者。小者率數十名之武夫，其大者亦不上數百人。其分配之法，極爲均衡。及至南北朝時代及南北朝之後，大名之小而弱者，或滅亡，或被吞併，大名之數大爲減少，其所領之土地，大者有四五州之多，小者亦不下一二州，皆在堅固要害之地構城郭，工商多集其近傍。其所帥之郎黨，大者數萬人，小者亦不下數千人，其臣屬之內，亦有率數千人者。（一）至於公家武家之間的關係，前後亦大異。在鎌倉政府之時，公家在社會上尙未失尊嚴，故屢使有高名心之武夫常聽其指使，鎌倉政府亦有降受其抑制。及至南北朝時代及南北朝之後，公家對武家不僅無威權，而且公家常受武家之凌辱，其領地亦爲武家所分領。（太平記二十六卷有云：妙吉侍者譏高師直師秦曰：今武藏守越後守之行爲，將使社會不安寧。吾輩既得恩賞，又拜領大恩，所歎者爲領地小寡。其近處有寺社之領地，何不越境而佔之。（中略）又都中有某王有若干領地，阻礙道路，致下馬困難，若無此王，則可修築道路，或以木作，或以金鑄，因此國王被流徙於他方。此日本紀元二千零十一年左右之事。太平記卷三十三有云：此二十餘年之兵亂，禁裏（註一），仙洞（註二），竹苑，椒房以及公卿，殿上，諸司百官之宿所，多被焚燒，至今殘餘者不過十之二三。此次東寺合戰之時，又作戰地，白川一帶，除武士之房屋外，無一家殘存者。（中略）自蓮府槐門之貴族，至上途部上薦女房等，或沈屍於大井桂川之波，或流落蓬園，寄身於田夫野人之家，或自居鄉野，桑門竹扇，夜衣薄而覺曉冷，頗

大益人民
之關係

沛流離，死者甚多。（中略）公家之人，如此窮困，死於溝壑，彷彿道旁；但武家之族，當貴百倍。昔，身衣錦繡，食盡八珍。此爲日本紀元二千零十八年之情形）。（二）大名及人民之關係，前後亦迥異。在鎌倉政府之時，守護地頭之職，雖給與有功之將士，但猶以治民爲其職務，時時有視察和督促其治法之舉。及至南北朝及南北朝以後，人民如地頭之所有品，地頭如守護之所有品，雖擅自掠奪亦不禁止。（太平記卷三十三有云：前代相模守治天下之時，其懲罰諸國之守護，除犯所定之三條禁令外，無治罪之事。今則事無大小，皆惟守護是問。一國之懲戒，聽從其意。使用地頭及家人，有如其郡黨，以寺社之所領爲兵糧，接收管領。其權威有如古時六波羅，九州之探題）。因變遷如此之大，當時之社會已非往時之社會，當時之人民政府已非往時之人民政府，當時之王室公家已非往時之王室公家。蓋不啻將日本人民之蹴而入於一新世界之內矣。

封建份子膨脹之原因

守護職之
地位

發生此種現象之原因爲何？蓋鎌倉政府既亡，南北兩黨動兵於內地。當時兩黨之兵力，相差無幾，其土地亦非兩黨之所有，門第之貴賤，亦無大異，其武夫亦非所養之兵，而爲鳥合之衆。故其作戰也，部屬之變化甚大，可以爲敵，可以爲同黨，全視戰爭之勝敗爲轉移。安危存亡，變化於瞬息之間，故爲會長者，常戰戰兢兢，深恐所得之土地及人馬一旦復失。蓋自諸國之士著武夫盛起以來，治地方之任者，不可不選將帥之器。鎌倉政府所置之守護，雖兼理警察裁判，但其實有如鎮將。及天下大亂，此等武夫失其寄託之所，唯附強者以圖生存，故戰勝則如雲而集，戰敗則如霞而散。爲將者無如之何，深恐既得之土地人馬一旦復失，不得已將諸國之土地分與自己之黨羽使管領之，稱之爲守護。此種方法雖能約束小武夫，但爲守護者並非忠節不二，堪任危急之人也，故爲將者復不得已許之以專權，與之以土地之富與榮譽之位，希冀固結其心以強大其黨。既得廣大土地之後，此等守護亦恐其失之也，遂又仿倣爲主者之所爲，分割其所領土地於其從者；從者又從而仿倣之而分割與其部下，各任其從者使統轄其領地

領土榮武

南朝之公
家北朝之
足利氏

之武夫。如此則土地之領主全爲軍閥之部將，一朝有事，即持文件而誓甲冑，拋筆硯而提刀劍，各率其統轄之武夫集於將軍之旗下以向敵。於是國內之階級增加，自上將軍下至部卒下民，各立君臣之約以統轄。此種事實，雖出於時世之不得不然，但其守土地蓄人馬之方法，亦有其巧妙之處，南朝北朝均採用之。在南朝方面，國家專權，不關縣務，雖有智略之諸將，未能施展其勢力。北朝之足利氏則充分行使此種方法，收多數黨人爲自己之黨羽，故終能亡南朝而爲一時天下所共仰之武將。此種上述變化發生之原因，固有此種變化，日本國家之封建制度遂達於成熟之期。

南朝滅後
足利將軍
亦失威力大名之權
強而無統
一之政府地方分權
追慕舊政
之情

雖然，使足利氏滅其強敵之原因，亦卽爲使足利氏失其威力之原因。蓋大封黨羽之事，雖對於防止敵人之侵入有利，但對於內部結合之力，則反形微弱。彼蓄土地之富與軍馬之力者，少有不滿，卽向主者作抵抗之勢。史家或有以叛足利氏者之多爲尊氏叛南朝之報應者。但古來各國封建之世，皆有亂臣賊子，雖溫良之君，亦不無逼害者，使封建之武族威服，未可以品行論也。足利氏雖爲舉世公認之武將，但並不能離繫人心。及南朝之勢衰，此等守護之勢力亦同時強大，足利氏不能制之。足利氏之初三代，其著臣父子兄弟之戰，殆無虛言。及至其三代之末，爲關東藩鎮之足利氏一族，漸有與室町相聞之勢。因此，南朝滅亡之後，更有比南朝可怕者，充滿於諸國。在名分上，雖有君臣上下之差別，但在實力方面，則可與足利氏頽頽之大名極多。故當其叛也，足利氏無足以討滅之兵力；及其降也，亦不能責其罪而割其封。因此當時之大名等相語曰：「若欲振家聲，除叛券無善計」。又曰：「弱者被誅，強者免禍，不若擴兵力而自強」。其凌蔑北朝如此。故諸大名雖位於足利氏之下，而力能定執事，又能倒之，威能擁將軍，亦能逐之，其專橫放肆，無所不至。是不僅室町如此，鎌倉亦然。自是以後，政事上之統一完全破壞，無所謂政府與人民之區別，無全國一般之法令，各地方各行其號令，各鄉藩各守其政規。此時人心追慕北條氏之政治，以知鎌倉之舊法度爲任執事之標準，（斯波高經），以能行貞永之治法爲選管領之準則（細川賴之）。當時並非無一特殊之人物，但國家大勢已不可救藥，空祈追慕舊

是利氏之制度而定

豪族之驕奢日甚而演進

政之情於史上耳。（建武以來增訂式目之序文有云：若效義時秦時之政，則天下可治）。雖當時所謂賢者，亦無如之何。但自南朝之亡（日本紀元二千零五十二年）至應仁之亂（日本紀元二千一百二十七年），七十年之時間，號稱小康，則不能不歸功於此輩所謂賢者。此七十年之間，雖時有騷亂，如鎌倉將軍於此時亡滅，室町將軍於此時被弑，關東及九州地方戰亂迭興，近畿之僥亦時有大戰（在室町方面，日本紀元二千零五十七年有大內義弘之亂，二千零八十七年有赤松滿祐之叛，二千零九十九年赤松滿祐將軍義統。在關東方面，二千零七十六年有上杉氏憲之亂，二千零九十九年鎌倉將軍亡，其他小戰私鬥，不遑枚舉）；但若與前後兩個時代比較，則不能不說戰亂較少。此時足利氏之制度稍定（在室町町定三職，七頭，奏者，弓長，禮式奉行，武者頭等制。鎌倉之領地做之，自稱公方，稱家老為管領，又置八屋形），法令亦備（建武以來之式目並增訂條例之類），其制度法令雖未必能實行，但能制大名等之威權而抑其驕橫。至於一般人民，在此時期中尚未得休息。戰亂未息，將軍及大名等早已掠奪人民之財產以資其驕逸；及至戰亂既定，豪族之驕奢更甚。（太平記卷三十三中有云：在京都方面，佐佐木佐渡，判官，入道，遺譽以及在京之大名等，相約開茶會。每日舉行，以盡逸樂。集異國本土之重寶，粧飾百座。圓椅之上皆鋪虎豹之皮。與會者衣各種之緞子金襴，列座並居，有如百福莊麗之床上所列千佛之概。異國之諸侯遊宴時，食膳方丈，在座之四圍一丈之內，陳設珍物，席間備十景齋羹，點心百種，五味之魚鳥，甘酸苦辛之菓子。飯後旨酒三獻既過，又有茶會，各出其珍品奇貨，以示富貴。初次之侍役，六十三人各持染織品百種置於座前。第二次之侍役各持十種花樣新奇之綢緞衣前來。三次之侍役各持沈香百兩，麝香臍三個置於席前。四次之侍役各持沙金百兩置於金絲花之盆中。五次之侍役持新製之鏡，白太刀，皆為金柄虎皮袋。以後之侍役二十餘人，亦各持種種之珍物而來。種種繁多，有如山積。其費不知幾千萬。與安者皆可隨其所愛而取之，以作為彼此交換之贈品。宴飲時又有田樂，猿樂，傾城，白拍子等助興。此輩豪族，不救貧民孤獨之飢，不施僧侶，一意揮金，有如捨金於泥，沈玉於淵。

金閣銀閣

茶會既過，又作博奕之戲，一注動輒五吊十吊，一夜之勝負五六千吊，但只有負者而無勝者，因賞賜於田樂，猿樂，傾城，白拍子去也。（中略）此等豪族皆擄取寺社領地之收入，搜括士民百姓之資財，收受人民官吏之賄賂，以供其騁奢之資。可飾後世開化之器具技藝，早爲此輩豪族所享受矣。建鞠方面有金閣有銀閣，花御所之壘，其費六十萬緡，高倉御所之屏風，一座價二萬錢，皆琢珠玉鑲金銀而成。將軍如此，大名亦倣之，壯麗其邸宅，購修無度；掠奪領內之民財而散於京洛之內。因此異國本土之珍器玩具，多集於此，綾羅錦繡，委棄於地。時人形容貴族奢修者有云，視鼎如瓦，視玉如石，視金如土，視珠如礫，可知其窮奢極侈之情形。當此時也，遊技亦甚盛，茶會常爲富貴家所舉行（茶爲鎌倉時五山之禪僧自中國傳置而來；但至足利義政之時始盛。義政亦嗜茶，舉凡茶具茶室，皆極美麗）。田樂，猿樂之類，常爲助遊宴之一種娛樂。（田樂始於北條氏之時，今已不傳。猿樂亦始於北條氏之時，足利氏之時，井田八郎，兼嘉兵衛等人出，猿樂大進步）。古來人間幸福快樂之具，多盛於暴君汚吏之世，發生於貨財分配不公平之時，識者之所以矚視之，殆以此故。

日本人民在豪族支配下之苦狀

此等貴族，立於人民之上逞其貪婪，當時人民之艱苦，不堪言狀。蓋封建之世，爲一掠奪之世界，欲免掠奪，不能不賴黨派之力。當時人民，非無欲立黨派而保護其財產者，但能力甚弱，每有所動，卽先爲當局所摧毀。既無其他抵抗之術，則惟有在上者之命令是從。大名等既抑壓人民之行動，摧折人民之志氣，乃復謀之以租稅，使其室空財盡。然其暴戾貪婪尙不止此。彼豪族貴人，搜刮財產以濫用於騁奢之途，及商賈稍得財富，卽命之以倉役而榨取其貨財（倉役者強借金錢之謂）。及其債額漸高，乃又行德政以解其負債。所謂德政，乃爲借主解除負債而免償債主之謂。因此，民間之債借完全停滯，窮民不能營生。（應仁記中有云：大名謀諸國之士民百姓以稅役，名目時變，常受詭責。各國之名主百姓不得耕作，多捨田地而乞食，流浪於四方。鹿苑院殿（義滿）之時，預徵倉役四年。善廣院殿（義隆）時，

封建之世
爲掠奪之
世界

倉役

德政

主僕之教

一年徵十三次。義政之時，倉役隨時徵收，無一定之次數，有大嘗會之月臨時徵九次，臘月爲八次，又豁免借錢，實行前代所未聞之德政。人民苦於徵斂，皆有時日曷喪，子及汝備亡之怨。要之，海內之人民，皆戴君主而爲其屬，不得不俯首聽命以滿其無厭之怒。此時若人民有體力，雖食其肉獲其皮猶不足以洩憤。不幸當此之時，彼開明人民所最厭惡之主僕之教，漸次盛興，人民受其薰陶，不特不知反抗，反奉此暴戾無慚之姿奪者爲君主，圖報君恩於萬一。

應仁之亂

東軍與西軍

雖然，主僕之教，尙未使日本人民達於不幸之極點。海內人民展轉呻吟於苛政之下，蓋一百三十餘年（自楠氏舉兵至應仁之亂）。最後至日本紀元二十二世紀之中葉，社會之潰爛終於不可收拾矣。社會崩潰的導火線，爲足利氏御所中兩個威力最大的豪族，由嫉妬之心而執兵相爭。有勇氣之各大名，各從其所好，靡然應之。攝津，丹波，土佐，讚岐，阿波，三河，備中，淡路，和泉，紀伊，河內，越中，隱岐，出雲，飛騨，近江，播磨，備前，美作，加賀等二十州十六萬之武夫，各從其守護，列陣於京師之東；但馬，播磨，備後，伯耆，備前，因幡，美作，石見，越前，尾張，遠江，大和，河內，紀伊，能登，丹後，伊勢，土佐，美濃，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安藝，伊豫等二十五州十一萬六千餘武夫，則從其守護，列陣於京師之西，兩黨武夫如獅之怒，虎之嘯，互相表現其武勇。此時之足利氏亦如王室薰染京洛文弱之氣習。此次戰爭，有如擁戴王室而戰，故足利氏亦爲兩軍所擁戴。將軍既不能制止戰亂，兩軍反得利用將軍之名，以添光榮於其旗鼓。實則所謂王室，所謂將軍，在武夫視之，舉不足輕重也。當戰事方酣之際，兩軍之首領均忽然死去，但無數將卒，猶日夜對峙，戰無已時，如是互十一年。當兩軍戰鬥於京畿時，各國之從黨，亦互相鬥爭。其中以關東一帶戰亂發生最早，足利氏之威力既不能及，則聽其所爲如對戰亂無關係者然。足利氏部下之豪族，又各相傾軋，爭戰無已，人民之家屋，概遭兵燹，豪族等之珍貴貨寶，互相奪取之後，亦完全毀失。保存於京洛之古來記事文章，多遭焚毀，

對陣十一年
關東大亂

文化上之損失頗巨。

戰國之世

不奉天子
及將軍之
命
滅絕人類
之職業

自南北朝五十餘年戰亂以來，王家之尊嚴大衰。應仁之亂十一年間，足利氏之威力亦墜地，將軍之命令不能行於大名。自王朝之時以來，源氏血統久為武人所景慕，尊氏之創業，亦藉源氏之力以得武士之心；但至此時，武人對源氏亦不重視。此後諸大名各據土地，攻擊鄰國，不聽天皇之命，不從將軍之令，唯作無益之戰爭，糜爛人民之生命財產以遂其名利慾。自此諸國分裂而成爲戰國之世，雖兼備小國，亦皆據城郭以防護其領土之親族。海內一般士壯唯以滅絕人類爲職業，老弱則爲之製造器具糧食以資其創亂。人間社會非營幸福之場所而爲互相吞噬之區域。猛惡無匹之勇士充滿諸州，寶貴之人命輕於鴻毛。個人相見，動輒成鬥。諸國之大名又相率築養武夫，灌以忠義之教，願以奮死之榮，乃驅之侵入鄰國，掠其貨財，奪其人命，所到之地任性蹂躪，然後歸國。苟爲鄰國所敗，則必再往報復，其禍更烈。自日本紀元二千一百四十年至二千二百五十年之間，如此殘酷之戰禍蔓佈於海內，甲與乙倒，丙散丁集，世亂如麻，無有止境，交互錯綜，莫能統御。在此混亂期間，無論將軍官領，或有名之公家大名，不知下落而死亡者不知凡幾。人間社會之情形至此，豈非最可憐之事！嗚呼！人豈爲他人而生於世，但當時人民不能自立於世，不得不以生命供他人之用，因習既久，竟至以爲他人而捨生命爲榮譽之事，此可謂達於人間社會可憐之極點矣。

神權忠義
報國之教

聖人之經
典

當神教政治勢力極盛之時，若有不信傳統之神權者，則其朝廷必亂；朝廷亂，則其人不能存立於世。當封建戰國之時，若有純忠義之教者，則其君家必亡；君家亡，則其人亦不能存立於世。當列國對峙之時，若有無報國之心者，則其國必破；其國破，則其人亦不能存立於世。此種報國，忠義，神權之類的思想，在當時皆於人有益；苟其無益，豈能如此集中人心。有聖人者出，集錄此種思想爲經典以教世，從而世人信之愈厚，社會之結合愈固。此後之往古，實之萬國，未見其有異例。

一時制變
之教

人間社會
之正狀

盛衰之
工具

也。由此可知此等教義，皆當時不可缺之一種工具，不可以異時異地之見解加以蔑視。雖然，以余觀之，是皆一時制變之教耳，何以謂之變？請逐一述之。夫人處於社會，豈不圖便益以使其一生快樂，各自計其利而勞作。若害不及於其身，即不計較其事。素不立國，何須報國？素無君臣，何知忠義？素無君統，何用神權？人人不為善，人人不為惡，則善惡邪正之教，將永絕於人間社會。人間社會本宜如此，是即余所謂『人間社會之正狀』也。（社會之情形本無所謂正或變，余以幸福最多者假稱為正狀，以其他為變狀）。雖然，人世變化甚多，或立國，或立主，動輒相吞噬以為快。神權，忠義，報國之教，亦德憑其勢，豈得謂為萬世不易之教？且此等教義，皆以捨一身之利益而計他人利益為宗旨，若挾一點私人利害於其間，即貶之為偽，若與許國許君之信念不相並立。嗚呼！人豈為他人而生於世？其不抱私心，實為其於私有利，又得人人之尊敬；雖聖人之教，亦以人人計私利而得私利時，始為圓滿無恨。故余以神權，忠義，報國等教為處人間社會之變狀之一種工具，而不能認為完全無缺之教。雖然，余非欲立即排除之，唯望速達排除之氣運而已。

（譯者註一）禁裏 天皇居住之所稱為禁裏，亦稱禁闕，禁中或皇居。

（註二）仙洞 太上皇之居所稱為仙洞，太上皇亦尊稱為仙洞。

卷四

第七章 日本文學之起源至十八世紀

文學之概

論事體與
論文
實與情

所謂文學者，乃人心之表現。夫凡人心之表現於世，其種類甚多；有表現於政治上者，有表現於風俗上者。文學者，人心之表現於文章上者也。其表現者，有智有情。文章之表現於情者，稱爲記事文，歷處小說之類屬之。文章之表現於智者，稱爲論文，學文論說之類屬之。此二者皆爲文學之本體。其表現於文章之中，互相錯綜，不能明確判別，但其性質自有所異。蓋論文以確證爲主，以說物理術讀者之智折服；故撰著之人不能不有高深之智識。記事以想像爲主，以寫物情使讀者之情感動，故撰著之人不能不有高尙之情感。故智與情之進步，文學史最能明確表明之。（人心甚難區別，智與情發生之境界亦難知。余嘗詳究其眞狀，心爲五官之總體，五官之外即無所謂心。但令爲求論辯之便，稱由外物而受感觸，濟爲情，稱觸外物者爲智。）今試探究智情之進退與否對於人心之關係。在古代人人急於衣食，對於事物多未加研究；因此其凡心中不可解之難，大多歸之於神業，此當時人智之概況。又因未接觸許多之事物，未經過許多之交際，故其想像淡泊而無味，迂遠而少曲折，此當時人情之概況。及文運進步之後，世人對於一事，必專心考究，非發現其原因則心中不安；於是各種事物，多經其研究明晰。無論古人藏身人，對其職掌外之事，多徧世人之傳說，對於自己職掌內之事，因研究之增進，皆不輕信迷謬。於是說明自然道理之學問，促進社會進步之論文，應運而生。是智之覺醒也。（人有探原因之心，野蠻人之歸災禍於神業，開明人能尋變動之理，皆爲探理之心。探究原因，即爲免禍災求實利之心。此心出於保生避死之天性）。又因交際漸廣，各種之人情風俗見聞亦多，想像漸歸嚴密，詩歌小說筆之興起由之。

貨財開化文學

發生，此其情之變遷也。要之，記事之巧，在於想像縝密，論文之精，在於智慮湛深，其精粗巧拙，依社會貨財之進步為轉移，以此足徵開化之進步與否。論者或曰：詩賦之想像，古代盛而後世衰，學問之研究，今日盛而古代缺。殊不知兩者皆隨時世之隆盛而進步，不過詩歌特先顯現於世，為人所易知耳。試觀日本之文學史，足知此言之不虛。

十三世紀日本文學始出世

古代無文
漢字
假名
之文章
十七條
日本最古
之文章
今紀起

日本紀元二十二世紀之時，封建亂離之災遍於日本諸州，社會情形既如此混亂，文學之式微亦達於極點。今更追溯往古，深求日本文學之本源，沿其流以探其變遷，降至二十二世紀為止。日本文章之最古者，十三世紀以前之事，已渺不可考。日本古代，並無文字，僅以言語通其意。祝詞（註一），宣命（註二）及和歌之類，在有文學以前，似久已流行。其後三韓入朝，百濟內屬，漢字由此傳入日本。日人以漢字之音寫和語，稱為假名。（吳音先傳入，其後漢音亦傳入。古事記皆為吳音。——見山崎美成著文教溫古）。自此以後，社會流行之趨向，在於學漢文；以和語綴文章之事頗不盛行，僅於作和歌、祝詞、宣命時，尚用假名。日本古代之文章，傳至今日者，實以漢文為始。十三世紀時上宮太子之十七條憲法，即為最古之文章。其後十四世紀時，即自淡海帝以後，漢文愈盛，在此時期撰著者有近江朝廷之令，太寶令，古事記（太安麻呂撰），日本書紀（舍人親王，太安麻呂，清人等撰），養老令等。十五世紀撰著者有續日本紀（菅野真道，藤原繼繩），大同類聚（醫士），古語拾遺（齋部宿禰廣成），新撰姓氏錄（萬多親王等撰），令義解（清原夏野等撰），性靈集，祕藏寶鑰（上二書皆為僧空海撰），懷風藻（為近江朝廷至奈良朝末葉之詩集，撰者據傳為淡海三船），文華秀麗集（撰者不詳，亦為詩集），經國集（良岑安世，滋野貞主等撰，自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十六世紀撰著者有日本後紀（藤原冬嗣等撰），續日本後紀（藤原良房等撰），文德實錄（藤原基經等撰），三代實錄（藤原時平等

撰），內裏式（藤原冬嗣等撰），弘仁式（藤原冬嗣等撰），類集國史（菅原道真），真觀式，延喜式，本朝文粹（藤原明衡編）等。日本文學至此始可謂奠定基礎。蓋紀史論事，爲人心進步之表徵，雖與古代相較，已若大相懸殊；然當時社會仍極幼稚，固難望其有甚美之成績。

十六世紀以前文學之情形

茲再檢閱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期間編纂之史類，其最可注意者，爲歲月日時之詳密，神祇之祭祀，赤雪白雉之發現等類，並記載當時人心認爲祥瑞妖孽之事件，而對於事件之重要與否毫無識別，亦無所用其取捨筆削。後世史家認爲編史之要點，在於明示此一事件與彼事件之關係，但當時之作家安能語此。當時作家之知識，完全仰賴中國。中國史書多記載一人之品行性質對於公衆之影響，當時日本史家尙不能爲此，只能將當前顯現之事件，寫實的記載而已。至於此類事件由何種原因而發生，著者全未注意。社會中事實甚多，歷史不能不儘載重要之事件。但當時史家，不知取捨，每遇一事件，雖對於人事無關係者，亦一律記載，唯以卷帙之浩濶爲功，殊屬可惜。要之，當時之史籍，只能說是年表，而不能謂之歷史。在記史方面如此，在論事方面，亦何莫不然。

無定論定
見史類而
執筆故僅
有形式

誇古語之
博精

事件之羅
列不記因果
關係

作者當論事之時，不能不先有一箇『定論』，以爲立論根據。但觀日本古代作者所撰之序文或論文，未有自己先有一個定見而後執筆者。大多以四六之句，排偶之文，由外部引出議論，卽爲盡作論文之能事。文學本爲人心之表現，人心不能以四六計量之，天下之事亦非由排偶而成；因此，欲吐胸中之議論，必隨心以發揮，決不能爲文章上之法則所製肘。此理至明。但無議論之內容而作論文，則不能不利用法則以推演出可奮之事。此種體裁，決非真正之論文體。又有強綴至難之古文字以誇示博精者。不知縱有充足之議論，一用古語古字記之，則其意與誰而難解。至於本無議論的主意，而強用古語古字連綴成文，豈能以得高論！蓋當時人心既未進步，而又以至難之外國語作爲文章表現的工具，故發生上述種種弊病。三善清行之封事和菅原文時之封事，充分表現出此種弊病。

漢文體與
日本體法
類和附法
附記友道

日記體

十六世紀末葉漢文之體
但文學進步之趨勢，非文體滋滯所能長久抑制。十六世紀末葉以還，至難之漢文體，漸與日本之體法融和，遂有自由記載之文體出現。例如將門記，純友追討記之類，其文體自今日觀之，雖極奇異而有可驚可笑之處，但比之於舊法，則所拘束之國史及論文，則有自由敘述作者意思之優點。此等著述雖決不能稱為精巧，但尚適宜於敘述個人之動作與社會之事情。此種變成之文法，終成爲一種體裁，書信及日記等，亦採用此體，可稱之爲日記體。自文體變化之後，文章與人生轉形親密，以漢文作歷史格式之事漸歸衰歇，而改以日記體記載之。此類著述之最大者爲九曆記，權記，岡屋關白記，小右記，中右記，春記，水左記，經信卿記，長秋記，台記，山槐記，玉葉，末海日次記，吉記，明月記，玉華殿記，三長記之類（縮印版中削除岡屋關白記，末海日記以下諸書亦未列入），讀之索然無味，其體亦不免俗。此等著作中，非無後世史家可摘取之事迹，但當時作家缺乏筆削之能，凡耳目所及之事，不問其重要與否，一律記入，以不缺乏爲宗旨。故雖文體稍得自由，而以其記載許多不關重要之事，亦使讀者不易得知當時之實際。

和文始出世

當漢文變化之時，以日本語法寫作文章，漸行於世，實爲日本文學之幸事。和文之最古者，莫如古事記，但其語爲吾語而非當時之語。以當時之語記載者，爲時稍晚。及平假名，片假名發明，以之撰和歌，風行一時；歲月既久，與世融合，乃遂到以日常言語寫爲文章的時期。十六世紀中葉以來，以和文撰紀行或小說之類漸興，今舉一二例以明之。十六世紀有伊勢物語（註三）（作者據云爲業平朝臣），竹取物語（作者據云爲源順，但此說無證據），土佐日記（紀實之作），住吉物語（作者不詳），須磨記（傳爲菅家所作，但不確），宇津保物語（作者不詳），大和物語（作者有謂爲滋養，有謂爲華山院，皆不確）之類出世。十七世紀有落久保（作者據云爲源順，不確），濱松中納言物語，源氏物語（藤式

古事記
平假名片
假名和歌
紀行日記
物語

部作），袂衣（大貳三位作），和泉式部日記，男女交換故事（作者未詳），枕草紙（清少納言作），松島日記（傳爲清少納言作，不確），紫式部日記（藤式部），蜻蛉日記（右大將道綱之母）之類出世。至此時其用語漸廣，其文字漸雅，記養宴秋眺，寫才子佳入之情，真細緻而精巧。以文字記事論事，本爲至難之業，唯用本國之言語本國之語法寫之，方能表現作者心中真意。十七世紀之和文實爲日本人心之曙光，恰如播雲霧而見青天，令人眼界一新。

和文所表現的想像

撰述文學史時，不應分別文章之爲和文漢文，只應取其主意趣向之巧而有味。讀過從前缺乏理論的漢文之後，再觀當時和文之內容，不能不令人深佩和文敘事有頗末，遺語有趣味，實在往昔漢文之上。但不幸和文之起源，多成於婦女之手，男子以撰著爲事者，甚爲當時所賤視。因此文章缺乏重要之精神，且其語句冗長而少變化，多記敘同類的事件。譬如當所著之各種物語，在當時幼稚時代，可謂極巧變而進矣；但無活潑之氣力，又乏引人注意之變化，由此足證當時人心之幼稚。蓋小說之趣味，在於集合各種之人事狀態；文章之巧妙，在於得抑揚頓挫之節調。但此類物語，多專於描寫當時優遊閑暇之貴主人（註四）的蕩情妄念，除此之外，別無題材。文學本爲人心之表現，以藤原氏以來柔弱之風俗，欲徵活潑敏捷之文章，固爲奢求，但其文之缺乏氣力，亦屬可驚。譬如源氏物語，袂衣之類，雖優美之情極多，但亦不能免此弊病。

十八世紀文學之進步

因人智進步，用語愈廣，文章亦愈精，此乃自然之理。反之，用語愈廣，文章愈精，亦足以證明人心之進步。在十八世紀以前，漢譯之用法尙未與日本之習俗相融和，漢語和文有互相分巒之概。及歷時既久，漢語漸浸入世俗；自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所謂和文之中，參雜漢語愈多。此時漢文之變體日記體，更與日本之俗習融和，日本之俗文亦近似漢文之句調，其間自然有一種「中問文法」發

婦女之事
門語之柔
情性

日記體

日本文

生。著者稱之爲日本文，卽至今日本仍沿用之文章體裁。十八世紀之末，有所謂榮花物語一書（四十卷）出世，其著者據云爲藤原爲業，又有人謂爲赤染衛門所作，未知其詳。及至十九世紀之初葉，有續世繼一書（十卷）出世，其著者不詳。此外相傳藤原通憲著本朝世記（三十卷），惜未傳於今世。上述數書，實爲日本學者以日本文記載歷史之濫觴。（縮印版中無「此外藤原通憲……惜未傳於今世」一句）。

以日本文
記歷史
之始

大凡一種事物，最初發生時，必不能完全。上述榮花物語與續世繼二書，爲以日本文寫歷史首創之書，仍不免採用古昔冗長之物語體文法。書中所用體史的體例，亦恰如物語中所用之體例，揭爲月宴，夕霧，雲井，子日，初春等題目，區分爲各篇而述之。且所記之事實，多爲帝王之遊宴，大臣之榮華，后妃之入宮等事；其間雜以和歌，並描寫種種之女兒狀態。其所注意敘述之題材，決不能稱爲國家之重要事件，但若與混合諸事錯雜零亂而記載之六國史等比較，則稍有選擇之能力。且當時情勢，王室柔弱已極；所謂政事上之重要事件，觸於世人之耳目者，大抵不外遊宴漁色等事。此輩作者能記之使後世史家得窺古代情形之一斑，且構成將來進步之第一階梯，其功亦不可沒。

進步之第
一階梯
之教育學校大學
寮
トトト點學文科燈
油料
大江與菅
原

當王朝之時，唐人之說盛行於日本，建學校優遇學子等類之事，世人稱其爲仁政美舉，所謂聖人之道，在當時之人看來，在於以政府保護教育。近江朝廷之時（十四世紀），始建學校；迨至奈良朝，諸國亦建學校，且設大學寮，由式部省管轄之。（當時讀漢文，因尙未發明假名，漢文和讀時，用所謂トトト點。トトト點者，於漢字四隅之上下，註以レ，或ハ，或○，或／等點，表明其字之文法關係，以便於和讀。此種方法片假名流行之後漸廢除）。自此以後，歷朝給金銀田園等於學子以獎勵文學，稱爲學文科，又有燈油料，燈望等名。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之後，建立學校於此，自唐迎教師來教，其後又遣學子至唐留學。此時有大江菅原二家，專管學事。此外貴紳之學校亦多，如弘法大師之綜藝種智院，權林皇后之學館院，藤氏之勸學院，源氏之獎學院等，盛極一時。其所攻究之經籍，爲毛詩，尙書，禮

記，周易，左傳（統稱爲五經），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以上統稱爲九經），論語，孝經，老子，莊子（以上統稱爲十三經）。王朝之獎勵文學，可謂至矣。當時社會已不似往昔之鄙野，時人多做編六國史及其他律令格式之類浩瀚的典籍。但人智之程度，未必由政府之獎勵而增進，當時所撰之典籍，至今觀之，內容淺薄，僅可置諸高閣而已。學士何以較其他職工爲貴重？文學何以較其他貨物可尊貴？其功績及於人類有何不同？以養者觀之，並不見學士文學有何較爲貴重之點。況徒通古字明古書之學士，更不足道。人心之進步，與貨物之進步，相依併行。今妨阻貨物之進步，而獨欲文學之盛興，恰如車之兩輪，退脫其一，而欲他一輪前進，必不能也。由上所述，可見王政柔弱至不能保護學士時，恰爲日本文學漸獨立發展之時；王朝將傾覆之時，日本始有可觀之書。此種演變，雖有其社會的原因；但文學之衰零，亦深可憂慮。蓋文學因社會之趨勢而衰，卽爲社會衰頹之一明證也。

（譯者註一）祝詞 日本古昔祭神祇之文謂之祝詞。包括祝詞，齋詞，大祓等數種。

（註二）宣命 祭神，改元，立后，立太子等時天皇所下之一種詔勅。

（註三）物語 日語稱小說神史當言之類爲物語。

（註四）愛上人 公卿祭塔之稱。

第八章 自鎌倉政府創立至戰國時代日本文學之沿革

十九世紀文學之進步

鎌倉政府
創立與文
學之大進
步

鎌倉政府創立一事，爲日本紀元十九世紀日本政事上發生之一大事件，在日本文學方面，促成了非常的進步。蓋天下非常之改革，其感觸人心至爲強烈。此次革命經過，其影響所及，不僅將政府設置之地點移至關東而已，上則向來認爲帝室專有之政權，離去帝室而歸於武臣之手，下則親民事管理地方事務之國司，其權削滅，由諸國之地頭起而代之。置身於此世運轉移之際者，迷離徬徨，莫知所向。尤以有史以來未有之離奇事蹟，如以萬乘之尊屢不免於幽囚之辱之類，先後相繼發生，久享泰平耽於榮華之京都人士，亦不能不感覺非常之恐怖！當此時也，素被賤視鄙夷之東國男兒，攻入京都，京都人士被逐至關西，其他人民亦轉徙流離於諸國之間。經此變動，當時人民得與他方之新風俗，新語言相接觸。夫人智學於接物，人情起於觸事。數百年來安土重遷毫無變化之人民，一旦目擊此新奇的社會現象，胸中自然增添許多著情的元素。此種元素，在鎌倉政府勤慎的政務之下，培植發育，遂以較短之時間而開爛熳之花。發蘊郁之香矣。迄十九世紀中葉，遂有大鏡、水鏡、二書出世。此三書實記述史實，實能解歷史之體裁，由庸雜變爲簡明，爲易知古代沿革的好書。二書只記述帝王大臣等詠歌吟詩之事，故其內容仍不免以貴族之奢侈生活爲題材，雖於國家重要事實之記載，缺略不完。但若與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世之榮華物語及續世繼比較，則編史之體裁已太備。當榮華物語出世以前，日本學術界記述歷史者，必用漢文，絕無用蕃雜漢語之和文者。當時習俗，和文僅用於記述草紙（註一）物語一類之文章。榮華物語，續世繼的作者，雖以和文記述歷史，仍未用嚴格之歷史體裁，沿用往昔物語舊例，揭優雅之題目以區分篇章。至大鏡水鏡出世時，情形大異，敘述史事亦用和語文法，能依政事進步之順序而記述歷史。由此祇

人民移住
與日學新
社會現象

大鏡水鏡

編史體裁

知時世之進步。

日本文章之基礎確立

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
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不久，葉室大納言時長所著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言（保元物語及平治物語語句柔軟，其中漢語不少；而源平盛衰記稍帶漢文的口氣，故與前二書同成於一人之手，不無疑問。茲據羣書一覽，均假定其作者爲葉室時長），及信濃前司行長所著平家物語數書相繼出世。觀此二氏之著述，其行文之巧妙與體裁之完整，不僅超越十八世紀諸書，且實爲後世史家應奉爲圭臬之編史術。蓋文學之進步，因文體之自由，始能充分吐露思想。而文體之得自由，以言語之增加爲基本要素。自漢語之中參雜和文以來，文章之用語大增，行文亦得自由。但在十八世紀時，漢語與和文尙未十分融和，不無分離之象。及此二氏出，以漢語記活潑勇壯之狀態，以和語表現幽鬱悲哀之心境，以二者交合寫種種複雜之情實。總之，文章首須有重要之想像力，詞句之間尤須含有無限情趣，然後誦讀之際能引人入勝，妙味無窮。漢語與和文融洽交用，日本文學之基礎，始於此奠定。

以想像力
統一漢語
和語

編史體裁之改良

紀事體
編年體
類聚圖史

二氏在日本文學上之大功，非特因其想像力之密緻與修正文章體裁；彼等之功績乃在於創立當世所謂記事體，即以紀事本末之體撰著歷史。歷史本爲記事之書，故不可不依事實之種類而示其沿革。但自日本王政時代以來，編年體，即以年度類別事實之體，甚爲流行，將完全無關係之事實，只因其發生之年月相同，遂混記於一文之中。當時史家之精神，完全在於詳其年月，至於當時之政事情形如何？人民之情況如何？史家皆置之不問。不僅完全不記述之，即其所記之事，亦甚難看出頭緒。唯有當公之類聚圖史，稍具端緒，使人佩其卓見；但所記者，仍非國家重要之事。及二氏出，不論年月之古今，唯依事實之性質而類別記載之，雖數代之事，使人一讀之下，瞭然於胸。夫天下之事，複雜錯綜，沿革各異，欲一一敘述之，決不能嵌入於編年欄中。二氏乃解其約束，使人心自由發露，其功可謂偉大。且自此數

時長行是
之功厥

書出世以來，歷史始漸離和歌而獨立，專記述政治上之事件，雖人之品行言語不與政事相關者，亦記述之。自此體裁出世以後，數百年間之史家皆據以記述當時之事情，俾後世之人，得窺興廢存亡之理由。其功甚大。由上所述，可知在日本歷史上得知政事上及人民之詳情，實為保元平治以後之事。

法律之成立

在鎌倉政府治世之間，不僅在編史的體裁與行文的方法上，有上述種種進步，在法律方面，亦有顯著之成績，可為後世模範。當玉隆時代所制定之法律，完全採用唐朝制度，果能適合當時之習俗與否，今不可知。但武人羣起於各地，封建基礎成立之後，此種法律未能統制地方，辭爛情形，已如前述。及至鎌倉政府之時，根據當時之社會風俗，編制法律，以固國體，是即所謂「貞永式目」。此為日本以本國習慣為基礎而制定法典之始。既適合於當時之社會情形，後世政府亦永遠據之以制法典。貞永式目之編者係在松律史臣將長留光榮之絕錄，可無疑矣。

三平世紀迄未有益之典籍多出世

鎌倉政府創立之始，文學進步如斯顯著，在鎌倉政府治世期間，所出書籍，皆有可觀。茲略舉其一二文和承久記六番者添謀之於合昔物語亦古今著聞集，辨內條日記，讀政典條日記，源親徑之京關紀，狩野類自或議政治得失，或纂奇事異聞，或講佛理，皆斐然可觀。至其文章體裁，則於和文中參雜漢語，亦書漢文之趣味。

以上所述此時由漢文演變而成之且語體當尚稱流行。如懸管抄，曼珠記，玉海，玉藻明月記，山槐記，平戶記，東鑑，百鍊鈔，德仁朝繁華，義續記，類公縮印版中有猛熊關白記，玉蕊，明月記，三長記，平戶記，吉黃記，在採編，德見報，吉續報，公衛發報，吾妻鏡等，成於朝廷或鎌倉政府官吏之手，依然保存往昔粉華之體裁，未見有所改良。又如日蓮上人之註書讀，親鸞聖人傳繪及元享釋書（此二書縮印版均刪去）及年中行事之類，亦皆以此體裁撰述。自此可知當時之公文尺牘及日記等，尚沿用此體，

此與與

不過日記體的文章，有與和文日漸融合之現象。

當人智未進之時，論究自然之理以增進人類幸福，自屬罕觀；但當時作者對使人心恐怖之事，則多取為題材，以迎合世人之心理。因此，當太平之時，日常習見之事件，多湮沒無聞；及至門閭戰亂之際，殺人攻城勇將猛卒之壯烈行爲，則詳載於史籍。試考當時各國之歷史，皆同此例。鎌倉政術之治世，凡一百五十年，其間執權與評定乘之有智略勳功者，古史之中皆詳爲紀述。足利將軍時武人爭奪羨慕之事，亦可於當時史中見之。但和平時期之種種事蹟，當時史家並未注意，政道如何，文治如何，今日皆不能知其詳，深爲可惜。由此一事，亦可知文藝倉政府時代文學尙未普及於民間也。

元弘建武
之爭亂與
文學

日本文學受一百五十年太平雨露之後，政事上之動搖又發生，使鎌倉時代之文學放最後之允輝。所謂動搖，即二十世紀之末元弘建武之爭亂。前文已略述及，戰亂雖不能使文學進步，但因作者得多有機

增鏡

神皇正統
記

太平記

會蒐集人心複雜事件，故反映其時代之著述，多於此時出現。及元弘建武之亂起，鎌倉時代養成之文學種子，更添熟練之機，而於美麗之花於世。茲列舉最有名且有益於後世之作品於次。增鏡（據傳爲一條冬良著，與前述之大鏡，水鏡，合稱三鏡），保歷間記（著者未詳），神皇正統記（源親房作）（縮印版中有「北畠親房在常陸作之」等語），太平記（作者極多），園太曆（太政大臣公賢作）（縮印版中無此書），船上記（作者未詳），伯耆卷（作者未詳），關城舊書（作者未詳），皆爲可觀之書。雖其所述，多爲戰亂之情形，或帝統將門之爭執；但其中亦常論及政事之得失，帝統之正閏，以及公家武家盛衰之原因等事。作者之智力不同，其議論不無偏頗，但其文體，則均與盛衰記，平家物語相同，多參雜漢語於文中。其中如太平記，用漢語之處極多，稍有誇示淵博之嫌。要之，就文章而論，雖難與盛衰記，平家物語較高低，但其所注意之題材，則較往昔之著述遠爲優勝。其中如神皇正統記，統括日本古來之沿革，網羅國家重要之事實，幾無所遺；其注意王家之衰頹，武族之興立等，皆詳究其源由，實可謂難得之書。蓋在日本古代，記述社會之情形而論其變遷原因之書，實未曾有；如盛衰記與平家物語之

類，其文體雖極巧妙，但其注意題材之眼光，遠不及二十世紀末葉出世之各種作品。而神皇正統記，又爲最有眼光者。若與後世之歷史比較，雖其議論尚不無瑕疵，體例亦有欠完備之處，但在二十世紀而有此書，足爲當時之文彩誇耀矣。

佛法對於文學上之效果

當時隨筆之類的作品，亦多可觀。明惠上人之檉樓草子，兼好法師之徒然草，議論高尚，描寫亦極有手腕。且其內容，稍論及心理之事，實可謂賦予日本文學一種新原素。又程朱之學，亦於此時傳入日本，據云玄憲法印首傳此學。文學史家稱此時爲中世文學極盛時期，實非誣語。蓋人心之發生學問之研究，爲後世開化之結果；在當時經驗極少之社會，甚難期其發現。但想像之力，則與人心之發展而具備。因此，在鎌倉時代的各種作品中，雖增進智慧之資料完全缺乏；但激動感情之趣味，則當時作品中極爲豐富。所謂當時文學上之進步，實不外想像之進步。試觀當時記史論事之文，多談無常或述憐物之情。此種想像，完全來自佛法，爲王政時代之文章所無。如源氏，狹衣，榮華等物語，豔則豔矣，但不使人發生悚然恐怖之想像。此種想像，起於源平盛衰記，至平家物語而肅靜，佛法之想像完全貫通於全篇。其所以如此者，因自王政之時以來，佛道久已浸染人心，至鎌倉政府之時，禪學愈盛，因而文學上亦充分表現此種想像。日本文學因佛法之想像而得益不少。

二十五世紀以後文學次第退步

鎌倉政府既亡，封建武族割據海內，自此以後社會次第衰亂，文學亦隨之而有退步之勢。但在二十世紀中葉，即足利氏治世之始，鎌倉以後之文物尚存，文學之可觀者亦不少。當南朝之末，時人之作品如櫻雲記，續神皇正統記，南朝記傳，梅松論，吉野拾遺之類，雖多不及上述諸書，但其文法整嚴，記述當時之事蹟甚詳，皆爲必要之典籍。其後封建潰裂之勢，日增月進，社會情形，日趨危殆，當時出世

隨筆
類於草
程朱之學
中世文學
最盛期

佛法之影
響國學極
盛

足利氏治
世之始

源平之戰
與文學
之消長

源平之戰
與文學
之消長

源平之戰
與文學
之消長

源平之戰
與文學
之消長

諸書，亦因之而情味枯燥。譬如應永記，即較明德記爲劣，嘉吉記又較應永記爲劣。其後雖有椿葉記，鎌倉大草子（此書稍有可觀者），應仁記之類，其文意多不明。要之，自二十五世紀以來一百年間，文學有次第退步之勢，深爲可歎。王朝時代之作家汲汲於採用漢文之古語，不能發揮人類天性之智力，此種弊風，在當時尙不流行，其文體亦極自由，與鎌倉時代不同。但因社會衰亂，世亂如麻，人民無暇以文學爲事，只注意於亡敵之策略，筆硯之樂散，而奮戰屢獲之悉增，至此東洋孤島之內，文學之光焰全滅，可勝嘆息！

竊嘗思之，欲知某時代文學之消長，可據其時文學上所記之社會情況而推知之，甚爲便利。試推想源平之戰及南北朝戰爭之情形，關東武夫之勇，王都小婦之美，其他攻城野戰之種種奇蹟，歷歷如在目前。譬如古昔應永（日本紀元二千零十九年）嘉吉（二千一百零九年）之亂，由其將士之如何有智，武夫之如何猛勇，可以推知當時武勇之氣未滅，鬥爭射擊之術，不拙於古時，至當時之才子佳人，亦非無有，只以文學衰頹不能記之以傳於後世，遂使歷史上，不見可欽慕之人物，嚮往之事跡。由此可證文學之盛衰。

想像之沿革

以上略述文體之變，遂與智情之盛衰，益更回顧古代文章上所顯現之風氣。自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僅漢文流行於世，思想中缺乏研究與想像，文章上只呈智情未分之混沌現狀。是蓋以幼稚之心思欲記憶至難之外國文章語言，終無顧及其他之餘力。迄至十六世紀，日記體及和文二者出，稍能窺知當時人心之一斑。若就竹取物語及空海保物語而考當時之想像，其感情完全與今之人不同，令人有入異境而逢異人之概。當時尙以此種想像發生，令人難於索解。蓋當時之人接物未多，其思想不精密，因而有神奇之想像發生胸中，故其文章亦素樸之味。自十七世紀末葉以來，文弱之氣充滿京都，滿朝公卿，有如婦人女子，其文章亦冠帶加綴，衰淫亂之風，但亦自有豔美之情味。迄至十九世紀，關東武夫之氣習漸表現

鎌倉時代

武人專橫
與文章衰
伐封建亂離
與文學之
滅亡智力與研
究虛信與
想像研究與想
像之關係想像與研
究在文學
上之關係

於世，文學之中又添加勇壯之氣。盛衰記及平家物語兼具此二種特點，故讀之使人發生樂趣。自此以後，天下泰平約一百五十年，人智始知觀察社會之大勢，故時勢之議論漸參入文學之中，文章自然演成鮮肅完備之體。此時之作品如保歷間記，神皇正統記，皆有特殊之精神，而體例亦加嚴密。其後社會成爲武人專橫世界，殺伐鬥爭之災，掩蔽雲天，文章呈紛雜之態，終至完全缺乏情味。在文學史上看來，日本文學發生甚早，但在至衰之時，失其保護，強將日本之精神注於外國之文章古語中，故不能十分發達。及鎌倉政府時代，日本文學求最便利之文體而發育，終至奠定日本文學之基礎。但不久又成爲封建亂離之世，在世亂紛紜之中，文學亦因而衰邁。應仁之亂以後至德川氏統制天下，約一百五十年之間，文學無再興之勢，唯見武人鬥爭之慘狀。

研究事物之理，欲知其功用，固爲智力之活動，應屬於研究之部門；但究其理知其功用之後，隨之而發生之感情，則屬於想像之部門。例如「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等語，雖係說明萬有之理，但心中悟其理而覺人生之無常，則爲想像。故研究與想像之性質雖大異，而其相依恰如比隣之密切。研究淺時，想像自淺；研究進步，則想像亦進而至於高尚。譬如赤壁賦中有「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繚，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等語，非有追憶往時之智，則不會發生此種想像。又如「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非了解其理，則不會發生此種想像。又如徒然草中，因受佛法之影響，多玄雅之想像；若對佛理無十分研究，則決不能寫出如彼優美之文字。故欲述最巧妙之想像，不可不有最廣博之研究。此爲想像與研究在文學上互相依待之特性。

（原書註一）原書 中世物語散記體而散文中有多量之小說。

卷五

第九章 自戰國之亂至二十三世紀之中葉

戰國離亂之情形

如前章所述，足利氏之末葉，政事及文學之情形，甚為衰頹，社會秩序亦甚紊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親族兄弟以爭利相屠殺，蓋為當時常有之事。昨日擁有土地人馬之宗家，今日則夷為平民；今日司大權之貴人，明日即零落而亡命。三管領四職之類的高官，式微散離，兩屬意中事；乃至大名不能統屬其家臣，家臣不能統屬其陪臣，散亂而不能復合。雖有時或復集合，但不久即復離散，如陰雨晦暝，雲霧隨風而離合無定也。

亂臣賊子齏出之理由

蓋當社會有秩序之時，人人為保存其利益，一國一家互相協合；但當封建離亂之時，人人之利害各相衝突，苟有利於其君，則有害於其臣，苟有益於其父，則有損於其子；此類事實，當時甚多。若臣不弑君，則君必殺其臣；子不違父，則父必苦其子；社會情形如此，忍心弑逆之輩，安得不出現於營世耶？夫弑父弑君，豈人之天性！彼視賤人之窮苦，尚知憐憫，何況親戚朋友兄弟夫婦之間，豈不望親愛和睦！但封建之紛亂鬥爭，卻多發生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何也，蓋封建之性質有使其利益離間之原因，反乎人情，實出於不得已。因之，無論何種社會，何種時代，苟遇封建之亂，此類反常之事未有不發生者，雖有聖賢之警戒，而不能禁，雖有報仇之義戰，而不能制。然則當封建紛亂之世，欲絕亂臣賊子於社會，蓋為不可能之事。自日本紀元二十二世紀之初至二十三世紀之初，在日本社會中，只見此種

悽慘殺戮的現象而已。

英雄豪傑能逞其智略之理由

在此黑暗世界中，有一線電光閃灼於各地，掃除妖雲慘霧，使青天白日再呈現於社會之中。此電光為何？即豪傑腦中所潛伏之智略是也。人嘗欲避死時，智略即勃然發生。此等英雄，置身亂世，一戰而敗，固至國破身亡；若一戰而勝，則亦為起家揚名之機會；故其智略鬱然而盛，戛然而止，忽起忽止，手轉萬化顯現於社會之中。在封建離亂之社會中，此種現象固常常發生者也。自二十二世紀之末至二十三世之初，北條氏起於伊豆，征討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併信濃，飛驒，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後，併越中，能登，加賀；毛利氏起於安藝，併山陽山陰諸國；織田氏起於尾張，併近畿東山北陸諸州，皆有擁兵貯糧欲併吞天下之志。

用兵之法

細考此數人用兵之法，各有其特別之方式。如北條氏之兵，不肯正面攻擊，常避其銳而搗其虛，其狀恰如從敵人背後伸其脚而蹴倒之。武田氏之兵，正堂堂以向敵，而以奇兵一隊突出其間以衝擊，其狀恰如相對比武而於不意間以一拳擊敵之胸部。上杉氏之兵，則以勁旅攻擊敵之中堅，苟不能破之則退，其狀恰如舉雙拳前來擊敵之兩頰。毛利氏之兵，貴謀而不好鬥爭，其狀為使敵之身體疲勞而後擊倒之。織田氏之兵，弱則討之強則避之，一度破敵則乘勢而進，使敵無自禦之餘暇，其狀為窺虛尋隙，乘敵不備而擊倒之。

英雄之私利合於人民之公利

古人云仁者無敵。上述諸氏，雖能使其勢力日益強大，但考其致勝之事實，皆非能為仁者之致勝也。考諸氏之所為，或放逐其君父，或流亡其親戚，騙詐百出，殺人奪財，無所顧慮，何曾有救民塗炭之念？不過圖遂其私欲，欲得其私利而已。雖然，飢者不擇食，渴者不擇飲，人民在亂世苟得一線生計則樂為所用，此人之常情也。足利氏衰微後之人民，在封建糜爛之時，唯重稅壓迫之憂，自己郡村成

私利私慾

織田安塚
私利與公
利

爲巷戰之場，貨財被掠，生命被奪之是懼。但上述數氏，實巧於耕戰，使敵兵不敢壓境，人民得以安居，故人民多歸服之，使其日趨強大。故數氏之所以強大，雖不能謂爲行仁道所致，但其私利之所在，實與衆人之公利相合，是以能統治衆多之人民，課之以重稅，施之以抑壓，屢創戰亂而無內顧之憂，更進而逞合併天下之志。

人情之慕奮習

京都城
室代之宗
家

語云，故都喬木，過之者仍念慕不忘。彼古昔英雄輩出統治甚久之舊都城，或屢代得人民尊崇之宗家，雖世易時移，僅遺其名，而世人對之仍抱愛慕之念，歷久不變。王室及足利氏衰微之後，不能統治帝都已久；在王室及足利氏觀之，帝都之得失，無大影響，得之不足以增加聲勢，失之不足以損威權。但帝都及足利氏宗家之名，尙存於世人耳目之中，有擁天子助將軍而出兵京都者，則可博美名於天下，使武人之心震懾。因此，應仁以來，雖當海內紛亂之際，諸侯之稍有勢力者，常陳兵京都，助足利氏護王室以誇耀天下。天下之大名雖不畏其威權，但亦不能與割據他國之大名同量而等視之。當二十三世紀之初，割據英雄之唯一志望，厥爲入京都助足利氏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彼等所以吞併四鄰，潛蓄勢力者，無非欲達到將來在京都獨樹一幟的願望，其狀殆如夏蟲暗夜之慕燈火，自四方八面集中於一點。

織田豐臣德川三氏之勢力

信長以地
利先入都

織田信長以其地勢之便，先得入都。當是時也，毛利元就，北條氏康，武田信玄，上杉謙信等豪傑，先後死亡，其嗣子皆不能繼承先業。織田氏分遣將士於各地，欲以代替從來割據之大名，而遂其統一天下之志。但信長爲人殘忍嚴酷，久已不得臣下之心，終爲其部下所殺，其事業因以中斷。此爲日本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織田氏倒後，天下再解體。當是時也，德川氏併甲斐，信濃，駿河，遠江，參河五國；島津氏盡吞九州；長曾我部氏併四國；北條，上杉，毛利諸氏尙割劇其舊地；而織田氏諸將各分據其領國，有獨立之志，是殆有如雲霧將合，暫爲狂風所阻止。

秀吉外表之統一

羽柴秀吉爲織田氏之將士，崛起爲信長報仇，對織田氏之宿將，或討滅之，或使之服從，卒至國富而兵強。於是欲速統一天下，稱天子之命以招諸侯，招而不應者則率諸侯征之；其強大不能征滅之者，則與之謀和，或以其母爲質，或使其單身前來以議親善之道，終使足利氏以來分離已久之日本國勢再歸統一。

然豐臣氏之連合海內，不過外表之統一，內部實無制服各諸侯之能力。諸侯之附屬，強半由於和議，而非以武力征服，故其封領依然如舊，大有尾大不掉之勢。豐臣氏既不能滅削諸侯之勢，不得不甘遇優待，以圖一時苟安，相與陸高官起路臺而示富豪於天下。此類兒戲之事，固不足以長久維繫英雄之心。豐臣氏非不欲削弱諸侯，唯恐實行危險，欲以權謀制之；馴至豐臣氏之命，竟爲諸侯所拒而不能行（豐臣氏欲給養子於毛利氏，爲小早川隆景所拒。此類之事頗多）。至其末年，失望之極，終於起征韓之軍以混亂天下。故秀吉死後，天下諸侯羣思獨立，較足利氏之初爲甚，有再返於戰國紛亂時期之勢。

征韓之失
家康之職
關原之戰
天下平定

當是時也，德川家康威望最高，兵力最強，諸侯無及之者。諸侯之有才勇者，欲先除德川氏而自遂其私，連合以攻德川氏，演成關原之戰。德川氏一戰破之，使天下諸侯震懾。於是沒收浮田，長會我部之封土，大削毛利上杉氏之勢。其他小諸侯，或被討滅，或被譴罰，使好名喜功之寇雄武夫不敢亂天下。自是以後，德川氏掌握政權，天下歸服，永絕戰亂之跡，使海內人民得享泰平。此爲日本紀元二千二百六十年頃之事。

封建亂離之世因英雄之力而集合

二百七十年之戰國時代已去
門閥絕跡
弱肉強食

自元弘建武年間日本社會中調叶之約束廢絕後，約二百七十年，始得再觀泰平之日。蓋在此二百餘年之內，封建門閥之風氣尙盛，以凡庸之武族支配人民，其協和每年解體，遂至一郡一村，互相割據，分崩離析，各不相屬。至其極點，門閥之勢完全絕跡，高材逸足之士，揮其筋骨與智略，崛起於社會。自是以後，乃復漸趨集合。夫弱肉強食，在社會進化之過程中，似爲不可避免之事實。當二十三世紀之

由亂離而
集會

劫業，英雄豪傑輩出，吞併其鄰邦以形成大國。織田氏之兵，其鋒甚銳，雖不能迅速擴充其土地，但四出攻伐，已令海內震懾。其後豐臣氏欲以靖和優柔政策，與大名親善，但諸侯終不肯垂首服從，僅得形式上之連合。及至德川氏出，以當時無匹之威風，一戰而使天下畏服，完成統一。自二十二世紀之末至二十三世紀之中葉，日本國運得英雄豪傑智略之助，逐年趨於集會，終至排除幽暗之雲霧，顯青天白日之光於當世。

天與有道

備是秀吉
及家康之
君臣關係
家康之私
利與臣民
庶衆之公
利一致

語云天與有道者。蓋社會之人，決不肯對於自己不利者長久支持服從。試考由足利氏季世戰國時代漸進至集合時代之順序，可知此言之不謬。彼織田氏死後，其將士之如彼爭奪主家者何也？豐臣秀吉死後，其臣下之如此紛亂其國者又何也？豈不以二氏之平生行爲不能服臣下之心有以致之？迄至德川氏興，上下親密結合，有如一體，其利害亦上下一致，故士卒臨戰，不避水火，所向無前。德川氏之所以得天下者，固多得智略謀猷之助；但其固結臣下之心，實爲成功之要素。故家康雖死，家臣永慕其德，盡忠於其子孫。是蓋國家康之利益與臣民庶衆之利益一致之故，亦可見天助有道之言洵不誣也。

第十章 自德川氏裁定禍亂至一十五世紀之末

德川氏統制天下之困難

關原之役 後諸侯思 德川兵亦 蓄兵待變

德川氏之兵在關原一戰勝利後，天下之向背，完全決定。觀望勝敗以及會舉兵與抗之諸侯，皆俯首而聽德川氏之指揮。雖然，當此時也，割據海內之諸侯，皆曾受豐臣氏之款遇優待，領大國，擁雄軍，於弓箭之道，自負爲『日本唯一之剛者』，而懷愍不畏死之念。彼輩常馳驅於千萬馬之間，突騎追雲，舞鎗成風，以驚敵人耳目。故社會平和，非其所希望；閑居無事，尤感覺無聊。朝鮮之戰，不得志而歸；關原之戰，僅一日而決勝敗；皆不足以滿其慾望。故常拊脾興悲，以待天下之亂，德川氏爲維持其統治地位計，則亦不能不養兵蓄將以防天下之有變。

德川氏使諸侯屈服之政略

德川氏之 組織 君仁而臣 義

苟德川氏治理天下之方法，亦如豐臣氏或足利氏之緩慢，則決不能抑制英雄之名譽心而保長久之太平。幸德川氏之組織，堅固如鑽石；君主家康之仁德，爲當時諸侯所不能及，其家臣亦皆忠義之人，爲君家之專不避水火。君仁而臣義，故固結而不可離。以此固結之集體，據關東形勝之地而鎮壓海內之英雄。其壓力甚重，但其支持力亦強；設如關西諸侯，多未屈服於德川氏，一旦上下之軌離起，其結構必立即瓦解。

大阪兩役 職爭 家康彈壓 諸侯之 戶人實於江

當是時，豐臣氏二次起兵於大阪，招其舊臣欲破壞此結構。但其力不能挽回當時之氣運，終於滅亡。此二次戰爭，反使德川氏得壓伏諸侯之機會。往時抱觀望態度及向德川氏勳兵者，此時則輸財以資德川氏，或出兵助德川氏，以贖其罪。於是統治天下之命運遂歸於德川氏，無復敢異動者。豐臣氏臣不能動，況其他諸侯乎。德川氏之命，必一一遵奉；又徵諸侯之資於江戶，扼其項而撫其背，諸侯垂首而

從之。是爲德川氏制天下之第一政略。

取諸侯之質以制天下之後，德川氏之威權大伸張。但封建基礎之血脈的愛，深不足賴；若德川氏制諸侯之政略僅止於此，則家康死後，必有拋其生命與領國而欲慰其高名心者。於是德川氏之目的，在分配親藩（註一）於各要地，使與外樣（註二）大名接壤，以鎮壓之。自家康之時着手，至三代將軍之時止，諸侯配置之目的完全達到。關東八州盡置譜代（註三）大名，以鞏固德川氏之中央，置尾州之親藩於東海道，置紀州之親藩於南海道，以塞東海道而開通京坂之路。在北部大陸置親藩於越前，以防備加賀之前田。置譜代大名於畿內以護京都。大阪爲形勝之地，由幕府直轄。在中國方面，置其親戚池田二氏於備前國備前，置淺野於安藝，以防備毛利氏。在九州方面，前置黑田，後置細川，大封之以買其歡心，以防備島津氏。封親藩松山於伊豫，封親藩高松於讚岐，以防備山內氏。在東北方面，有水戶會津等親藩以防備伊達上杉等氏。其他諸侯之傍，必封二三譜代大名以窺其虛實。是爲德川氏制天下之第二政略。（此處多蒙末廣重恭君之補正）。

但德川氏尙以此爲未足，欲使諸侯貧弱以失其自立之力，其方法極多。譬如德川氏或其親藩之築城池，必課其他外諸侯（即外樣大名）。建帝宮或廟宇，必課外諸侯。勅使之饗宴接待，罪人之警守，亦課外諸侯。其他事大而費多者，無不一課外諸侯，至其財政不足時，則許其發紙幣以補其缺乏；以財政上之困難消耗其威力與精神。其稍有不奉指揮者，則直令之曰：「若不奉命，則在本國靜待大旆之出！」其嚴且厲，太抵如此。家康並非殘忍無恩之人，其所以如此抑壓其下屬者，蓋爲統制寬貸之封建諸侯不得不然耳。此爲德川氏制天下之第三政略。

上述政略，德川氏爲歷服當時之雄藩豪將，不得已而採用。至其賞功之嚴，甚爲可驚。諸侯之有功者，德川氏必賞之，未聞有功而不賞者。但其賞也，或爲佩刀，或爲名馬，或爲金帛，或爲衣服，或爲褒辭，或爲賜見。萬不得已而分封土地，則必爲小藩；大藩則絕不封給土地，保存其舊領則爲賞，削減

大名之配
置親藩
外樣大名
譜代大名

均取諸侯
之策

雖賞諸侯
之功而查
岩商

其封地而不滅之則爲賞。嗚呼！何其奢也。豐臣氏之對諸侯，土地大馬以富之，虛宴大會以禮之，禮遇優待以接之。德川氏承其後，其嚴且吝如此，家康豈不知其危險！但欲保天下之權衡，不得不如此。諸侯之欲背叛者，當聽其背叛，但總在少數。假定對諸侯如豐臣氏，與其謂爲統制成功，不如謂爲統制必不能成功。德川氏斷然實行其政策，其膽力實有過人者。

抑家康如此抑壓諸侯，設如自身有可譽議，雖藉強兵之力，亦不能使諸侯久服。但家康平生行舉極重信義，雖當時之諸侯，亦深知之。故家康實行如此嚴厲之政策，諸侯雖不服，亦不敢叛也。

德川氏對王室之政略

德川氏一面制服諸侯，同時亦抑制王室，以防亂離之演成。對付王室之方略，出於家康之一心。德川幕府撰公家法度十七條，限定天子，親王，公家，門跡（註二）等之權限，使其思想專鶻於詩歌箏弦之末技，不復干預政事。蓋足利氏之末，天下紛亂，王室頹廢達於極點，世人已無知其尊貴者。及織田氏入京，大尊崇王室以號令天下。至豐臣氏，愈加尊奉，利用王室自拜高官，以排擠母氏之遺孤而制御其他諸侯。故尊崇王室之情，至二氏以來，大見發揚。德川氏雖不如二氏之以王室爲奇貨可居，然以將軍率諸侯，則全據二氏之遺法。夫王室爲名器之所出，德川氏既受其爵，卽不能抑制其與爵之人。且欲使天下長治久安，不可不統一政令之所出，而置王室於政權之外，其法亦甚難。故德川氏雖以其爲淳和榮華兩院別賞之資格，有支配公家之權；但公家畢竟官位甚高，非德川氏之老（註三）中輩所能匹對。加之公家等常假勅命以對德川氏，一次之勅命雖有拒之之權，但再度之勅令則不能不遵奉也。不過當時之公家，承積衰之餘，皆貧困而無氣力。德川氏又選非常人材以任幕府所設置之京師所司代，以其智辯與金權與王室相周旋，自無往不利。是爲德川氏制天下之第四政略。

上述各種政策之推行甚需時日，家康所深慮者唯恐本人不能完成此業，必使後世之嗣君能繼續施行。家康於兩次大阪戰役之後，年事已老，遂讓將軍之位於其子秀忠，監護其推行此種大策。織田豐臣

公家法度
十七條

王室爲名
器之所出

京師所司
代

家康之深
慮

二氏之所以亡者，以其嗣君幼而不能繼其業也。家康深恐其身後嗣君之力不足以制天下，則必蹈織田豐臣二氏之覆轍，故於兩次大坂戰役之後，使秀忠掌握兵馬大權，統制諸侯，以培養其能力與威望。如此則家康雖死，而德川氏之威權仍可無恙。此家康深謀遠慮之大概，其他細事，不遑一一枚舉。

德川氏初三代之間功名心消滅

王室及諸侯，爲德川氏此種周密的計謀所網羅，皆安其分，不敢有異動。但猛將勇士胸中所埋藏之名譽心，固未因此而消滅。家康臨終時告諸侯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若將軍失德，諸侯適管其任者，宜自取之』。秀忠將死時，聞天下將亂一言而欣然瞑目。此可以見當時英雄思亂之心固未完全消滅也。

秀忠之守

家康死時，秀忠任將軍已久，資望已高。秀忠爲人孝順而善事祖先，尊崇王室，愛撫諸侯。其對諸侯，一如家康在世時，毫無改變。雖稍嚴厲，僅以其全出於祖宗之成法，故諸侯但知其德之可慕而不見其可怨，無有敢拋其生命與領土，孤注一擲，以圖滿足其名譽心者。歷時既久，諸侯漸了解富貴之可樂，戰爭之可厭，皆欲賴德川氏以享長久之治安。秀忠亦早讓位於嫡子家光，自己參開大政，十年而後死去。

家光之守

家光繼任將軍職後，戰國勇士，前後死亡，社會安於逸樂，即雄藩大鎮亦少懷野心而企武功者。於是君諸侯而告之曰：『我祖賴卿等之力而定天下，故以賓客之禮相待，但至家光，生而主天下，與先世不同。故自今以後，待卿等應與諸第相同。心中若以爲不快，宜在本國熟悉之，三年以決去就』。諸侯聞之皆懾服。自此以後，諸侯盡爲德川氏之家臣，受其封號。家光爲聰明果斷之主，賢相亦於此時輩出，德川氏之文物制度，於此時爲盛。家康所計劃之諸侯（註四）參親交代制，親藩配置之事，以及諸侯設邸宅於江戶等，亦完成於家光的時代。此外置大（註五）老之職，分諸奉行（註六）之任，鑄造貨幣，規定尺度權衡，免三都（註七）之地租使都會繁盛諸政略，亦在此時施行。家光在職二十七年，能使德川氏

德川氏

爲天下所尊崇。天下之大勢，至此全定。雄藩大鎮，下一紙而可廢滅移封之。以封建治天下，使人民長享泰平之樂者，實爲家光之力。

但三代將軍對諸侯之態度，亦甚可注意。彼等常恐其失意，不肯輕易煩勞諸侯；使諸侯在領地內有完全獨立之治權。又幕府役使諸侯，不同時發命令於許多諸侯，一次只課其二三或五六，使不致因此而連合。故諸侯皆奉命唯謹，唯恐失其意，未遑顧及負債之增多。德川氏治世期間創立之金城瑤臺，今日存者極多，若在那縣制之時驕奢如此，其覆亡可立而待。但德川氏則未致此，蓋以其有制天下之政略也。又其滅亡諸侯，必於法律上不得已時行之；偶或沒收其封地，則必記其舊功，封其遺孤。故諸侯皆懼其守法之嚴而感其情禮之厚。是蓋由於德川氏思慮嚴密而又能適應當時之社會狀態故也。

人民奪取天下之風消滅

德川氏與諸侯之間，既不至發生衝突，遂能進而整頓上下之關係。諸侯之祖先因軍功而領有之土地，即以其子孫爲地方官治理之，自租稅以至裁判等領內之事，完全命家臣司之；但若治理不善時，德川氏有譴責之大權。太平日久，諸侯領內之政治，完全歸於國老之手，其爲主人者，只享逸樂而度歲月。故德川氏之基礎，可以說早完成於二十三世紀之後五十年。此時諸侯思亂之心完全消滅，無復欲覆德川氏者。

德川氏之制度不易發生反亂之理由

德川政府抑制諸侯之政策，雖十分奏功；但政治上之慾望，未易自人心完全排除。德川政府之組織，本由封建而成，民間之抱有才能者，無由干預政權。即欲改良制度上之弊習，亦不能出諸口；積之既久，破裂斯見。當三代將軍之時，肥後之島原，有以耶穌教煽動人民企圖再亂天下者。值三代將軍逝世之際，有燒三都挾天子而欲倒德川氏者。創此大亂者，雖明知其事不成，但爲英雄好名心所驅使，與其碌碌無聞，不如傳臭名於萬年耳。德川氏征服此等亂黨，易如反掌，益使世人知德川氏之政權非人民

將軍勳爵
侯之態度
實難獨立

上下之風
傾整頓

島原之亂
五豐之亂

德川政府之組織
地方與中央之權衡
國體政治
與封建政治
諸侯與中央
對立與其

內部執政者之陰謀

不良宰相之橫暴

吉家與

所能爭奪。何則？德川政府之組織，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維繫甚爲堅固，雖能倒德川氏，若不能撫綏大名，亦難保其政權也。在郡縣政治之時，因州郡之守備不固，有與兵而抗政府者，近國人民爲其兵威所恐嚇，常不得已而響應之，故叛民之勢易成強大。但在封建制度之時，諸侯割據土地，擁兵備糧，以備非常之事。故以一諸侯而叛政府，亦不易攻入隣國；隣國諸侯對政府雖懷不平之念，但知與己並立之各諸侯必不參與，故專助政府以得軍功，而不助逆以蹈於滅亡。德川政府之內部組織如此嚴密，在德川氏失政之後，諸侯欲顛覆之者，尙犧牲生命與領土，敗而固守其城至二三年之久，其間有望武功者乘機而起，始得僥倖於萬一。況在太平之世，諸侯決不敢出此。諸侯尙且如此，人民更不必言。故自三代將軍以下，雖無名君賢相，亦能專長久之太平。

德川氏之制度難防宰相之弊害

諸侯及人民欲自外部向德川政府進攻之企圖雖已消失，但在德川政府內部，執政者陰謀之發生，則決不能防止。蓋在以天下爲家之政府內，苟其君主聰明賢能，躬親政事，如德川氏初三代之將軍，固必有優良之政治；但賢良之主，累世難期。飽食煖衣而求逸樂，是乃人情之常；執政者苟能委其責於他人而自享逸樂，誰復顧操繁勞？專制國君主所處之地位，卽恰如此。在此種制度之下，欲代出明君，固屬絕對無望。假令君非明君，其所任之宰相爲賢良之相，天下尙可無事。無如此種君主在位，亦難望其選任賢相。若以不良之宰相掌握天下之政權，其施政必有私，人民將蒙其害。此種弊端，自四代將軍家綱之時起。卽已顯現於德川政府之內部。（四代將軍有疾，繼嗣未定，大老堀井忠清依鎌倉之舊例，欲請有栖川幸仁親王爲嗣）。至五代將軍綱吉時，其弊更甚。（大老堀田正俊專橫，爲若年寄稻葉正休所斬。其後牧野成貞，柳澤吉保等續之亂政。德川氏甚危）。六代將軍家宣七代將軍家繼之時，雖無重臣專橫之弊，但政事上尙多沾染此種弊習。（六代將軍之時，重用新井白石，政事大改革。但勘定奉行萩原重秀爲奸臣。七代將軍幼冲死去，間部詮房通月尤氏，但對政事上尙無大害）。八代將軍吉宗勵精圖

開國時代

治，大行節儉之政，號稱中興。九代將軍家重時此弊復起。（大同出雲守亂政）。至十代將軍家治之時，此弊最甚。（因治意次與其子重知專政，欲自封於大阪。意知爲佐野政言所殺）。十一代將軍家齊任賢使能，政無過失；但購奪之弊則於此時發生。德川氏之財政從此困難。自三代將軍以後，良善政治與良善之君主宰臣，實不多見。但其間之君主宰臣，亦多有爲德川氏而陷於危殆者。

德川氏及諸侯之內政易生黨重專橫弊患之理由

德川政府之組織，非無豫防此弊專橫之方法。家康立三親藩（紀州，尾州，水戶）以備畿國之中絕，且特別重視水戶家，使常監視將軍之政治。又重購譜代之諸侯，常欲委之以政權，蓋以忠義之士，多出自譜代大名之家。故當重臣專橫或將軍幼稚之際，雖多親親藩及譜代大名之力鎮定之；而弊端亦從此發生。蓋生於富貴之人，不知民間疾苦，雖才智者之子孫，亦多陷於愚暗，欲以此人裁決一國之政務，必不可能。故必引用有才智者，而委託以政事。但所謂有才智而被選用者，果爲如何人物乎？政治上之地位，固其爲名利所在，無君子與小人之別，皆欲與其選。但在貴族眼中，其所僞爲才智者，多爲奸佞阿諛之徒。奸諛之徒一旦膺選，必以升官圖寵爲其從仕之目的。彼所接觸者，既爲愚暗之貴族，於是以酒色籠絡其主君，以祭祀迷亂其心志，使其對政事不發生關係，而已因得握黜陟官吏之大權。及至自己之黨派充滿要樞，終至發生欲滅君家之大望。是乃人情之自然。凡由下位上進而執政權者，其行奸謀，未有不經上述之順序者也。彼等所願感者，唯恐外諸侯之不服已耳。故在得善良重臣之方法一點上，德川氏之制度實未善完備。但封建之本身，本非完美制度，德川氏之創制，比較上尙爲彼善於此耳。故在德川氏治世之間，尙能防止封建之弊，未有大患發生。

在中央政府發生重臣之弊，已如上述；在另一方面之地方政府，此弊更甚。雄才狡猜之人，何時蔑有，若在當時制度之內，蓋現有可乘之隙，則必脫穎而出。試考當時地方政府之內部情形，其君主自幼即生長於歌舞女色之中，無辨別是非得失之智識，唯以逸樂爲事。如德川氏之親自監察其政治者更屬鳳

地方政府之弊

武家之惡

毛驕角。故爲其宰臣者，無論何事，皆能爲所欲爲。若任免官吏之權操諸己手，則自己組織黨派，極爲容易。若裁判之權操諸己手，則掩蔽其罪惡，亦非甚難。苟其君主庸愚，則殺之生之，亦甚容易。因此，逞惡恣而亂其宗家者不可勝數。如黑田騷動（倉橋重太夫之惡），越後騷動（小栗美作之惡），伊達騷動（原田甲斐之惡計），小笠原騷動（大神兵部之惡計），前田騷動（大槻傳藏之惡謀），秋田騷動（那川采女之隱謀），仙石騷動（仙石左京之惡謀）之類，皆奸臣乘虛在地方上演成之禍亂。此外亂事未成而被鎮壓以去者事件尙多。總之，德川幕府時代由下位昇進而取政權者，多爲惡人，則事實之不可掩蔽者。

封建政治之利害

忠臣義士之出現

封建政府之基本

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小人在位之弊習，普遍於日本各地。此在封建制度之本身，爲不可避免之弊害。然封建政治之利益，亦隨時表現於各處。上述姦臣之欲逞其私慾者，嘗有忠臣義士不惜爲其宗家一死以防止之。此輩忠臣義士之心中，只知尊重君家之利益，無一點私利之見介乎其間。夫人之天性，切於自愛而疎於他愛。（此二心皆出於私利心。參閱本書第二卷）。但有時他愛轉厚於自愛者，實緣於在封建世祿制度之下豪隸代君主之厚恩有以致之。因此，愛君主，尊宗家之情，譜代必較新進者爲親切，蓋亦人情之自然。德川幕府之時，善良家臣，執其政柄，其施行政務，皆爲君家着想，其一種忠義凜冽之赤心，多使後人感歎。德川家康之重用譜代大名，蓋以此故，而封建政府之基礎亦賴此以奠定矣。

社會一般沈溺於逸樂

自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初至二十六世紀之初，此種制度繼續推行，社會上完全無事，上下得享安逸。中央政府對地方無所顧慮，內政廢弛，遂發生上述種種騷亂的現象。地方政府不能仰賴中央政府，所有作爲，自然其內政亦日趨腐窳。一種原因發生其他之結果，其結果又成爲另一原因而發生新的結果，連綿遞演，遂造成社會之頹勢。其間雖有一二明君賢相出而欲矯此弊，但一時振作，不移時而仍復其舊。語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當時之人，皆不知世界大勢之可畏，沈醉於日本孤島內之泰

中央及地方之內政皆廢弛
明君賢相不能抵抗社會之大勢

第十一章 德川氏治世期間所顯現之開化現象

社會平定時有形無形之現象皆進步

職亂時衣
食住實不
進步
開化之源
素發於太
平之空無

貨財之進
步同時人
心亦進步
物之性質
與分量二
種
分量之進
步
性質之進
步
質者與富
者
古之上等
與今之下
等
世運進步
之理

如上所述，德川時代國內素平，人民安樂；因此社會上有形無形之現象，大為進步。在昔戰亂紛紜之時，人民饑渴，無擇飲食之暇，衣食住之概況，欲求進步而不可能；及至太平之世，因其需要未受抑制，遂勞其筋骨，求遂所欲，以企圖使其生活快樂。於是開化之源泉，如草木之逢春而發嫩芽，養於太平空氣之中，勃然發育而無所防阻。夫人之天性，為保生避死，欲保生避死，不可不求衣，不可不求食，不可不求住。而其衣食住，皆不僅以能防饑寒為滿足，必欲求衣能適其身，食能甘其口，住能防風雨。為達到此種希望，必須人人竭其智力；故貨財之情形進步時，人心之內部亦同時進步。人心之內部不進步，貨財之情形未有獨進步者；貨財之情形未退化，未有人心獨退化者。蓋使智力發達者為貨財，使貨財蓄積者為人心。茲試述其進步之順序。凡物之進步，分為性質與分量二種。就分量之進步而言，古時之人，衣僅一件，食僅一菜，房屋家財之數亦甚少。今則衣數件，食三菜，房屋家財之數亦極多。是為分量之進步。又就性質之進步而言，古人之衣，織法簡陋，其絲甚粗，食則糲米，菜肴簡單，房屋以茅葺而柱則以樹幹充之。今則衣之織法精密，其絲甚細，食則熟米，菜肴精美，房屋用磚瓦而柱則雕刻美觀。此為性質之進步。大凡社會進步之時，必然發生貧者與富者。吾人固難說古之物其質皆劣，今之物其質全優。古時不知織造應貧者需要之衣，今則發明其術。若以古昔之上等與今日之下等比較，則自然發現優劣之不同。唯就古之貧者與今之貧者如何享其快樂，古之富者與今之富者如何滿足其需要而論，始能知世運進步之大概。

判斷社會生活標準之困難

人民勤勞
之標準
生活標準
之進步
世人以
者品爲
步之標準
定立開化
標準之困
難

開化史之
基本始何
職業與貨
物之分化

開化歷程
記述之基
本如何
開化進步
參考表

人生需要，常無滿足之境，貧者固隨時感覺不足，富者亦常抱缺乏之感。但社會自然有一種生活的標準，一般人以此爲標準而勤勞。譬如在古代以綿衣爲日常衣類之時，當時之人必努力勤勞，欲超過此種標準之上。今日之人以絹布爲日常之衣類，則世人又努力勤勞，必欲超過此種標準之上。故古昔之人以綿衣菜食爲窮，今日之人以粗衣肉食爲窮，雖皆以爲窮，但客觀之生活標準，則一般的可謂進步。此種生活標準之進步甚難決定。有時政府方面若不加以限制，則人民必窮奢無度，但絕不能以此爲生活進步之標準。生活的標準，必須隨人民財富之增進而進步。足爲開化之標準者，絕不見破產之現象。

但此開化之標準，不易確定。以中等社會爲標準乎？中等的種類甚多，將以何者爲中等的飲食？何者爲中等的衣服？何者爲中等的居住？在現在社會中，尙難決定，往日的史家，未嘗注意社會生活之事，更何由知其詳？若自今日而觀察昔日，雖然如望雲霧，吾人將以何者爲依據而記述開化史耶？

且社會進步，職業種類日新分化，製造各種不同之貨物以滿足人類之需要。職業之分化，貨物之繁多，固足以表示文運之進步。若以今日社會之職業與貨物與戰國時代相比較，其多實不可言喻。此種職業與貨物，在何時分化？從何年創始？雖在今日，尙不能一一明述。況往日之人，多未注意及之，吾人有何根據以記述開化歷程耶。

故記述詳細之進步，實爲最難之事。加以著者之寡聞，焉得窺其萬一。茲僅就見聞所及，列成左表，以供研究開化進步者參考之助。

戰國時代

（自足利氏來賓遣日本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二年慶長七年）

（西歷十五世紀中葉至一六〇二年）

（譯者註：本章末附日本年號與西歷對照表）

飲食

（足利氏
義隆至慶
長七年）

（御庵物語）我父親有封地三百石。當時軍多，諸事皆不自由。雖注意於積蓄，但朝夕仍喫菜粥。家兄時時到山上去打鎗，他去時早晨煮菜飯，午飯也喫菜飯，我也可以喫菜飯。因為有菜飯喫，我常常勸家兄說，去打鎗罷，多麼好玩呢。（中略）喫午飯的事，夢想不到。到夜裏，也沒有晚餐。

（加藤清正七箇條）食爲黑米。

（小笠原小實記）山海之珍珠爲蘇，梅乾，水母。

房屋

（三省錄）初受封時，遠山之居宅以日光的木板甲州的木板建之，廚房則用茅草蓋。

（石川氏筆記）天正年中，房無雨戶；天文年間，無綿布，皆着麻製的衣類。

衣服

（御庵物語）並沒有衣服。我十三歲時，除自己作的一件染花的麻布衫子外，沒有別的東西。一件麻布衫子穿了十七年，腳伸出來，十分難看。沒有法子，只好把這件衫子隨時穿起，遮遮小腿。

夜着（被物，睡衣）

（近代世事談）自慶長年間以來，始有所謂『夜着』（被物），從前稱爲『小寢卷』，比日常的衣服稍大。下部捲上，其上蓋蒲團。頭上也蓋蒲團。

（同書）蒲團是以蒲花作成的圓座。在棉花未渡來以前，庶人冬季的衣服，即以蒲蘆之穗代棉花，裝入夾衣之中。

婚式

（日本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年間）元龜年間，俸祿最高之武士的妻女，沒有與轎之類的乘物，婚嫁之時，穿着麻織的外褂，乘在所謂『負木』之上，搦夫負之而行。（三省錄）

女人之髮

婦人結髮用稻葉。女人外出時，必着麻外褂。關當時之書畫，下流階級之女子，不束髮者甚多。

帶

（京傳骨董集）試閱文燕前後至寬永年間之古畫，可見男女的胸際，都有絲織的帶，纏繞數重。其色或白或黃，亦有粉色而參雜青黃赤等色者。按此即所謂『名古屋帶』。據云昔肥前之名古屋，有唐絲傳入，時人織之成帶，故名『名古屋帶』，亦稱爲『組帶』。

淨瑠璃（註一）及歌舞伎（註二）芝居（註三）

戰國時代最流行者爲猿（註四）樂，即能（註五），狂言（註六）之芝居。亦有以平家物語與琵琶配合而演出者。此外又有說經，歌念佛，讚語等，皆爲羯鼓鼙鼓蕭佛弁之緣起，以勸說佛道。及至日本紀元二十世紀之中葉，淨瑠璃出，以略似謔的音節，唱淨瑠璃物語，酒類童子，山姥等中的故事。都用扇子或手打拍子。此時傀儡師（註七）亦出，其始祖上村日向少椽百木夫作人形實（註八）於皇宮，唱淨瑠璃時同時以人形裝情。因人形之發明而促進淨瑠璃之進步。及至戰國之末，蛇皮線自琉球傳入。舊有兩根絃的樂器，泉州攝之盲人中小路添加一根絃，成爲『三味線』。慶長年間，有個名叫澤角的盲人（或謂名澤住），精琵琶，又精習三味線。於彈琵琶時，合平家物語的調調；彈三味線時，合淨瑠璃的詞調。於是三味線，傀儡，謠曲三業合而爲一。

（東海道名所記）表演淨瑠璃者，在慶長末年，京都方面有次郎兵衛，彼以歌妓及鎌田政清等之故事爲歌詞，同時表演人形，後來彼又以鄉姬敬佛徒之故事爲歌詞。其後有個叫河內左內的出世，亦爲名手。女子之中，有南無右衛門，左門吉高等人，都以表演淨瑠璃出名。

此時出雲的女巫中，有名阿國者，懸鳧鐘於首，在漆笠上掛紅色的短簾，以笛鼓合拍子，歌念念佛，其夫爲狂言師名古屋三左衛門，在舞臺上唱一種稱爲『傳助』的曲詞，表演種種的舞踊。此爲歌舞伎之始，但此時尙未用三味線。

繪畫

(近世名家畫) 日本古代之丹青名家，姑置不論。今其流派尙存而未衰者，爲土佐氏，狩野氏。彼等可稱爲『和畫專門』。土佐氏傳古代之遺風；狩野氏今所傳者，自成一派。但當時狩野正信曾就學於小栗宗丹，其後又爲周文之弟子，其繪人物，則仿宋之梁楷。此皆史書中可考證的事實。繼之而起者爲其嗣子狩野元信，有青出於藍之譽。永正年間（日本紀元二千一百六十年頃），其畫傳入中國，明知動縣有鄭譯其人者見之，深爲贊美，謂其畫法有如趙昌、馬遠。但元信父子，不似土低派，專以和法爲本。狩野派代代出名手，及至狩野探幽，以獨具之天姿與技術，其畫一變，可稱爲獨出之宗派。自此以後，尙信、永真之輩，相繼傳其妙。於是狩野氏之家法，至今仍巍然成爲一派。土佐狩野之外，有雪舟禪師者，專摹漢畫之北宗，其畫入三昧，明成化年間，雪舟到中國時，四明徐璉贈詩云：『久用詩賦超方外，曠有丹青落世間』，其詩畫爲中國人所讚賞如此。受禪師畫法衣鉢之弟子，有雪村等名手。此外有棲屋宗達學畫法於永德，尾形光琳就學於安信，惺惺翁就學於山樂。其後各棄其所學，摹日本古代之格式，而別成一家，可謂善學者矣。漢土之畫法，有南北二宗，日本之如雪周文等人，倣宋元北宗名手之法，其名甚高。故當時日本之名畫家，概爲北宗。所謂南宗的畫法，在日本未流行。

見世棚

(骨董集) 現今商人賣東西的地方稱爲『棚』，或『見世』(日語見世與店同音)。因爲古時商人在房子前面設置『棚架』，在上面陳列各種商品，以便售賣。『棚』這個名稱遂產生。這種棚是爲陳列商品以便往來行人觀看購買而擺設的，古時稱爲『見世棚』。後世將下面的棚字省略，簡稱爲『見世』(店)。

此書中又載有日本紀元二十一世紀末葉京都『見世店』的畫。其景況恰與現今之『床見世』(浮鋪，擺攤)相似。當時京中的商店，大概都是這個樣子，但不知鄉村的商人如何。

江戶錢湯風呂（風呂着湯堂也，湯者熱水也，古時洗熱水澡只需一錢，故名）

（漫物語）昔江戶繁昌之始，大約爲天正十九年卯年之夏（西歷一五九一年，辛卯），有個叫伊勢與市的人，在錢瓶橋邊，建立一座錢湯風呂。所謂風呂錢，係指永樂錢一文。（見骨董集）

日本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三年至二十三世紀之末

（將軍）家康 秀忠 家光

（年號）慶長 元和 寬永

食物

（三省錄）秀忠將軍時代，新太郎（池田新太郎光政）至江戶，初次謁見將軍。織田常真坐在大櫓子上，正在看下棋。新太郎瞥見時，從那裏進去。將軍說，聽說伯耆是個雪國，確實麼？到廚房那裏去喫飯，與大炊同道去！新太郎走到廚房那邊用餐時，一座十三人。上座爲織田常真，依大炊頭的指定，其次爲松平新太郎的座位。所喫的菜肴，爲蘿布湯羹鱸魚，羹見布，以及燒魚等。

衣服

（元正聞記）至此時爲止，古時的風氣尚存，除武士之外，其下的沒有穿木綿合羽（綿布雨衣）的人。町人（註九），有五六百或千石之旗下衆（註十），以及小姓（註十一）等，都穿紙合羽；只有家老及用人，纔穿木綿合羽。當時的小者（註十二），中間（註十三），下半女（註十四）等，都是穿棉布。

（古老物語）古時貴族夫人參詣神社佛閣時，必梳辮子。侍從着上衣與袴子。女侍的帶，用有金線的今織（註十五），寬三寸許，長七尺五寸。

（同書）古時普通的女子穿刺繡有光澤的衫子。

（三省錄）安永年間，針妙，腰元，半女之類的女子，外出時，臉上蓋以覆面或綿紗，絕不把臉露

二千二百
六十三
年
末
之
末

出來。

夜着

（明者連條錄）青木長部少輔被擄，板倉伊賀守往視，贈絹布的夜具（被物）。民部只蓋了夜具的兩條，他說完全用夜具包着了睡不着，要是沒有也可以不蓋。木綿的被物自此出。當時的大名，多用綿布的被物。

女子之髮

（太宰獨語）寬永年間，婦女束髮用麻繩，上面卷一個黑結。

按自此時起，女人戴綿帽子，其上戴編笠或漆笠。

笠

此時男子所戴的編笠，很深，幾乎把臉都蓋着了。因此，在笠上鑿了兩個孔，把眼放出以便看東西。後世的菅笠，有點像這種樣子，殆爲承繼此風。

芝居（戲院）

阿蘭登明歌舞伎芝居之後，京都六條的妓女亦仿倣而演『芝居能』。古今役者大有云：『昔有藝者與役者之別，應各方招請以表演舞稱爲藝者，稱爲藝者。僅到戲院法專演唱狂言而不演舞踊者，稱爲役者。藝者與役者是當時並立的兩派，但亦有藝者而兼替役者。從前女角表演，專演舞踊，另有配演狂言者；演舞踊者稱爲藝者，配演狂言男角稱爲役者。女角不演藝者時，男角亦可表演舞踊。』

『查京都方面最有名的芝居有四座，二代目阿蘭座，忍座，里島座，及稱爲『之男芝居』是也。其後忍座由門屋唐左衛門經營，又開辦伊勢中地及古市之芝居。里島座分爲二座。段介座遷至大阪，由一名藏人的女太夫（女戲子）主持，因改稱爲太夫藏人座。其後阿蘭，太夫藏人等女歌舞伎絕，鹽屋九郎右衛門創若衆歌舞伎於大阪。江戶方面，有猿若勘三郎者，於寬永年間創立芝居。此等芝居，因政府下

停止令，會「賤廢止」。

淨瑠璃

江戶方面，有名虎屋次郎右衛門者（後改稱薩摩太夫，號淨瑠璃），從澤住檢校學曲節，新作頗多，遂建立芝居，表演人形。其弟子皆號「虎屋」，並且都題「天下一大薩摩」於匾額之上。其弟子伊勢島宮內，入京都，創伊勢島節。

浮世繪（卷十六）

（風俗鏡池）古時，土佐派有人畫像，筆跡所至，現出人的圓形顏骨，袖小，面小。此種畫像與人相同，畫得很真實。畫本似人而非人，如果完全照著人體來畫，那末絕不能算好。有位叫風俗浮世又兵衛的繪師，會繪一少女，畫少女笑顏的姿態，張口露出黑色的染齒，臉上的酒窩也現出來了。若與今日的繪畫比較，他的畫像好像一個賢淑美觀姑娘的雕刻，如果照着一個實體描寫，就沒有這樣美妙了。近代浮世繪之始祖藤川師宣，所繪的人物，裝裝和化粧，都很妙緻。

酒屋

（落穂集）津國鴻池有名酒屋勝菴者（初名三郎右衛門），盛酒二斗於樽中，以二樽爲一擔，標上覆以草屨數雙，擔至江戶，到各大名之家，售酒一升，索價二百文。當時江戶只有鹿酒，沒有像他擔來那種美酒，故能以一倍的利息賣出。他屢次上下於江戶津國之間以圖厚利。並且當時的米價甚賤，每天只買食宿錢十二文，故由鴻池至江戶往返一次只需用錢二百五六十文。這個大銘二升，那個大名三升，無數人向他買，他擔的那點酒，短時即盡。於是他以四斗酒盛於一樽，兩樽爲一擔，用一匹馬負運，一次驅十匹馬到江戶，仍然很快的就賣去了。及至德川氏末年，酒價規定了，十擔酒定爲若干兩，但他二十樽酒仍然獲利如舊。因爲他的酒逐日賣去，馬運來不及，後來他每次備了數十萬樽，用船由東海道運來及至今日，酒商仍盛行。

足袋屋（日本式的襪子店）

（落穂集）七十年前無足袋屋，香具屋（香藥舖），油元結（結髮用之紙條）。酉年大火以後（日本紀元二千三百十七年），世人都愛用革羽織（皮製日本式短褂子），革頭巾，因此鹿革之價值高漲，於是始有人用綿布的足袋。革足袋由製革店製造。用木綿足袋之後，始有足袋屋。

伽羅油

七八十年前，前額捲髮之小姓（大名之侍童）等之外，其他上下之少年男子，都用油等塗髮。當時頗講究梳前髮，頰鬚等。侍者之中雖亦有梳頰鬚者，但以步行，若黨，小者，中間等人爲多。彼等都以蠟燭油混合松脂等潤髮，稱之爲伽羅油。當時伽羅雖已輸入，但只用於藥品。所謂伽羅油店，並無伽羅。後來元結亦無矣。

印刷

印刷之事，在此時已經流行了。

二十四世紀

（將軍）家光 家綱 綱吉 家宣 家繼 吉宗
（年號）寬永 正保 慶安 承應 明曆 萬治 寬文 延寶，天和 貞享 元祿
寶永 正德 享保 元文

衣食住

（獻可錄）衣食住及器物等，力求雅致；又喜好伽羅，珊瑚樹等。常憲院（綱吉將軍）時此風猶存，至今未衰。

衣服

(三省錄)貞享年間，貴族的侍女，穿染花的綿布便衣，腰間束細帶一條。

(藩種集)女侍之帶，在年幼時，規定爲卷物三折，絹類兩折。(中略)大約四十年以前，卷物二折，絹類則用一幅整的，並且套後面還有結帶等以作裝飾。(中略)在古時，女侍等，亦穿麻的袷衣(古代日本女子外出時穿的外褂)，足着紫色的草足袋。七十年以後，穿麻袷衣的女侍就沒有了。

(古今沿革考)書中有云：「從前在江戶方面，當大猷院作法事時，有名岩間八郎者，身穿袷衣，僞裝爲女子，在增上寺狙擊松平伊豆守。從此袷衣就停止了」。

(古老物語)寬文末年以前，帶巾甚寬。延寶年間，巾寬三四寸，長一丈許。

女籠

(古老物語)萬治年間以來，江戶方面廢除了袷衣，女子們步行外出時，頭上帶着稱爲玉藤的網笠，以覆其面。(中略)其後寬文年間，有所謂松坂編笠，延寶年間，有所謂熊谷笠的網笠。用以遮蓋臉的大部份。女子用笠者甚多。其後天和貞享年間，網笠漸次廢止，菅笠盛行，女子多用之。

(三省錄)無論貴賤，美男子都用網子來束髮。

冠簪

(三省錄)當時某諸侯之女賜銀簪一枝，受者認爲是珍奇名貴之物，世人爭往觀看。(日本紀元二十世紀中葉之事)。

房屋

(古老物語)往昔住土屋的人很少，由牛込至小日向一帶，看不見許多土房。除大名之外，也沒有人住瓦蓋的房子。

紙

(古老物語)往昔沒有所謂半切紙(一張白紙切爲二片)。六七十年以前，始有半切紙。在此以

前，只有所讓塵紙。

婚式

(三省錄)日本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四年，即貞享年間，嫁娶婚典時，穿淺黃色菊花的絹類衣服，四綵的帶，紫色革足袋。

笠

(骨董集)此時的男子，頭帶桔梗笠，是一種形像菊花的笠。

衣服的模樣

(骨董集)自慶安至萬治，寬文年間，女子的衣服，以圓花爲流行。

(同書)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之初，男子始有穿所謂蝙蝠羽織者。

羽織之紋

紀國屋文左衛門始在羽織(日本式短褂子)之上自己刺花紋，又命幫間(侍酒席談笑歌舞者)等亦繡花紋。刺花紋之羽織自此始。

芝居

在京都方面，自村山又兵衛得官許演劇後，一時創立芝居者有十八人之多。其後大減。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之初，存者有早駒長吉，蛭屋儀右衛門，萬太夫，龜屋久米之丞，藤田何等六座。此外據傳中村半太夫，村山平右衛門亦創立芝居。在江戶方面，自猿若勘三郎創立中村座後，市村又三郎又創立市村座(寬永十一年)。萬治三年，太郎兵衛又創立森田座。在大阪方面，自龜屋九郎右衛門創座之後，河內座與八郎，松本久左衛門，大坂太左衛門，大坂九左衛門等，先後爲經理人。芝居之數，此時增多。

女形(卷十七)之始

自女歌舞伎被禁止之後，以若菜(少年)裝女形，削削前額之髮，並用手巾等裝飾品，模仿古代太

夫（戲子）的形式，表演戲曲。有名鳥井莊七之女形，製造一種帽子，飄飄然帶在頭上。後起之女形，次第採用，並於顏色與形式方面加以改良。玉川千之丞，用黑色的帽子，兩端折一角，向下懸垂。賀茂川之鹽之兄傳兵衛，又創用一種帽子，帽角上包以鉛。由水木辰之介，賀茂川之鹽設計，傳兵衛作成。其色深紫，是為今日所謂野郎帽子之始。傳兵衛是一個有名的工人。（古今役者大全）

（聲曲類纂）芝居申用三味線，始於寬文十二年四月。初由大阪之芝居請求，得當局之許可。元祿年間，所用人形皆無足，並且表演時只用一個人形。

據聲曲類纂中所載正保慶安年間的古圖看來，淨瑠璃芝居用人形，歌舞伎芝居用笛，大鼓等而未用三味線。淨瑠璃與歌舞伎尙未混合表演。

萬治年間以來，初代團十郎以紅粉塗身，是為所謂荒事（註十八）之始，其名震於四海，（江戶歌舞伎年代記）。

寬文元年以來，續狂言，引幕，大道具等先後發明。從此有種種之狂言踊舞等出現。大薩摩之淨瑠璃也於此時與歌舞伎混合表演。尤以淨瑠璃芝居演人形，自二十五世末葉以來，在葺屋町頗為繁盛。（歌舞伎年代記書跋）。

江戶淨瑠璃

虎屋永閑新創一派，稱為永閑節。

江戶肥前節，寬文年間，新創一派，稱為肥前節，聲譽甚高。

櫻井丹波少操好勇壯，常以武勇之故事編為詞曲。岡清兵衛因此作成稱為『金平物語』的淨瑠璃。市川圓十郎雖為荒事師之始祖，其淨瑠璃則多採用金平物語。（聲曲類纂）市川圓十郎為延寶天和奈間人（日本紀元二千三百三十年頃）。此派稱為和泉太夫節。近江大掾語齋（承應，明歷年間）又創一派，世人稱為語齋節。

土佐少掾正勝，寬文延寶年間，創土佐節。

式部節，手品節，皆創於土佐。

薩摩外記太夫，元祿年間，創外記節。

若山五郎兵衛，創若山節。

江戶半太夫，創半太夫節，又名江戶節。

十寸見河東，入江戶半太夫之門，融合手品節與式部節，另創河東節。河東爲元祿，寶永年間人。

京都淨瑠璃

延寶年間（日本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年頃），井上播磨掾，注意江戶萬歲節，大加改良。往昔之淨瑠璃，大都爲六段（由十二段脫化而成），在京都方面，由井上播磨改編爲五段。在江戶方面，直至寶永正德年間，尙未失古風，土佐掾與和泉太夫之淨瑠璃，皆爲六段。宇治加賀掾，又創一派，與播磨拮抗。角太夫節，文彌節，表具屋節，道具節，亦於此時代創始。都太夫一中，創一中節。享保年間，有宮古路豐後掾者，爲一中之弟子，創豐後節。仲太夫節，繁太夫節，蘭八節，正傳節，皆由一中節豐後節分化而出。（聲曲類纂）

大坂義太夫

（貞享年間）竹本義太夫慨然歎曰：「我所唱的播磨一派，其地節長，以音爲表，而埋節於裏。至於京都之宇治加賀太夫一派，地節短而隱音於裏，其節甚細。兩派之節章句皆未全。不如縮播磨之長而伸宇治之短，備番之表裏而兼節之長短，定序之破急，另立一派」。終創義太夫節。門弟竹本播磨少掾，於調曲之中，多取男女之事。自此以後，此派大盛。豐竹越前少掾，仿義太夫節，另創豐竹派。自此以豐竹爲東，竹本爲西，互相競爭。

浮世繪

(青畫集)按板行之一枚繪，大致於延寶天和年間。一枚繪爲「朝比奈與鬼之首引」，「土佐淨瑠璃繪」，「鼠之嫁入繪」等。戲院繪以畫坊主小兵衛等爲始。當時繪畫所用的彩色，爲丹，綠，青等，互相淺雜。畫師爲菱川師宣，古山師重等。元祿初年以來，始用丹黃汁，稱爲丹繪。元祿末葉以來，鳥居清信及其子清長等，皆擅長丹繪。及至寶永正德年間，有近藤清春者出。所謂紅繪，創始於享保初年，因其於墨中和膠，放出光澤，故又稱爲漆繪，奧村政信專繪之。

飲食店

在大獻公(三代將軍家光)時代，江戶市中只有茶屋，尙無如現在之精美食品店。明曆大火之後，在淺草金龍山之門前，始有茶屋兼售茶飯，豆腐汁，煮染(煮菜)，煮豆等。奈良茶之名稱自此時始。江戶市內各處的人士，都去飲金龍山的奈良茶，當時認爲是很珍貴的東西。

江戶花梨

現今江戶街道兩旁之樹木，直至大獻公之末年，只有松樹，松林之間有土房，在窗口之外，懸掛着草履草鞋之類。由淺草雷門至東叡山岸旁，是一條長谷，蘆葦葱茂，一望無涯。

(古老物語)賣伽羅油的地方，在湯島天神有一處，在麴町有二處，在芝有一處店名狐饅，在牛込有一處，店名雀屋。在江戶市內，只有這幾處出售。

(石川氏筆記)寬文以來(日本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二年頃)，一百餘年間，神元結(見前)盛行。許多東西亦於此時創用，如把，米篩，水車，觸磁，酒桌，女衫之花邊，女衣花領，義太夫的戲曲縮本，小戲院，戲臺，女人之髮結等。夏日男女皆戴菅笠。所謂日傘，流行一時。(中略)大阪踏雪時用晒足袋，下雨時用紅葉傘，塗木履。

戲棚之進步

承應年間，搭棚作戲臺，以床機等並列作舞臺。當時無所謂棧鋪，只有所謂高場。由觀座至舞臺，

一條小道，觀者常獻種種之贈品於演員。所謂贈品，多爲四季之鮮花。故現在稱贈送演員之贈品爲「花」。所謂花道，名稱由來已久。此時的立役（配角）敵役（丑角），都是茶室髮（前額髮剃去，將後部髮束成長髮結）。

自天和年間以後，所有戲院，都像現在的形式，在舞臺之中有棧鋪（客廂），但尙無下座鋪（地座）。（中略）按當時風俗，多穿木綿服裝，男女之情，甚爲熱狂。

往昔能舞臺之類，只有大臣柱。中興舞臺之前，有所謂付舞臺。砂舞臺是後來很久纔有。下座鋪，新座敷，孫座敷之類，近代方有。（役者大全）戲院之進步，以日本紀元二千四百年前後爲最顯著。

土房戲院，下棧鋪

（環齋記聞）往昔的小戲院，多爲木房草頂，享保九年以來，常遭火災。三人座的經理等商議，令後一律用土造，以避免火災。因建築經費浩大，決定用下棧鋪（地座），向町奉行呈請，（中略）同年四月，町奉行准許設下棧鋪。

三大橋

兩國橋寬文元年年初架設，新大橋元祿六年架設，永代橋元祿十一年架設。

江戶之名物

（蜀山人假名世說）延寶二年道久下人彥作記載江戶的概況有云：「在木挽町山村的戲院中，有一心二河白道。（一心二河白道，佛名，起源於丹波國子安之地藏。京都方面也供奉此佛，仍用此名號。土佐少揀入江戶時，效供此佛。在塚町方面有櫻姬，在木挽町方面出歌之助，皆不及昔之櫻姬）。表演二代目，極有興趣，世人皆以未觀爲恨。戲棚各處皆有，終日開演。食品之中，有鹽瀨饅頭，笹粽，金龍山饅頭，淺草木下稻糞米（木下稻糞米爲勢州山田人來江戶者所作，其人姓木下，故名。稻糞米，爲一種梨糕），白山彦左衛門之筵棒燒（筵棒燒是一種燒餅，上面夾有芝麻，其色黑），八町堀松屋之煎

餅，日本橋第一番高砂屋之縮繭饅頭，糯町之助三蘇燒，芝之飴，大佛大師堂之源五兵衛餅，皆爲當時名物。（下略）。按延寶年間，江戸之名物，大抵如此而已。當時兩國橋之幾代餅，鎌倉豐島屋之大田樂，市谷內坂之燒栗，均未出現。此等名物中，至今尙存者，唯糯町之助三蘇燒而已。

（洞房語圖）據此書所載，蘇燒自古卽有。

二十五世

二十五世紀

- | | | | | | |
|------|----|----|----|----|----|
| （將軍） | 吉宗 | 家重 | 家治 | 家齊 | 家慶 |
| （年號） | 寬保 | 延享 | 寬延 | 寶曆 | 明和 |
| | 安永 | 天明 | 寬政 | 享和 | 文化 |
| | | | | | 文政 |
- 天保

冠簪及傘

安永八年，始發明日傘，婦女用以遮避日光。自日傘發明後，無人戴菅笠矣，婦人結髮的方法亦大變。從前無人用髮針，也無人用釐針（燕尾髮針）；自此時起，婦女漸次仿用，髮結梳得很大，冠簪也極華麗。據寬政享和年間的繪圖觀之，冠簪之薄而長，甚爲可驚。今之老嫗，類能道之，可證所繪冠簪形式確係當時原形。

下駄（日本式木屐）

（三省錄）三四十年以前，下駄中部甚小，都是自己做來踏雪時用的。當時流行的扁縱，多用來做草履下駄的帶子。

天鵝絨的足袋

天明年間（日本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六年頃），淺草三社祭時，有穿天鵝絨足袋者，見者無不稱奇。

淨瑠璃

京都人駿河屋文右衛門者，元文年間來江戶，自稱常磐津文字太夫，創常磐津節。其門人富本豐前太夫創富本節，其門弟子甚多。清元延壽太夫（俗稱岡本屋吉五郎，殆爲岡村吉五郎之誤），就學於富本齋宮太夫，後創清元一派。鶴賀新內，於寶曆明和年間，創新內節。富本一派，爲富士薩摩掾之門人。

芝居

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時，因爲淨瑠璃之新節甚多，芝居之構造亦進步。又因新狂言之出現於此時者多，故各種道具亦同時發明。表演切腹或殺人時，因爲不出血，用紅木棉來表示。芝居中遂創用所謂糊血，儼然真血一樣。在此時代，衣裝皆用錦繡之類。白猿天鵝絨氈的臺銅也鑿孔，其上張以黑鉛皮。據說亦有張以黑布者。世俗已日趨華麗矣。聲曲類纂中有云：三郡舞臺之盛行，在寶曆年間。

繪畫之沿革

（名家書畫談）祇南海，柳里恭，大雅堂諸老，始慕南宗，學此宗畫法而各成一家。南海學識淵博而能詩文。里恭於武術文學之外稍通內典。大雅爲與元人雲林比美之高士，畫亦可稱爲白眉。此諸老之筆力，雖不及周文，雲舟等名手，但實爲日本南宗之始祖。世人稱之爲文人畫。清乾隆年間，沈南蘋渡海來長崎，其畫專長花草翎毛，彩色陸離，其體富貴而乏野逸，不脫院體之窠臼，其後方面圍到長崎，以水墨作花草翎毛，縱筆瀟灑，似學明人小子仙鶴之畫。雖偶有特別之配色，但大都深淺一律。山水人物，均嘗寫作，但不及花草禽鳥之有骨氣風神。

文晁，北齋亦出於此時，皆爲名畫家。

紅粉繪之變化

（馬鹿語）（明和年間之書）考最初出世的彩色印刷，在古時鷹形白粉箱的包紙上，以及繪雙紙的袋上，有一種繪畫，用紅藍二色繪成。享保末年，柏藪父才牛之遠忌進善集中，亦有紅粉繪。其後元文

初年，卯時菴珪琳社之春興印刷本出世時，吉田川魚用青黃赤三色作畫，當時甚為新奇。自此以還，鳥居，奧村等，用膠墨等色，其畫靜淡，如月前之螢火，寂暗無光。

望遠鏡之初造

（閑田次筆）寬政年間，和泉貝塚人岩橋善兵衛新製望遠鏡，為八稜筒形，周圍大約八九寸，長十倍之。政府的司天臺中，藏有西洋人造之望遠鏡。此外則一無所有。日本自造之望遠鏡，以善兵衛者為始。

食物店（東京街市）

（三省錄）露木直信有云：「安永年間，應友人之邀，到四谷末鴨子處，及歸，覺腹甚饑，欲尋一喫飯的處所，由四谷至市谷，竟一家也沒有。」

烟盒之始

（三省錄）從前無論何種人，到主人家裏，都是吸主人的烟。（中略）後來覺得吸主人的烟不好，纔有人作烟盒，自帶烟草。烟盒是金屬製的，或者綢緞之類做的，都很精緻。

異崎的景況

（馬鹿語）異崎本為邊僻之地，因風景甚佳，近年建築了許多精緻的茶店，成爲一個賞花之地。又有了風雅的田樂。這是社會日趨奢侈的象徵。

（譯者註一）淨瑠璃 日本之一種回曲。慶長年間，岩船檢校將淨瑠璃物語（描寫古時淨瑠璃姬之小說）編為曲節，稱為淨瑠璃節，合於三味線而歌唱，後人簡稱為淨瑠璃。藤原浮雲集其大成，又有種種之新曲及流派。江戶時普及於各階層民衆。

（註二）歌舞伎 日本之歌舞劇。

（註三）芝居 芝居本為居於草地之演。古時出雲阿國在京都四條河原的草地上演劇。後世遂稱戲園劇為芝居。

（註四）遊樂 本為以諸舞為旨之雜藝之總稱，轉而為與歌曲合演之一種舞樂。遊樂亦稱申樂或歌樂。遊樂為日語歌樂之轉。

音，其義探自中土。唐時，朝廷所用雅樂外之俗樂，稱爲散樂。周禮春官有云：『旄人掌執舞散樂，舞夷樂』。鄭注：『野人芻蕘之業者』。賈公彥疏有云：『以其不在宮之員內，謂之爲散』。狹樂之義本乎此。三代實錄中有云：『右近衛內藏當繼，長尾米繼，使善散樂，令人大笑，所謂鳴游人之矣』。又藤原明術之新狹樂記有云：『都狹樂之態，嗚游之詞，莫不斷腸解頰』，所者明術往來中有云：『又有散樂之態，假成夫婦之體，學義翁爲夫，摸蛇女爲婦，始發豔言，後及交接，都人士女之見者，莫不解頰斷腸』。

(註五)能 爲狹樂之一種，本稱狹樂能，後世簡稱爲能。

(註六)狂言 在能樂表演之間，參雜表演之雜劇，以諧謔爲主，亦稱爲『狂言綺語』或『興言利口』。

(註七)傀儡師 演木偶人(木頭)戲者。

(註八)人形 木或土製之偶人。

(註九)町人 工商業者。

(註十)旗下來 德川幕府旗下之武士。

(註十一)小姓 將軍及貴族之侍者。

(註十二)小者 武家用以操雜役之差役。

(註十三)中間 女僕。

(註十四)下半女 女僕。

(註十五)今織 時樣の織品。

(註十六)浮世繪 日本之風俗畫。岩佐又兵衛勝以爲始祖，實學土佐派繪畫，好繪當時之風俗。世稱爲浮世繪兵衛，寬永年間，三代將軍家光聞其畫名，招至江戶，時長女千代姬將降嫁於尾張藩，家光命繪嫁具。浮世繪遂流行於世，繼勝以而作浮世繪者爲菱川師宣，初本善畫，到江戶後學勝以之筆法，別成一家，稱爲菱川派，師宣爲天和貞享年間人，著有版刻畫本數十部，皆流行於世。其後有室川派，勝川派，喜多川派，歌川派，北齋派等，皆爲浮世繪之大家。

(註十七)女形 日本戲中之旦脚。

(註十八)荒事 日本之武戲。

本章所用日本年號與西曆對照表(以書中之先後爲序)

慶長(西曆一五九六——一六一四)

- 天正(西曆)一五七三——一五九一)
天文(西曆)一五七四——一五九四)
元龜(西曆)一五七〇——一五七二)
文祿(西曆)一五九二——一五九五)
寬永(西曆)一六二〇——一六四三)
永正(西曆)一五〇四——一五二〇)
元祿(西曆)一六一五——一六二五)
正保(西曆)一六四四——一六四七)
慶安(西曆)一六四九——一六五一)
承應(西曆)一六五二——一六五四)
明曆(西曆)一六五五——一六五七)
萬治(西曆)一六五九——一六六〇)
寬文(西曆)一六六一——一六七二)
延寶(西曆)一六七五——一六八〇)
天和(西曆)一六八一——一六八三)
貞享(西曆)一六八四——一六八七)
元祿(西曆)一六八九——一七〇五)
寶永(西曆)一七〇〇——一七一〇)
正徳(西曆)一七一〇——一七一五)
享保(西曆)一七一六——一七三六)
元文(西曆)一七三七——一七四〇)
寬保(西曆)一七四一——一七四三)
延享(西曆)一七四四——一七四七)
寬延(西曆)一七四八——一七五〇)

寶曆(西曆一七五一—一七六三)
 明和(西曆一七六四—一七七一)
 安永(西曆一七七二—一七八〇)
 天明(西曆一七八一—一七八八)
 寬政(西曆一七八九—一八〇〇)
 享和(西曆一八〇一—一八〇五)
 文化(西曆一八〇四—一八一七)
 文政(西曆一八一八—一八二九)
 天保(西曆一八三〇—一八四五)

卷六

第十二章 德川氏治世時代之開化現象

前章所述，爲德川時代外物進步之概況。當外物進步之時，心理之現象亦必隨之而發達。茲述其情況如左。

戰國時代

文學之概況

文學進步之概況

當戰國（註一）之時，下野有足利（註二）學校，相模有金澤文庫，京都有五山（南禪寺，東福寺，天龍寺，相國寺，萬壽寺），保護文學。或得足利氏或其管領家之補助，或自有領地，皆足以維持。自戰國以來，武人忙於戰爭，文章之事，久爲僧侶所司；自宣戰媾和以至平時交際之文，皆使彼輩任之。當時禪理最流行於社會，孔孟之道，殆已絕跡。大凡社會上有知識者之行爲，無識者必慕而學之，此時武人多學僧侶之所爲緇衣念佛。但當文運掃地之時，名僧之輩，雖稱爲知識份子，而絕少涉躐書籍。當時未有記載史蹟之書。記載古代事蹟學術之書更屬鮮有。社會中所流行者，僅詩歌連俳之類（頓阿之井甕抄，宗祇之新撰菟久波集，宗碩之藻鹽草之類）。戰國之時，英雄豪傑之士輩出，其所見所聞之事，皆足令人發生感慨，故藉詩歌連俳以述其想像，且能自演能樂，舞蹈，謠曲以自娛。因其知識止於此，故無足以流傳後世之文章。當織田豐臣二氏創霸之前後，文學稍有進步。淨瑠璃之文章，自此時起，次第增多。木下長嘯，細川幽齋，松永貞德之輩，講究歌學，其著述皆有益於後世。但孔孟之學，尙未流

行。此時藤原惺窩先生出，天性明敏，於紛亂鬥爭之際，勤勉讀書，初創程朱窮理之學於日本。蓋當中國宋時，文學最盛，於性理之學，尤有發明。於是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學者出，因格物致知之理而會釋孔子之道，是即所謂性理之學。自此以後，此學盛行，傳入日本使惺窩氏傾心信奉。蓋此時世亂漸定，日本之氣運亦能容此學發展。據傳在二十世紀之末，有玄慧法印者曾講朱註，但因氣運未至，雖一度播其種子，而未能成長。玄慧死後二百餘年，惺窩氏出而大昌明其學。若不當禍亂鎮定之時機，則惺窩氏亦不過如玄慧耳。惺窩氏當亂離之世，依然奉朱子學說，排斥當時盛行之佛學，而款以儒學代之，其志誠令人敬佩。若無惺窩氏出，則德川氏文運之發達未必欲如此之速。

醫學

自足利氏衰亡以來，海內鼎沸，無人用心於道藝。醫學亦僅奉宋之局方等，固陋自安。元龜天正年間（日本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年頃），有曲直瀨正慶者，專以李朱之法爲宗，旁參恆德，雲林諸家，造詣極深，治効亦夥。（皇國各醫傳）

日本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三年至二千三百年

（將軍）家康 秀忠 家光

（年號）慶長 元和 寬永

朱子學

惺窩之弟子林羅山爲德川氏所用，大弘程朱之學，羅山博學強記，著書數百部。石川丈山能詩，稱爲日本中興之詩宗。堀杏庵，那波活所，林羅山，松永尺五，稱爲四天王。朝山意林庵就學於五山之長老，終成儒者。皆奉宋儒之說。

王陽明學

近江人中江藤樹，得王陽明全書大喜，始倡其說。王氏之學自此起。藤樹篤學，品行方正，世人稱爲近江聖人。

醫學

曲直瀨正慶之子正紹，正紹之子親純，三世相續，家聲不墜。一時俊彥，多出其門，撰著甚多。金元之醫術，風靡一時。迄至岡本一抱，更加詳密，雖俗士叢生，皆能解醫籍。其功甚偉。世稱爲丹溪派。蓋以奉明朱丹溪醫術之故。（皇國名醫傳）（岡本抱一爲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人，爲記述方便計，列於此處）。

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

二十四世紀

- | | | | | | |
|---------|----|----|----|----|----|
| (將軍) 家光 | 家綱 | 綱吉 | 家宣 | 家繼 | 吉宗 |
| (年號) 寬永 | 正保 | 慶安 | 承應 | 明曆 | 萬治 |
| 寶永 | 正德 | 享保 | 元文 | | |
| | | | | 延寶 | 天和 |
| | | | | | 貞享 |
| | | | | | 元祿 |

朱子學

林羅山之子春齋，春齋之子鳳岡，皆奉朱子之說，爲德川政府之祭酒。朱子學自此愈盛。當是時，土佐有野中兼山，備前有熊澤蕃山，皆以經濟名於世。江戶有由井正雪，山鹿素行，皆以軍學著稱。此四子在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之初，皆爲名震一時之俊傑，非尋常徒讀死書者，蓋所謂活儒者歟！其於宋儒之說，卻未必深奉。山鹿素行著聖經要錄排斥程朱。蕃山之集義和書，外書，大學或問等，頗多卓見。久爲戰亂所蕩盪之日本智力，至茲始勃興。其後朱子之學愈盛。今舉其重要者：山崎闇齋，木下順庵，貝原益軒，藤井懶齋，仲村惕齋，五井持軒，五井蘭州之輩，皆以碩學大儒爲世所稱。其著述亦多。此時明人朱舜水至日本，應水戶藩之聘。水戶侯德川光圀好學，集和漢之書以獎勵學問。水戶之文

學自是盛興。迄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之末葉，此派子弟，顯名者甚多。關齋門中有三宅重固，佐藤直方，淺見綱齋。木下門中有新井白石，室鳩巢，雨森芳洲，祇園南海，辯原篁洲。水戶藩內之安積澹泊齋，三宅觀瀾，皆奉朱子學。

復古學

當漢學興盛世人多傾仰於朱子學之時，異論之發生，乃勢所必然。此時伊藤仁齋始創復古學於京都。其言曰：『性理之學，非孔子本意。程朱等容佛說以補孔子之說，此乃大誤。孔子所言，秉性與教，宋儒之學，以性爲學問之全體。大學非孔子之遺書。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一源等說，皆佛老之淫辭，非聖人之意』。其子東涯，蘭峒，弟子並河天民等，復鼓吹其說。此時物徂徠出，初奉宋儒之說而著護國隨筆，駁仁齋之復古學。但其後讀李王（明人李攀龍，王世貞）之書，大爲感動，盡廢舊學，治古代之文辭，益知宋學之非。因歎曰：『豈唯我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唯今日哉？千古以來皆是也』。乃著論語微，辨道，辨名，學則等書，痛擊宋儒，詆譏思孟，務求新立門戶。其弟子太宰春臺，安藤東野，山縣周南，服部南郭，平野金華，鳴島錦江之徒，從而鼓舞之，海內一時爲之風靡。平安之宇士新，宇士朝，又立一家言。宋儒之學自此衰。

經濟學

熊澤蕃山之大學或問，物徂徠之政談，太宰春臺之經濟錄等，後世皆稱爲經濟學之著述，爲學者所重視。新井白石之折焚柴記中之貨幣論，頗多卓見，令人感服。

開化史

白石之卓見，爲其深注目於社會之原理。所著讀史餘論，述日本古來政府興廢之理，後世史家蒙其餘澤不少。蓋足爲當時文運生色之書。

和學

此時和學亦進步。下河部長注在大阪，於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之初，早已註釋萬葉集，源氏物語等，研究古代之言語文章。其後僧契沖（長流之親友）大興此學。伴蒿蹊曰：「此師之歌學，以顯昭法橋之說爲梯，覺其能使古書明徹易解。大凡近世之人，若非中川流之說，則以爲非論道之言。因此發生許多傳會杜撰之說。此師看破此關，一事一語，取徵於古。其中雖不免有過猶不及之處，但此道一開，許多致力於斯學之人亦隨之而出。因此，稱之爲千古一人，實非過言」。其門人有今井似閑，海北若沖，野田忠肅，益弘此學。契沖之時，荷田春滿亦以神代卷，萬葉集立家學。契沖之說，甚爲精密；此翁更進一步，樹立其說。北村季吟亦多所發明。

俳文

（俳家奇人傳）書中松尾桃青（芭蕉）一條中有云：古俳諧之連歌，以及賴義朝臣，西行法師之俳諧，雖多美句，但無一定之規律。宗祇，宗長，掛河之時，灰書之俳諧，亦無所謂發句舉句。宗鑑，守武等，撰大筑波集，飛梅千句，其文雖美，但亦未立一定之準繩。自松永貞德蒙九重之勅許，俳諧之式始大定。時難波之宗因，打破古風，發起新體，詞藻之洒落，令人絕倒。世稱之爲談林。翁（芭蕉）未爲宗房時，曾學談林之風格，造詣甚深。但後自撰次韻集，與談林大異其趣。又探杜律之風骨，摹仿山家集之寂寥風味，往往於幽玄之體中離人情之理窟。因此，正風遂大成，天下後世咸譽稱爲俳諧中興之大祖，實非過譽。榎本其角，服部嵐雪，及其他著名之弟子甚多。俳文一體，實至此起。

狂言作者

（聲曲類纂）古昔的淨瑠璃作者，皆非專門人材。俳諧師或遊人（註五）之類，巧於文辭者，均嘗試作。又其撰作淨瑠璃，多爲圖自己之消遣。浪花俳諧師名井原西鶴者，作題名爲曆之淨瑠璃及凱陣八島等篇。其後近松翁出，始專作淨瑠璃，自此以後，始有專門之淨瑠璃作者。西鶴爲梅翁之門下，爲大阪談林之一人，其戲作之草紙（稗史），今多流行於世。據云近松翁爲其門下。

(古今役者大全)村山又兵衛座有名杉三安之作著，鹽屋九郎右衛門座中有名近江屋次因篤之作著。其後有名作者，相繼出世。近松門左衛門加入京都都萬太夫芝居，作品甚多，頗受世人稱讚。永阪有名彌五右衛門之作家，爲有名之狂言作者。從前雖有雜狂言，但現今之狂言書籍三番續，則始於彌五右衛門。(中略)富永平兵衛爲後起之秀，於延寶八年著之顯見世(優伶初次試演)中，始署名於書籍(戲目單)。在此以前，無寫出作者之名字者。安達三郎左衛門，金子吉右衛門，聲譽都很高。

(聲曲類纂)據江戶名所叻所載，和泉大夫的淨瑠璃，爲岡清兵衛所作。相傳金時有子名金平，流邊續之子名竹綱，但不知爲何時人。自此二人之故世傳出後，世人皆認爲古代相傳之辨慶，時宗，朝比奈等人，皆非金平之敵手。於是愛好怪力亂神之流，一聞談及金平故事，無不握拳咬牙而喜。金平故事，在日本內流傳甚廣，雖三歲之幼童，無不知之。岡清兵衛採金平之故事，編爲金平鬼等狂言，成爲所謂金平節。享保年間，名爲金平最後之狂言出世，描述金平死後在地獄中之情形，頗受世人歡迎。其後又作金平蘇生，亦哄動一時。

萬國地理書

新井白石問萬國之地勢於羅馬人及荷蘭人，著采覽異言，是爲日本有萬國地理誌之始。

醫學

李朱之醫道，其後專以穩重爲主，其弊遂至『迂拘卑泥，姑息養癰』。享保元文之際，名護屋丹水，後藤良山之徒，稍創復古之風，於是名家迭起。迄至吉益東洞，直溯秦張，面目一變。然愈創太過，或失於武斷。世人稱之爲古法家。(皇國名醫傳)。

天文學

貞享年間，保井算哲發見貞觀曆之誤謬，作新曆，稱爲貞享曆。其後中根元圭，西川如見諸子，皆以精於曆算著名。

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

(將軍) 吉宗 家重 家治 家齊 家慶

(年號) 寬保 延享 寬延 寶曆 明和 安永 天明 寬政 享和 文化 文政

天保

復古學

嘗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之初，物徠之高足方鼓吹其說，以古文辭相誇耀；股部兩郭，高蘭亭，餘熊耳，宇瀨水，湯淺常山，瀧鶴臺，伊藤藍田，龜井道載，及伊藤東涯之弟子青木敦實，奧田三角，武田龍等爲其魁。此時不嫻古文辭者，大有不能廁身學士之林之概。蓋天下泰平已久，士有常祿，平居無事，唯以讀書消閑；故以平易之文著書立說者，絕不爲世人所稱賞。譬如巧匠組合許多之木片以作器，雖無益於實用，且乏風趣，但其巧技足以驚俗人之眼目。故當時之人，蒐集古文之難解文辭，巧綴成文，以誇其博識。此派學風，直至天明寬政年間，甚盛於江戶。

文章家

但當時亦有不修古文辭而以詩文名於世者。梁田蛻巖，秋山玉山，江本北海，皆川淇園，皆在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前後爲著名之學士。

朱子學

嘗物氏學方盛之時，中井覽菴，三宅石菴等，設懷德書院於大阪，維持朱子之學。覽菴之子積善，積善，皆豪邁卓犖，排物氏而弘家學。但此時之奉朱子學者，亦不似舊時之固陋。積善曰：懷德學非林，非山崎，爲一家之朱學。著有積善逸史一書，後世史家多受其澤。此時賴春冰，尾藤三州，柴栗山，古賀精里，皆奉朱儒。寬政年間，德川政府召古賀尾藤柴之三子，使司學政。立柴栗山之五日以造

士，稱徂徠之學爲異端而排斥之。李徂徠學者大怒，甚至欲襲擊栗山。但柴栗山不爲所動。自此朱子學再興，徂徠之學大衰。其後有於崎謙堂，佐藤一齋，賴山陽，長野豐山，安積良齋之輩，雖皆奉宋儒，但於性理之事，不甚主張。德川時代之文學，至此最盛。

折衷學

在朱學再興之前，有折衷學發生。所謂折衷學者，蓋取捨漢唐之註疏，參酌宋明諸家之說，而尋求孔子遺旨之謂。自伊藤仁齋，物徂徠等駁擊宋儒以來，學者皆知其非。而仁齋，徂徠之說，又失之過激，學者亦知其非。折衷學遂由此發生。折衷學之說，據云爲明和年間井金峨所創始。但金峨爲井蘭臺之弟子，蘭臺不信奉朱子學，金峨之創此說，蓋亦時勢之產物也。原雙桂，梁田蛻巖，紀平洲，南宮大湫等，亦主張折衷之說。但主張此說最力，駁斥徂徠，春臺等之說者，莫如金峨。其後山本北山，太田錦城二人奮起鼓吹之，痛論修辭之弊，推崇韓柳歐蘇，專以清新流麗，平散暢達爲主。蓋掃除古文辭之弊，以北街之功居多；而使經義明瞭，則以錦城之功居多。中井積德在大阪，以文章名於世。其後以考證折衷諸學而聞名於世者，有朝川善菴，安井息軒，芳野金陵之輩。

和學

荷田春滿之姪在滿，其子御風，開筵講學，從學者極多。此時和學亦有復古之說。賀茂真淵，從荷田春滿學，大唱復古之說。和歌摹倣萬葉集體，文章亦剽竊古言；國學者流翕然從之。徂徠，春臺等稱日本爲蕪夷，風漸甚爲憤激，以爲：「日本本有神聖之良道，自唐虞三代之道入，而良道泯」。因而仇視儒學，竭力排擊之。其門人之中，以藤原宇萬伎，楫取魚彥，本居宣長，橘千蔭，村田春津等最有名。宣長博學，所著古事記傳最有名，其他有益之著述甚多。其弟子平田篤胤固執和學，排斥儒佛。此種見解，雖不免於偏頗，但日本文典之爲人所重視，實此數子之功。伴蒿溪在京師專以著作爲事，卓見頗多。村田春海，加藤千浪，其後稱爲江戶之二宗匠。春海潛心漢籍，不信賀茂氏所主張之道，常云：

日本太古無所謂道，自文字制度以至衣服飲食等，皆取之於中國。通儒學及本朝之典故言辭，即可稱爲和學者。故除周公孔子之道外，餘無所謂道。中古以來，佛學盛行，一般士庶，莫不奉之。故拾此二道而言道，我未之聞也。今之和學者恥日本之無道，牽強附會，妄引日本古史，欺己欺人。

俳文及狂文

迨至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俳文大進步。尾張人橫井也有（孫左衛門）著鶯衣，浦海等，創立一種俳文。其體遠勝於蕉門諸子，甚爲精巧。東都又有風來山人（平賀源內），蜀山人（太田南畝），六樹園（石川雅望），喜三二（平澤天壽）等才士出，自由運用文筆，愚弄一世，且創狂歌狂詩等新體，其才殊堪欽佩。

小說

元祿年間，浪花有西鶴（即井原西鶴），曾編若干戲文，但多述己之感想，而非小說。享保年間，京都府有江島其碩，善述世情，筆勢雖與近松相似，然亦非小說家。此外流行於當世者，爲淨瑠璃或歌舞伎狂言之繪本，無足觀者。及至文化年間，江戶有京傳（即山東京傳），以天賦之才資，發揮豐富之想像，描寫人物，創立小說之基礎。其後有馬琴（即瀧源馬琴）出，更積磨練之功，適合於人情；其脚色雖遠不及京傳，但其體可謂大備。時柳亭種彦著草雙紙（註四），便婦女之閱覽；爲永春水新作人情本（註五），不注重脚色，以言語爲主；式亭三馬以滑稽著。至此始可謂有文學。

漢方醫學

承古漢家之末流，徒守書空，其弊攻下泛投，草菅人命。因此天明寬政之際，京師有福井楓亭，荻野臺州，和里東郭諸人，江戶有多紀蓋溪，樑蔭爾先生，精心覃思，折衷古今，補瀉溫涼，無所偏執，從前之陋弊一洗殆盡。（皇國名醫傳）

西洋醫學

荷蘭之醫學亦於此時傳入。前野蘭化，杉原麟齋，柱刃甫周，孰異崎之通譯講究荷蘭之解剖書，又與宇田川榕菴共同講究藥劑書。

理化學

青地倫宗著氣海觀瀾，宇田川榕菴著會密勝察，其立說皆基於實驗。今日之學者猶依賴之。

天文測地學

麻田剛立好皇曆學，晝讀書而夜驗之於天，苟有不合者，則悉捨其書而易求新術。研究九年，其法大精。其後十餘年間，凡百測驗，毫無所違。後來清商舶載西洋之書入日本，據云其說與剛立所發擇者，若合符節。聞長濱繼續研究之，補遺之處甚多。伊能東河亦以天文學聞名，後見高橋東圃，知西洋曆法之精確，悉棄舊學而學之，多所發明。伊能氏最精於推步測量，著書論磁石極之不動。

狂言作者

（古今役者大全）書中有云：近來江戶有所謂津打漁兵衛一派的名作或興作，將於花半七的故事插入太平記之中，曾我五郎成爲國姓爺，十郎祐成變名爲平野屋傳兵衛，表演時不易了解。大阪有名中田嘉右衛門排名猪同者，受戲院主人之招，表演狂言，技術甚精，表演黑船等狂言時，尤博好評，世人稱爲「歸川家之藝」。（中略）現今作者，稍具聲名之輩，江戶方面尙有數人，在京郡大阪方面則無有能及從前者。

（聲曲類纂）竹田出雲清定於寶永二年三月爲竹本芝居之主人，自享保年間以來自作淨瑠璃，佳作甚多。有名小出雲者，爲清定之男。（假名手本忠臣藏之狂言，爲出雲掾與三好松洛，並木千柳三人所作，有名一時。在此以前，享保十八年十月大阪豐竹越前掾座有忠臣金之短冊，爲並木宗助，並木丈助所作，乃小栗橫山時代之狂言，大岸由良之助之名自此出。其後江戶方面有人改作，享保二十年春中村座有稱爲鐘樓放鄉錦的狂言，大岸宮內一脚，由澤村宗十郎扮演。此年津打治兵衛所作忠臣藏伊呂波軍

說，在市村座上演，大岸宮內一瞬由坂東三郎表演。其後延享四年京都中村桑太郎座，有題名為大失數七十七本之狂言，澤村宗十郎扮演大岸宮內一脚，頗受世人之歡迎。寬延元年八月，竹田出雲清定所作之假名手本忠臣藏出世，初表演於大阪竹本座，自是年十二月朔日以來，由歌舞伎芝居嵐三五郎座表演。自此以後，操歌舞伎座，亦演此淨瑠璃，自今未廢。福內鬼外（平賀源內）亦作淨瑠璃，神靈矢口之渡，為最精作品，流行於世。

表中遺漏尚多，後世之人若以此書為不可棄，希補正之。

文學貨財之進步大抵並行

據以上二表觀之，可知德川時代文學之進步與貨財之進步併行。但其間先後次第，自然有不可一概而論者。又就其時代觀之，貞享、元祿時代以前，進步之勢最速，其後稍遲滯。及至文化文政年間，又有次第增進之勢。蓋社會事物，整然為一列而進行，此乃社會之常理；但若就其細目觀察，則未必不有小遲速。此非僅社會之理為然，一切外物之理，皆有如此者。夫彗星之繞太陽，乃由於遠心力與求心力之關係，據吾人想像，其軌道應為橢圓，但實際則為橢圓。燈火之滅，由於油盡，據吾人想像，必為次第暗淡，但當其滅時，卻放明光。此類事實，在物理中極多見。蓋因方之不同，故有遲速強弱之異。社會進步，雖循社會常理，但其進步有緩急遲速，乃勢所難免。在德川時代，貞享元祿及文化文政兩價時期內，社會之進步最速，殆因此故。但君一考其全體之歷程，在足利氏季世社會頹衰之後，而能發生德川氏燦爛之勝化，社會進步之理，亦不易說明之。蓋此等進步，不因政府之保護，亦未嘗藉外國開化之助，完全循社會自然之律而進步，後世之愛國事者，熟讀此二表，或可了解干涉保護之非當歟。

二十四世紀文運為撥亂反正

日本紀元二十四世紀進步之速，實屬可驚。在儒者之中，有熊澤了介，物徂徠，新井白石等俊才。在俳諧方面，有芭蕉，其角等巧妙之人。在佛學方面，深草元康等人，造詣甚深。雜言作者如遊樞門左

社會進步
之小遲速
道甚厚之軌

干涉保護
之不可

衛門。清英衛箠，皆能創新滿軸。在浮瑣瑣界，有竹本義夫之流，復著之而有都依順士之漢。時英邁豪傑之資，永受後人之崇拜。貨財之進步亦極著，就前表可見。蓋二十四世紀之進步，乃受戰國時代抑壓已久之文運，得太平之時而俄然勃興。當二十五世紀之初，止達諸氏死亡之後，迄通租有遲滯之狀，及至此世紀之末，更以迅速之勢，表現第二期之進步。在醫學方面，有振興學出，排除舊障諸團體之說；其後山本北山，太田錦城，中井竹山，依藤一齋，賴山陽，安井龜軒等，莫不以見識與文章，風靡一隣。在和學方面，有賀茂興淵，本居宣長，村田春海之輩，探探太古代之真寶，並正厥旨。在文學方面，有麻田剛立，伊龍東河，金子半七郎之輩，深探天空之外。在小說方面，有京傳，馬琴，誇文學之巧技。在俳文界有也者，在狂文界有風來，蜀山之輩，創一種新來，皆為博讀兩船出新機軸之人。其他貨財之進步亦極著。茲特對此等人物，略下批評。讀者多以二十五世紀之諸士，較二十四世紀之人物為劣；蓋以後者之事業，較前者為人所注目。但就開化之程度而言，則不能不承認二十五世紀之人物為優。蓋二十四世紀諸人，皆為創業之人，其所為者多文學上擾亂反正之事，故其功名為人所注目。至於二十五世紀諸人，受前人餘蔭而去其弊病，發揚其美點使適合於社會。故其功名雖不及前人，而其智識則遠過之。小說，俳文及其他文學，在此時期創業者極多。文運決非退卻。吾人論文化上之人物時，對於一技之優劣，不可不加以細察。然則二十五世紀之人，何能在二十四世紀之下耶？

封建開化之性質

對於一般的進步考察之後，再略記其開化之性質。蓋以上之開化，皆為發生於封建制度之下。開化，故有適應封建社會之形狀。今略述其理由。在封建社會之中，有許多領有大國之諸侯，其下有許多由階級而成之武士，其下有商有工有農。農與工為貧困之一族，諸侯為殷富之一族。立於二者之間之士與商，其階級極多，實者可比於王侯，實者農工之不如。德川時代之文運，由於此多數階級之需要而發。現於世，故其精華相隔甚大。在讀書方面，王侯富豪眩於古聖賢之名，專招學士使讀孔孟之書，稱頌禮

德武仁齋、北山、歸城、一齋、鐘明六種之學士輩出；但中等以下之人民認爲此乃破產之道。彼等無所用於畫畫之書，僅以商賈（註六）往來，都路（今川（註七））之類充其教育。在和學方面，王侯富豪貴古矜古之語，招引學士專講古事記，萬葉集等，因而真淵、宣長等明古辭之學士輩出；但中等以下之人民，以首人一首爲極度。在文章方面，王侯富豪，專重漢文，稱揚解古文辭者，因而有徂徠、南郭之輩出；但中等以下之人則不能了解。在和文方面，王侯富豪以用古事記中奇古辭語總文章爲博識，因而有真淵、宣長之輩古文家出；但中等以下之人，則以用平假名之草子（註八）爲便。在繪畫方面，王侯富豪好意境深遠，觀賞玩味始能解其趣者，因此兩宗之畫盛行，有油大雅等兩宗畫家出；但中等以下之人則以錦畫爲樂。在書法方面，王侯富豪重唐人筆法，有廣澤、東江等書家出；但中等以下之人則僅用所謂御家流之書法。此外，如器具、居宅、服飾，以及一切其他文明，王侯富豪所用者其標準極高，而中等以下之人所用者其標準極低。不僅其標準有高低之懸殊，其性質亦大異。蓋社會之不平等，乃社會之常情；尊卑之所用不同，固所難免；但絕無如封建時代之甚。以封建而致太平，如德川氏者，爲古來各國所少見；苟欲詳知在封建組織中有如何之開化發現，莫如詳察德川時代之開化。現今欲產生此種學人，殆屬無望。欲發生此類之器物，亦不可得。欲窮開化之理者，對於其所以然之故，不可不特別注意。

重族之開化

此外還有最應注意之事，在封建制度之下所發生者皆具有封建之性質是也。蓋凡注繪畫中亦來，畫町化爲酒斗凡接近磁石之鐵，皆可成爲磁石鐵，凡在封建制度下發生之現象，皆具有封建之性質。試就實際之現象觀之，德川氏之內制，與各諸侯之內制完全相同。各諸侯之內制，與各藩主之內制完全相同。各藩主之內制，與各商賈之內制完全相同。各商賈之內制，與各伴頭之內制完全相同。首此以下，無不皆同，皆以僕隸家來團結而爲一家者也。蓋封建之制，最注重族的觀念，故家長子而輕庶子。假令繼嗣雖最善，亦必使之連綿相傳，以延其一族，其計劃極爲周密。即至其族之血脈完全斷絕時，仍用養

在封建治
下皆有封
建之性質

子之法，以續其嗣。在表面上觀之，仍然是一脈相傳。其所以如此者，完全是本乎人之天性（避死保生）。此種觀念，在封建制度之下，非常發達。後世之人，苟仔細玩味之，可知社會中有一定之理，在某種制度之下，必有某種之作用。（封建之制，重視族的觀念。故家康之臣雖有直政，忠勝等，但其關係不在於家康與直政，家康與忠勝之間，而在於德川氏與井伊氏，德川氏與本多氏之間。故家康給與直政，忠勝等之恩義，非直政，忠勝受之，乃井伊氏本多氏受之。因此，如果井伊氏本多氏之血統絕，他家入繼其家，對德川氏之關係，仍照舊不變。此種情形，在其他諸侯之間，亦莫不皆然。至於君臣父子以及其他親戚之關係，皆非結於人與人之際，而為結於族與族之間。因此，商人亦以族成為諸侯之出入，伴顯亦以族成為商家之伴顯。其他學士，醫士，役者，職工等，皆以族而立於社會）。

社會自救治

據以上所述之事實推論，可知凡開化之進步，皆本於社會之特性。譬如王朝時代，門第貴賤之弊甚盛時，各地發生封建之勢，時人遂努力求自由。足利氏之季世，有封建戰國之禍亂，時人終集合而求致太平。既致太平之後，自文學，技藝，以及凡百之事，皆同時進步，以求使世人之生活快樂。社會之動向常如此，英雄豪傑之所讚為者，不過或使其勢加速，或使之遲延而已。嗚呼！若推此理而察將來，日本之前途如何，亦可得而預知也。

社會之發達如草木之發達

社會之發達，與其他有機體物之發達無異。今就草木為例。草木之性質，在乎保存保生避死之天性，故其逐日生長，殆無疑義；但若以種種之方法養之，則可以使其堅韌，可以使其柔弱，可以使其長大，可以使其矮小。同樣，社會開化之發達，亦為社會之本性，但若以王朝之制度養之，或以鎌倉政府之制度養之，或以德川政府之制度養之，則自文學貨財以至風俗人情，皆有不同之稟性。由是觀之，立社會之制度者，恰如園丁之育草木。如知在如何之情形下草木最易成長，則在如何制度之下，社會之發

性
避死之天
性
王朝之制
度
鎌倉之制
度
德川之制
度

遠最速，亦不難知。

(譯者註一) 戰國時代。在日本歷史中，自應仁之亂(西歷一四六七)起至豐臣秀吉統一天下止(一五八五年)，稱為戰國時代。

(註二) 足利學校。在清下野國足利郡足利町，即今栃木縣足利市。其起源傳說不一，或謂仁明天皇承和九年(西歷八四三年)，小野篁任陸奥守時，建議開所於國府，後土御門天皇應仁元年(西歷一四六七年)遷居景久移遷足利，始改今名。其起源蓋久，殆無疑義。室町時代之中葉，上杉憲實再興之，給與學田，收讀書籍，招養生徒，其子憲忠，孫憲房皆好學，又寄存許多書籍於其中。此時兵馬恣恣，諸國國學悉廢，四方來學者頗多。僧九華任學頭時最盛(天文文祿年間)，其生徒大半為僧侶，易易學及醫藥。建業宏壯，門徒無不登門，中門上懸匾額，上書「學校」二字，為明人蔣龍溪所題。內置孔子，子思，孟子，顏子，曾子之像，讀書甚常，多宋版古籍。現仍保存，始作古蹟。

(註三) 蓬公。風流才子讀之遊人。

(註四) 草堂子。釋史或小說。

(註五) 人情本。情藏小說，古情小說。

(註六) 商賈往來。商業尺牘，商業應用文。

(註七) 半川。半川狀之略。本為今川了俊所說其弟仲秋之家書，一卷。江戶時代作為習字帖。

(註八) 菓子。菓子藏水鏡。

第十三章 德川時代勤王思想之發生

謀反者之口實表示與論

王政復古
之志

在日本開化如此進步之際，有一種不利於德川政府之元素發生。此種元素爲何？尊崇王室之風氣增進是也。當德川家康裁定禍亂時，深知王室將來之可懼，因此表面上雖亦尊重，實際則加抑制。當戰亂離之時，王室式微，及至德川氏起，王室未費絲毫之力，而受衆庶之尊崇，得許多之俸領，前後比較，不啻有天壤之別。但至人智漸能辨別古來歷史之是非，見德川氏親掌萬般政務，王室徒擁虛位，恢復王室舊狀之志遂不免油然而發生，是乃家康之所欲竭力豫防者也。但此心理之進步，非一朝一夕之事。當日本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七年德川三代將軍治世之時，肥前島原有耶蘇宗之亂，其主要份子，爲大阪之殘黨（豐臣氏之舊臣），其主要目的爲破壞德川氏之政體。不過其藉口以固結人心者爲耶蘇教，而非公然主張勤王耳。姦雄之士，憤其志之不成，欲向政府動干戈者，必擇當時輿論之所趨重者爲口實。苟當時之輿論果趨重於勤王，何必不藉口於勤王耶？其不出此而必藉口於耶蘇教，可知當時勤王之說尙未爲世人所重視。其後經十四年，至日本紀元二千三百十一年，有由井正雪，九橋忠彌之亂，正雪乃不懼死而願傳臭名於萬世者也。若勤王之說當時甚盛，何不藉口於此以固結人心？但其所藉口者非勤王之說，而託德川氏之親藩紀州公以謀反。由此可知當時勤王之說之未盛。但其後太平日久，社會之中必然發生重要之教則訓言，此乃自然之勢。德川政府之組織，爲封建制度，破壞封建制度者爲不忠之臣，故忠義之教因太平日久而發生於社會之中。及至漢學旺盛，其碩學鴻儒愈鼓舞之。蓋孔子之教，本爲封建時代之產物，其說君臣之分義，皆適宜於鞏固當時之社會結構。且凡百事物，因見著之地位不同而異。在德川時代流行之孔孟之教，偏於忠義一點，世人對於純粹孔孟之教，尙不如此重視。其所謂忠者，乃爲君而不

忠義之教

九國之尊王

顧其身之意，其所謂孝，乃爲父而不厭痛苦之謂。此並非中庸之道，但維持封建制度全賴此種心理，因時世之推移而此心愈盛。凡當時所謂英雄豪傑之士，未有不鼓勵此種風氣者，日本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七年，水戶黃門光圀之所爲即其事也。光圀之主義，在於尊崇皇室，立皇統之正經，排斥佛教，明君臣之分義。故搜蒐日本之古籍，以作大日本史，禮義類典之類，又重聘明遺臣朱舜水講解漢籍，以孔孟之儒道爲據而獎勵忠義之教。其對於社會人心大有感動者，爲建楠氏之墓於漢河，題「嗚呼忠臣楠子之墓」等字於碑上。在此以前，楠氏之名未顯於世，唯一二儒者讀舊史，見其事跡而欽慕之。及自光圀建楠氏之墓於漢河以來，雖村兒牧童，亦知楠氏之爲人，了解勤王爲最榮譽之事。其後不久，日本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一年時，有赤穂之臣爲其主報仇之事，因其情可憐，其志甚堅，海內人士皆慕其爲人。俳諧師作俳諧，戲劇家作忠臣藏，儒者著義人錄，歌人詩人各以其所長而讚美其行爲。赤穂義士忠義之行爲，爲當時社會所尊崇，世人莫不以其被處刑爲可惜。

御家嚴罰

在此時代之前後，在德川及諸侯內部所發生之騷動，亦大足鼓勵忠孝之氣。夫攻擊後來勤王之徒視爲亂臣賊子之君家，實爲破壞封建制度之始，但當封建制度之時，未有不視爲大逆不道而排斥之者。創亂之人，世人皆惡之，目爲姦賊；鎮定其騷動者，世人皆讚賞之，目爲忠臣。因而社會之風教，愈適應封建制度之發達。

戲劇文學
勸善懲惡

當此時，因戲劇，淨瑠璃，小說等之盛行，更足以助長其勢。當時之戲劇文藝等，非以改革當時社會之風教爲目的，而係描寫社會風教的實情。因此，其本旨爲勸善懲惡，亦不過表示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而已。但忠義之風，因此而愈盛。試觀當時歷史中所記載者，上自王室將軍諸侯之家，下至武士商人等之事，多爲臣僕之內有惡人欲覆其主家，主人庸愚，無法自救，隨即有忠臣出，備嘗痛苦，恢復舊家。能鼓動世人之感情，未有甚於此類著作者。讀者皆見惡人而憎之，見善人而憫之，多至於切齒扼腕。此等著作，將惡人描寫得非常之惡，將善人描寫得非常之善，頗不近乎人情；但當時人情相魯，亦

能使之感奮。

忠義心因利於封建制度故發達

當時社會上所流行之輿論，在表面上看來，雖有如英雄豪傑所提創；但查其實際，則固適合於當時一般人民之利益而發生。夫忠義之教，何以對於當時人民有利益耶？蓋當辦之制度，為封建制度，社會依君臣之關係而成立，故忠義之教，最適宜於維持此種社會。又如勸善懲惡之世教，雖為聖人所作，實則集愚夫蠢婦之輿論而成者也。

忠義心大發達對德川政府不利

然此忠義之說發揚之後，於德川政府之封建制度，頗為不利。其故何耶？因在日本的政體上，忠義主義之最高者，非盡忠於德川氏而為尊崇王室。在歷史知識普及之時，一般人民未有不了解此義者。忠義主義者德川光圀，本無使人心背叛德川氏之意。但既知盡忠於君為善事，則必知人君中最尊最貴者莫過於天子；故對於盡忠於王室者尤尊崇之。譬如赤穂義士以及其他戲劇小說中所記載忠義之士之行爲，皆為忠於其君者也。苟忠其君，則封建制度必鞏固；但苟忠其君之君，則其結果又當如何？當忠義之教愈著於社會，古昔王朝極盛之歷史愈為世人所了解時，則所謂忠義之氣者，不在於其君，在於其君之君，乃為正確之結論。本來就事實而論，為其君之君者，完全與一般世人無緣；但人情之感覺，決不如此。且人類貴賤之分，頗能助長此種盡忠於君上之君之思想。蓋對於不親者最易發生尊敬之念，乃人情之常。苟其人非希世之賢材，則與之親近者，未必認其為可尊敬之人；反之，傳聞其聲名而未與之親交者，必有種種之玄想，自然對之發生尊重之念。（貴尊之念，由保生避死之天性而發生，其理由詳於第四章）。因此，王室奠都於平安，不問世間之政務而處於隱退之地位，乃為誘發世人尊敬之一原因。自神代荒蕪之時，正統相傳，連綿不絕。此種歷史，已為世人所週知，而尊崇王室之思想亦遂逐漸發生。世人認為日本者天子之日本，普天率土，莫非王土王臣，中世源賴朝等雖以狡黠之才攘王權而立將軍政

忠義與尊
王

對於君上
之君之忠

世間帝王
心之歷史

府之毒，但真正之神權仍在王室。

和學與神道

此種思想之發生，第一個原因爲和學漸次發達與神道之隆盛。蓋神道之說，自王室衰微鎌倉政府興立之時起始成爲一有體系之思想。後鳥羽院之時（日本紀元十九世紀之中葉），下部兼直著神道大意。其後度會家行著類聚神祇本源。南北朝戰爭之時，北畠親房著元元集及神皇正統記。自此以還，神道之說稍具形體。其後自足利氏至戰國時代，神道全衰，無可觀之書。及至德川氏鎮定海內，始爲儒者注重日本古史之叢所研究。林道春，山崎闇齋，新井白石之輩，皆有關於神道之著述，而闇齋更深信之。和學者真淵，宜長，篤胤謠子亦熱心主張，於是日本士人皆信「日本國爲神國，神之子孫世世登天位，爲世界無比之尊國」。因神道思想之進步，尊崇皇統之風亦甚盛。迄至皇室之祖先爲神之理論盛行後，勤王之風又由此發生。故由忠義之氣漸至發生勤王之心。此氣磅礴鬱結，及至高山彥九郎，蕭生者平輩，深歎王室之凌夷，說諸侯而鼓舞士民，遂充分表示其不顧身命之熱心矣。

賴山陽

讀史餘論
史日本外

嘗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之末，儒者之中亦有人極力主張勤王之說者。其人爲誰？賴山陽是也。山陽所主張者，與神道之主義不同，且駁擊神道，但其尊崇王室，則遙過之。山陽讀新井白石之讀史餘論，知皇朝衰微武權興立之所以，深爲慨嘆；又讀楠氏之勳功而哀其業之未成，指斥德川氏專擅政權，使王室徒擁虛位，痛論時勢之不得已。新井白石以傑出之才，深明開化之原，故說明古來政府興廢之理而判斷德川氏專政之得失。賴山陽即依白石之說進而鼓吹勤王主義，識者雖或咎其所爲，但不能不承認其爲一世之俊傑。況自山陽之日本外史出世以來，一般人士知勤王之義，志士靡然向之。自古以來以著述收鼓動人心之效，未有如山陽之日本外史者。此亦足窺知當時文運之進步，與人民知識之發達矣。

勤王之心不足以倒德川倒之者爲外寇

但當時所謂勤王主義者，非以破壞德川政府爲目的。其後有意外之事件發生，始引起世人對德川政

府之反感。所謂意外之事件為何？外交問題是也。日本紀元二十六世紀之初（二千五百十三年，西曆一八五三），美國之黑船（註一）越太平洋抵日本之浦賀，請求通商貿易。在此以前，外國來日通商之事，自三代將軍家光之時起即已禁止，國內一般人士，除日本之外，幾不知有其他國家。常聞其名者僅中國，朝鮮，琉球而已。彼佛祖之本土天堂，在日本人想像中，或以為在天空之外。當此時，亦常有外國船隻來寇日本邊海，至日本紀元二十五世紀之末葉，外國船更往來於日本近海，但僅在邊僻之地上陸而已。故當時有志之士，雖頗對之忿怒，一般人民則未嘗注意。美國船抵日本時，其所到為江戶近傍之地，其所請求者為締結條約開埠通商之事。茲事體大，與往時外人之至邊地而止者大異。且美國出以強迫，對日示威，若不允許，即欲訴之兵力。

此事對於當時日本人民儼如青天霹靂，最足令其破膽。王室當即勅巫祝僧侶祈禱外人之退去；幕府立即築炮臺於品川沖令諸藩嚴武備，且令其對時事建議處置之法，又招通洋語者質詢外國之情實。

愛國心之勃興

在深暗之地久住者，忽見光輝，則不能立即開眼。閉居於太平洋中靈爾小島之內不與海外異邦交通之人民，忽遇如此事變，其心神之感亂，固不足怪。其最恐懼者，為日本如與外國交通，則彼必立奪己國。愛國之念，多發生於國家危急之時。今外國要求通商，將奪日本之國，人心中有此種恐怖，自然憂國之心勃然而生。人嘗自苦時，必自求慰藉；當自恐時，必自以為強；覺自危時，必自尊大而罵詈他人之強者。嘗外國船入日本時，其船艦雖然巨大，其砲銃器械雖然精巧，其兵制進退嚴然肅靜，足使日人恐懼萬狀。日本船則為輕巧之小舟，日本之銃砲僅為火繩鎗，日本之兵制則仍沿用二十三世紀即元龜天正年間之舊制。故無論如何，總不能在此等方面，自誇強盛，引以自慰。其唯一足以自慰者，則為當時最發達之思想：日本為神國，日本之天子為神孫，與夷狄禽獸不同。（水戶之會澤正志著新論曰：一謹按：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天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

武備與外事調查

愛國心在國家有事時發生

神國思想

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無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敵虜，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地在天中，茫然無歸，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嘗其股脛，故奔舶走軻，莫遠而不至也）。當時此類之文詩甚多）。

德川政府欲以天子之詔開港

當民間志士憂慮國事之時，德川政府之大權，在謳歌二百六十餘年太平政治之貴族手中。彼等雖爲創立德川政府之勇猛參河武士之子孫，但以德川政府太平日久，使彼等自精神以至於身體，完全淪於柔弱。彼其生平所交接者，僅爲下屬之臣僕，傲慢性成，對於外國使臣，毫不恐懼甚且施以叱責。彼等不知與外國交際爲何事，不知海關稅爲何物，不知裁判權爲何物，不知通商交易有如何之利益。故第一次所開之談判，非談判也，直是受訓諭而已。今欲抗之，兵力不足以取勝，辯論不足以折服，欲承認其要求，又恐人民之忿怒，於是，德川政府所希望之第一策略，爲欲藉當時大受世人尊信之王室威力，假天子之詔進行開港，以鎮國民之忿怒；並以請求王室之勅許爲詞，緩和外國之督促。

從來天子之詔，常依德川政府之意志爲轉移。此次德川氏欲假天子以開港之方略傳播以後，民間志士皆忿怒慨嘆，有謂「寶刀難染洋夷血」者，有謂「此心偏欲掃戎夷」者，有謂：「今日而不讓尊王攘夷者，乃國家之奸賊，夷狄之醜奴」。其後全國各藩之志士，憂憤填胸，捨妻子，脫鄉里，不顧生死，不畏嚴罰，奔走於東西南北，努力貫徹其所主張之攘夷論。經志士之奔走活動，攘夷論傳入於朝廷。幕府之內，王室因而決定攘夷政策。德川氏欲推翻之，屢奏開港之議，終未能遂其志。

此策不行德川政府專斷行之

當是時，德川十四代將軍家茂尚幼，一切政權皆在大老井伊直弼之手中。（縮印版中爲：「德川十三代將軍家定患病，繼嗣未定，一切政權皆在大老井伊直弼之手中」。此兩說皆與事實不符合。此段正

井伊大老
辭職後

志士之憤
安政之獄

直瀨被刺
開港之功

公文書

確之歷史是：「安政五年（日本紀元二五二八年）四月井伊大老就任，六月日美商約調印，同月立家茂爲繼嗣，七月與俄荷英訂商約，旋家定薨，九月日法條約調印，安政之獄發生，十月家茂將軍就任。」井伊大老知說王室之無效，又知鎖港攘夷之事絕不能行，於是下最大之決心，以爲王室雖不許，吾決行之，諸侯雖不服，吾能壓服之，民間志士雖反對，吾悉壓服之，今日之事，舍此別無他法。遂終與外國締假條約（註二）。此爲日本紀元二千五百一十八年之事（西曆一八五八年）。

天下志士見井伊大老此種舉措，皆悚然而怒曰：「德川氏使吾人爲外國之奴隸，背天子之命使日本國陸沈」。於是齊然並起，皆歸心於王室。直瀨聞知之，乃爲一網打盡之謀（即安政之獄），世論因此益爲憤怒。二百五十餘年人望所歸之政府，至此無復有一人擁護之者。雖知開港爲不得已之倖士，亦多不服。

在此民意衝動之時，井伊直弼敢犯衆怒而作締約之舉，其不得善終，固意中事。結果直弼死於一水戶藩士之手。但彼既犧牲德川政府及其一身而與外國締結條約，使以後無論如何堅強之鎖港論者執政權，亦不能實行其主張。不能不說井伊直弼對於日本國家有大功。

諸侯志士欲奉天子實行攘夷

在此以前，天下騷擾及志士見德川政府之終不可賴，皆歸向王室，欲依王室以行鎖港攘夷，使日本神國免爲夷狄之奴隸。於是直弼毒計，欲恢復德川氏之人望，使海內歸於事靜，唯有使公武（朝廷與幕府）合體之一途，蓋美英林東下之機（真妹下嫁於將軍）。直弼死後，老中等一新庶政，使諸侯之妻孥各返本國，且希望公武合體。後又促第十四代將軍家茂上洛（入京）以集諸侯於京師，企圖在天子之前，決定開港政策。

將軍上洛之失敗

使實行此政策者而爲寶良之材，其計劃或能奏效。但當時幕府之土著不學無識，何能挽回德川政府

非人之賢
良乃組織
之精神
非心理上
之制則乃
外形上之
人形有用
皆軍外形
上之感嚴
亦不及各
諸侯
國諸侯
改革內政
將軍屈服
於王室
玉室如樓
夾鎖港之
不可

之類勢。德川政府自三代將軍以後，其傳傳德澤下委政權者，固決非由於執政權者。定實諸藩先制定組織之完備。使據關東形勝之地，留諸侯之質子於江戶大城之內，而加以抑制。故德川政府後來之得保寧靜，與其說是心理上之限制，不如說是外形上之限制。因此，使此種人物出巍然之大城而逍遙於開闢廣野之內，常與公衆耳目相接觸，勢必威嚴墜地，政令不行。當歸德川政府內部已有持人材登用論者，非如昔時之保守。但重王位者，則仍未有變更。故當將軍至惡，與其他諸侯併列，其外形上之威嚴亦不及各諸侯。往日德川氏使諸侯畏服之勢力，至此已隱然消散。況此時關西諸國之諸侯，早已受外國船突來之激動，實行改革內政，廢除舊日相傳之禮制，遷憂國之士任以國事。此輩志士，與將軍應對之際，不免加以輕蔑。此輩將軍上洛，本圖使王室與德川氏合一者，結果反因此使德川氏屈服於王室。當天子幸有清水時，發生親發都刃於將軍使實行撥夷之大事件。是時將軍病不能出，代理人亦病不能出，其事遂未實行。然德川氏內部之醜態，則已暴露無遺矣。

各地騷擾

但至此時，樓夷鎖港之難於實行，已為王室所深知。先是水戶藩主張鎖港最力，一橋又贊其議，結成撥夷派以與德川氏之政略對抗。因是玉室乃派遣二侯及其他諸侯下關某漢行撥夷。但實未能實行。於是公武合體之目的始達到，主張樓夷鎖港之精神諸侯及民間志士，莫不發力。

但德川氏已失人望，豈能久制海內。及至公武皆贊開港主義之時，民間志士之堅持鎖港撥夷主義者，遂起兵以抗政府（松本謙三郎、吉村寅太郎等擁中山馬光於大和五條起兵叛亂，平野二郎於但馬反叛）；有藩士騷擾京都者（卷州人入京作亂）；有諸侯私與外國戰者（長州之入砲擊外艦，外艦然而擊之，佔領馬關）；薩州之兵亦與英艦戰。有諸侯內亂自相騷擾者（水戶藩有內亂，互相殺戮數年）。海內多事，德川氏雖不能鎮壓之。外國又督促償金，頻向德川政府責難。政治上之困難，無有過於此時者。此等事件，雖一一平定，但政府更為衰弱。論反對者以可乘之機會。

俗論黨與
奇兵隊

征討長藩不勝

先是長州藩毛利氏屢抗德川政府之命。藩中有所謂俗論黨者，對德川政府表示恭順謹慎之意，諒許多與謀反抗者之臣下，因此德川氏寬恕之；但此時該藩有高杉晉作者出，起兵擊俗論黨，改變全藩之議論爲討幕攘夷，德川氏遂欲發兵討滅之。依從前德川政府處置各藩之方法，莫須臾一紙命令割地或移討足矣。但德川政府知此法已不能實行，乃發征討之師，欲決一勝敗。當是時長州阻與外國通商，大改兵制。此次戰爭，頗呈新舊之差異。主張鎖國攘夷之長兵，悉用洋式，輕裝精銳純用去張開陣幕。德川氏命征討長藩之諸侯兵，皆着元龜天正以來家傳之甲冑，持鎗鎗對乘瘦馬，兩軍相見之勝敗之數可知。若德川氏傾全力以向長州，亦不難加以擊破。不幸此時家法將軍範壽，內外多事，僅到觀長藩一戰而退。將軍慶寧率導政權。

山内侯之
勳院

德川政府既失人望，此次又表現其兵力之虛弱，蓋此已完全喪失其攝政府之權力。本藩政外樣大名固無再從其命者，即小藩及譜代大名亦多不從其命。於是土佐侯山内氏使其臣說十五代將軍慶喜曰：「泰西人來航以來，物議紛然，東取西擊，殆無寧歲，恐招外國之輕侮，是乃政令出於土途，天下耳目異其所屬之所致。宜奉還政權於王室，立與萬國併立之基礎。」將軍納其說，遂奉還政權。

伏見之變

慶喜辭將軍職後，德川氏之封領仍未削，其臣屬甚多，糧食充足，海內無能與之比者。若其隱然雄據關東，唯朝廷之命是從，則朝廷亦不能如之何。但德川氏之薩長土等藩臣，專擅朝廷之權，事事與德川氏爲難，此乃人情所難堪，終至發生伏見之變，一敗而遁至關東。

將軍恭順謹慎

伏見一戰，表面上雖似決天下之向背，但德川氏尙不失爲海內之強國。其謀所萃之陸軍，爲當時最精訓練者。至於海軍，亦爲其他諸侯所未嘗有。德川氏佔有關陽，蟻龍，關天等許多軍艦而伏見一敗。德川氏更得一良機，排除從來管要路之卑怯人物，因此，若再起關左之兵，以東海東山三道文到天下之

之大久保

與藤不可

國權而重
國家之建
重而重

德川氏滅
亡之原因

事未可知也。但此時外患方深，非宜動干戈於郭內之壽。故將軍慶喜容勝安房，吹次保三藩之說，其臣下曰：「不可抗官軍，抗官軍者，猶如加刃於舌」。朝獻江戶城，軍艦統帥於朝野，而桂侯稱爲。藩堅固之德川政府組織，固爲民間輿論所不滿，開港後僅九年而終解體。當時輿論爲德川氏之德川國之上策！今日三尺童子尙知其非。德川氏始終主張開港，對國家可謂有大功。但如此固陋之輿論尙且不能壓服而反自倒，國家之軌大權者而不解此理時，徒在風波於社會耳。如德川氏者，可謂遺良好之龜鑑於後世矣。

外交一開德川氏之制度不能維持

但外交一開，永遠保持德川政府之制度，畢竟無望。德川政府之制度在防藩侯及人謀之反亂方面，最爲嚴密，故二百五十年之久諸侯無一叛者。但至海內連冷而向外敵時，封建制度之區劃則完全無用。詰語有云：「同舟蓬風，吳越相救」。故秦兵強時，則太國連冷，法兵強時則連日連冷，秦楚連冷之時，固非六國非英日也。外船突入時，日本人民之恐怖，達於極點。此時封建之要素，早經破壞，重氏族之習氣，亦完全掃除。諸侯內部，皆實行改革，使愛國之人可藩政。此等人心，無復有盡忠其君與愛其藩主之念，彼等一心但知愛念日本並沙存動狂之志。如此人物，豈可謂爲封建之人物乎？蓋藩侯爲那縣之人物矣。因此，滅德川氏者，在外表上雖似爲封建諸侯之力，其實乃愛國志士利用封建勢力以達其目的。因此，德川政府滅亡後四年，明治政府遂廢封建置郡縣。海內無一人因忠其君侯而抗者，蓋因封建制度之盛時，人民有愛藩之念而無愛國之心，敵國外患強時，有愛國心而無愛藩之念。今德川氏之末路有愛國心而無愛藩之念觀之，可知德川政府之所以滅亡，乃因封建制度之區劃滅亡而終歸滅亡也。爲命也，又何必歸咎於一二執政者之過失耶？

(譯者註一) 黑船 初至有本之外國船，船身塗爲黑色，故日人稱之爲黑船。

約。

(註二) 條約 假是暫時的通議。德川幕安政年間與外國所訂之條約，尙未得朝廷之勅許，故稱爲假條約，亦稱安政假條約。

跋

明治復續，百度皆新，天下之事，率取法於西國焉。獨史籍之體，全然仍舊貫，雖浩何補？吾友鼎軒田口君，夙通經濟之學，觀史有別眼，嘗慨古今史乘之無益世道，倣西國開化史，著此編，以論日本之所以旺盛焉。其博識卓見，非尋常史家之所及也。嗚呼！此編也，僅數卷耳，不可謂浩也。然擴而充之，可以壓倒萬卷矣。可以濟成天下焉。蓋以其平素所蘊蓄者，溢而爲史也。然則觀斯書者，可謂善以學成史，則可，謂君善以史成學，則不可。

明治十五年三月七日

香亭中根淑識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再版

(SECRET 渝手)

日本開化小史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編 輯 者	譯 述 者	原 著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印 務 印 書 館	王 雲 五	中 華 會 編 譯 委 員 會	余 又 荪	田 口 卯 吉
		重慶白象街			

